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章如愚與《群書考索》中的人物與制度



指導教授：張元

學生：黃亭惇

學號：9643501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摘要

類書的發展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內容包含了人與自然界的一切知識。「類書」是一種匯集資料的書籍，將經、史、子、集的內容重新分類整理，方便人們記憶、運用。人類的知識積累，在到達極複雜程度後，往往以特別的形式記憶儲存，類書的出現即是如此。中國自古以來的知識傳統，在宋代累積到達一個巔峰，使「類書」的文體大盛。因此，類書代表了人對過去知識的重整，也就隱含了當時人怎麼看待過去的線索。到了宋代，一方面有大型官修類書出現，一方面私修類書也蓬勃發展，而「類書」一詞也在宋代確立。

章如愚的《群書考索》在此時應運而生，書中除了匯集廣博的知識之外，更表達他的意見及對現世的關心，寄託了作者更深層的寫作意圖。但是歷來的研究大多注重於版本的考訂、功能的介紹。本文從學術史、思想史的脈絡來探討此書。首先考究章如愚的生平經歷，以及《群書考索》成書與發展的時代意義，並探討《群書考索》的思想與學風的關係。另外，考察《群書考索》的編纂方式與選材標準，從「人物」與「制度」兩方面著手。最後，對章如愚的個人生平以及歷史思想有一個統整性的意見，釐清他在南宋思想史的定位，藉此能對南宋的一般士人思想概況有更豐富的理解。

關鍵字：

章如愚、《群書考索》、浙東學派、類書



致謝詞

自進入清華後，已匆匆過了三年多。回想踏入清華的第一天，依然記憶猶新。興奮、激動的心情，急切的想聽到更多，學習更多。黃敏枝老師的話言猶在耳：「不要因為太喜歡這裡就不打算畢業啦！」。於是我和娟芝同學在研究室的小白板寫下：「不要留戀研究室，趕快畢業趕快出去！」一語，時時提醒自己。

然而，這個溫馨的地方怎不叫人留戀？還記得每次期末瘋狂趕報告的晚上，大家在研究室比誰留的最晚。有什麼書圖書館沒有，跟臨座的永中同學借就有了。報告寫不下去時，和大家考證一下高麗菜名字的由來提振精神。不時還有文仁同學插播最新的政治新聞和冷笑話，以及晃昌同學提供的謎樣遊戲。這些歡樂的時光在我研究所生涯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得到這些友情，就覺得這一趟沒有白來，我衷心感謝。

而能夠進入歷史這個領域，要感謝兩位恩師，蔣義斌老師與張元老師。大學時期，在蔣義斌老師的引領之下，慢慢了解歷史的樂趣與奧妙。如果不是蔣老師在課外帶著我們閱讀古代典籍，我也不會發覺讀歷史是這麼快樂的事。大二那年，怯生生的我，對未來還懵懵懂懂，只覺得歷史很有趣，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該做什麼。蔣老師建議我去請教張元老師，那次南下新竹，張元老師和藹可親的接待，給了我許多建議和方向，讓我決定朝這條路試試看。過了二年，終於有幸進入清華成為張老師的學生。這三年多來，常常聽老師的課，給了我許多啟發。而我不只是在知識上受到老師的啟迪，在做事處事上，也受到老師的影響。老師的知行合一、明辨是非，都是我的楷模。撰寫論文期間，正值張元老師退休，但是老師對於教學的熱情及孜孜不倦的態度令我訝異，也激勵著我。兩位老師的人格和風範令我深深欽羨，能受到他們的指導是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事。

還有過去教導我的所有老師，台北大學歷史系的李若庸老師、陳俊強老師、李訓詳老師、陳守亭老師、伍碧雯老師、李朝津老師。清大歷史系的李貞德老師、張永堂老師、黃敏枝老師、賴瑞和老師、黃依妹老師、李弘祺老師。清大中文系的祝平次老師、政大歷史系的劉祥光老師、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鄧小南老師、浙江大學歷史系包偉民老師。感謝你們點亮了我知識殿堂的明燈。還要感謝所辦的敏菁姐和湘雲學姐，給了我許多協助，妳們的親切和熱情令人感到很溫暖。

這一路上有許多學友互相扶持、互相激勵。宛淪和玟如，謝謝妳們陪著我哭過笑過。冠華學姊、毅均學長是很可靠的同門師兄師姐。琬如學姊、筱梅學姊總是鼓勵我、支持我。讀書會的夥伴們，娟芝、文仁、永中、晃昌、尙潔、曉雯、銘孝、俊達、佩玲、玫宜、瑋婷、佳芸、威志、令杰，我的論文寶寶是和你們一起孕育出來的，沒有你們就不會有它。影印室的小麟，感謝妳親切的服務。佳美花店的大家，謝謝你們給了我一個溫暖的窩。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縱容我恣意揮灑人生，永遠在背後支持著我。波妞、怡麗、蝌蚪、球球、橘子、夫人、小花，你們六隻小動物兒帶給我無比的快樂。還有親愛的你，謝謝你進入我的生命，我要將這一刻的喜悅與你分享，祝福你。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01
第二節、研究回顧·····	04
第三節、章節安排·····	07
第二章、章如愚的生平與經歷	
第一節、章如愚籍貫辨析·····	09
第二節、章如愚的生平經歷·····	16
第三節、《群書考索》成書·····	23
第四節、《群書考索》流傳情形·····	30
第三章、《群書考索》歷史人物分析	
第一節、選材內容的特質·····	39
第二節、歷史人物的選擇·····	44
第三節、歷史人物的分析方式·····	53
第四章、《群書考索》歷代制度分析	
第一節、《群書考索》制度分類與引用資料·····	61
第二節、《群書考索》制度的分析方式·····	74
第三節、《群書考索》制度所引史論探析·····	78
第五章、結論·····	85
參考書目·····	89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人對過去的看法，不只來自於傳世文獻傳達的那個「真實」，也受到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不同的學術氛圍、政治情勢、社會狀況，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意識，也影響了當時的歷史著作。宋人對歷史的看法，可以從多方面進行觀察，例如從當時史書的變化來看，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宋代地方志的興盛也代表宋人對地方史的漸趨重視。那麼，另一個在宋代興盛的文體——「類書」，是否也能協助我們了解宋人對過去世界的想像呢？「類書」是一種匯集資料的書籍，將經、史、子、集的內容重新分類整理，方便人們記憶、運用。人類的知識積累，在到達極複雜程度後，往往以特別的形式記憶儲存，類書的出現即是如此。中國自古以來的知識傳統，在宋代累積到達一個巔峰，使「類書」的文體大盛。因此，類書代表了人對過去知識的重整，也就隱含了當時人怎麼看待過去的線索。

自魏晉南北朝就出現《皇覽》這一類大量抄錄前人資料和典籍的類事之書，隋唐五代更出現《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大型類書。到了宋代，「類書」始被獨立為一「部」，在數量、種類、資料範圍方面，都大幅超越了前代。官修類書如《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皆是當時重要的文化成就。私修類書雖不及官修類書的規模宏偉，但是數量卻十分豐富。這是由於宋代科舉普及，應考士人大增，使科舉型私修類書應運而生，再加上印刷術發達，便於書籍的流通，知識量大增，士人可謂面臨「知識危機」，尤其要在短時間之內汲取重要知識以應付科舉考試，便要仰賴類書的提要鉤玄。因此無論是編纂類書或閱讀類書，皆是宋代一般士人重要的活動，若要研究宋代的思想文化，這些私修類書是必須納入考量的。

然而歷來對宋代類書的研究，多集中於版本的考訂、功能的介紹，近來亦有以科舉文化的角度探討宋代士人編纂類書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於我們了解宋代類書生成的背景脈絡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對於類書本身蘊含的思想，以及與作者的關係，卻少有人從這個方向進行研究。雖然類書以匯集群書、分類知識為主，看似為資料性書籍，但是其中也隱含了作者的思想。故筆者欲以私修類書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這些撰寫類書的士人，他們如何用作品表達他們對問題的看法，呈現他們對過去世界的思考，以及與現在世界的連結。

筆者將焦點放在南宋，因為南宋是私修類書最蓬勃發展的時期，諸如《類說》、《海錄碎事》、《錦繡萬花谷》、《群書考索》、《記纂淵海》、《事林廣記》、《古

今合璧事類備要》等類書，皆在南宋時期出版。此外，南宋後期正值政治動盪、外患深重之際，處於變動時期的士人，他們的作品如何與時代對話，如何表達他們的時代關懷，都值得深入研究。編纂類書的南宋士人，大多不是有名的思想家，然而這並不代表其作品就毫無價值，這些作者也是宋代思想洪流中的一份子，甚至可能代表著大多數士人的想法，因此深入研究這些私修類書是有必要的。

在南宋眾多的類書作品中，尤以章如愚的《群書考索》最為精博。《群書考索》歷來被視為科舉型類書，作者章如愚為南宋婺州金華人，於慶元二年（1196）登進士第，擔任過史館編校，最高擔任國子博士，曾出知貴州，政績甚著。直到寧宗開禧初被召上疏，得罪韓侂胄，因而罷秩歸鄉，回到婺州。章氏在鄉里結山堂數十間，與士子講學，並潛心著述。《群書考索》就是他唯一留存下來的著作，現今共有 212 卷，共分為前、後、續、別四集。此書內容豐富，包含經、史、子、集、禮、樂、律、曆、官制、食貨、兵、刑、地理等門，蒐集了大量的史料。此書不只在南宋流傳，到了元、明仍見重新刊印。

筆者選擇《群書考索》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群書考索》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群書考索》不同於一般類書，在匯集廣博的知識之外，更表達他的意見及對現世的關心，因此寄託了作者更深層的寫作意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此書：「言必有徵，事必有據，博采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頗以經世為心，在講學之家，尚有實際。」¹故適宜讓我們分析其思想。第二，《群書考索》中選用了大量的宋儒意見，由於章氏「言必有徵，事必有據」，因此這些議論大多能找到其原作者，這有助於我們對章氏的選材進行分類，若能分析章氏對宋儒意見的選擇，掌握其思想派別，我們更可了解其思想歸趨。第三，章氏與浙東學術環境有密切關係，除了受到當地理學發展的影響，也受到類書編纂傳統的影響，由於章氏無重要的思想性著作，因此較少為人注意，對章氏本身的研究也就不多。但是作為一個地方性的學者，他仍然有影響力，透過對章氏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在南宋末期像章如愚這類以學識淵博著稱、善於蒐集編排資料的士人，他們的思想概況為何？乃至於對過去的想法又是如何？這都是很值得思考的課題。

筆者欲探討的主題有兩大部分：第一，章如愚的生平經歷。著作與人是分不開的，因此在分析一部書的同時，不能不了解作者。關於章氏的生平經歷，由於其在正史無傳，因此史家大多採用明正德年間出版的《群書考索》中的小傳，然而章氏在元明清的筆記和地方志中，仍有不少與章氏有關的史料可供探尋考訂，雖然這些資料之間有矛盾相異之處，但透過分析與整理，應可勾勒出章如愚的一生，並撰寫一篇較為完整的章如愚傳記。除此之外，在這部分也欲結合章氏與婺州當地學術的關係，由於章氏為婺州金華人，在婺州一帶出版的科舉型類書，有唐仲友的《帝王經世圖譜》、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陳傅良的《永嘉八面鋒》

¹（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卷 135，頁 2804。

等等。章如愚與這些人的關係，無論是在類書編纂傳統上，或是學術傳承關係上，都值得一一分疏整理。此外，增補《群書考索》的呂中，向來較為史家忽略，但他與章氏這批浙東士人的關係極值得深入探究，他為什麼要增補《群書考索》？他的學術派別為何？與章如愚有什麼樣的關係？皆未曾有人進行分析，因此筆者欲在此處對呂中與章如愚進行綜合比較，試圖了解兩人在生平經歷、學術背景的異同。如以上所述，透過對章氏個人的了解、對其背景的掌握，來進行其個人生平經歷的描寫，相信能對章氏這樣的南宋末期士人有概括性的了解。

第二，探究《群書考索》呈現的歷史知識。浙東向來以史學見長，章如愚處於這樣的學術風氣下，必然深受影響，再加上他曾任史館職務，可見章氏在「史」方面的用心，因此其歷史思維是值得深入探討的。《群書考索》特別重視歷史知識，其他類書往往將過去的史實當作增廣見聞的掌故，以利文章的書寫，但《群書考索》則是注重在實質的內容，以及過去的史實所產生的影響及意義，因此，《群書考索》可以說是「史」性質非常強的類書。那麼，《群書考索》提供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知識呢？筆者欲從歷史人物與制度面著手，觀察章氏如何用資料呈現歷史人物，以及如何闡述歷史制度。雖然《群書考索》是一部類書，但章氏在《群書考索》中選取資料加以排比，又為這些資料安置標題、重訂順序，甚至加上自己的評論及意見。無論是在描述人物，或是整理制度沿革方面，都呈現他對歷史的思考和看法，因此值得我們進行分析。章氏對歷史問題著眼的重點為何？他選擇了哪些材料？他使用了那些方法？透過探索這些問題，筆者希冀能了解章如愚的關懷和思想。另一方面，也從《群書考索》呈現的歷史知識的特色，探究南宋士人藉由此本類書，吸收到了怎樣的歷史知識。

第二節、研究回顧

關於類書的通論性的相關研究十分豐富，在前輩學者的研究中，都認為宋代是類書發展史中一個突破性的時期，如戚志芬的《中國的類書、政書與叢書》、胡道靜的《中國古代的類書》皆如此認為。而在宋代類書的研究中，如張園東的《宋代類書之研究》，將宋代類書出現的原因分為三項，一為宋代政權的建立，要奠定文治，並參酌前代成敗；二為科舉需要，以備場屋之用；三為雕版印刷發達，提供方便的刻印技術，這些已是學界公認的定論。²在丁原基的〈宋代類書的文獻價值〉一文中，作者比較宋代類書與前代類書的差別，認為宋代類書不只引書豐富，也出現了專門性類書，更有附圖譜的類書興起，此外，宋代類書始出現編撰者加入議論的情形，例如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以及章如愚的《群書考索》。³這些通論性著作提供了宋代類書興起的客觀環境條件，對於我們從「類書」這個脈絡來理解《群書考索》有極大的幫助。

亦有專門研究《群書考索》的文章，如李偉國的〈《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作者提供《群書考索》的現存版本資訊，並比較宋殘本和元明刊本之間的異同，此外，亦考察其增補情形，認為呂中主要只做了「增廣」的工作，並未對原著作內容更動。⁴又如崔文印，〈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一文，作者分析《群書考索》四集的組成成分，並推測呂中所增補的部分為何，其推測雖與李氏有異，但皆注意到呂中的增補情形。此外，作者認為《群書考索》類目間是一種有機的聯繫，提供讀者完整的知識體系，這是其他的類書無法相比的。⁵上述兩則研究，對於我們了解《群書考索》的體例、版本、增補情形甚有助益，並且皆注意到呂中的增補，李偉國甚至認為呂中的學問不亞於章如愚。這說明我們在研究《群書考索》的思想時，不能不將呂中也納入研究範圍。另如陳暉仁的〈《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其文考察了章如愚的生平，以及《群書考索》南宋刻本的流傳與收藏現況，為近期考證此書較為精密者。作者在呂中增補的部分與李偉國的意見略有不同，在章如愚的生平資料上也比兩位學者引證了更多材料，值得後人參考。⁶

分析章如愚及《群書考索》最為細緻的研究，應屬 Peter K. Bol（包弼德）的“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一文。此文著重在研究浙東地區書、作者、私

² 張園東，《宋代類書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2005）。

³ 丁原基，〈宋代類書的文獻價值〉，《應用語文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4：（2002），頁 29-56。

⁴ 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文獻》，22（1985），頁 91-98。

⁵ 崔文印，〈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史學史研究》，1（1994），頁 64-71。

⁶ 陳暉仁，〈《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07，頁 171-193。

有財產之間的關聯。作者仔細分析與章如愚生平相關的史料，分辨幾個文本記載的可信與否，並將章如愚與婺州東陽地區的學術環境連結，藉著分析東陽的書院文化與當地學者的治學方向，從而歸納章如愚著作此書的背景。此文提供了一個立體的歷史視野，讓我們可以看到當地書院文化與學者在其間互動的情形。⁷此外，如 Hoyt Cleveland Tillman(田浩)的“Encyclopedias, Polymaths, and Tao-hsueh Confucian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 Ju-yu”一文，以《群書考索》為中心，探討道學和類書編纂的關係。其中，作者以《群書考索》的〈聖賢門〉進行統計，計算章氏引用的資料來源，並認為章氏採用這些道學家的議論，有助於道學理念的傳佈。作者也點出章氏在分類上的特色，以及章氏的總論的重要性，認為其分類和總論，是章氏最能把自己的意見傳達給讀者的管道。⁸這兩則研究關注的焦點不大相同，Peter K. Bol 注重章氏作為「師」的社會性角色，藉以與當時在婺州私人書院的士人活動連結；Hoyt Cleveland Tillman 則是從學術發展史及書籍編纂傳統的脈絡來定位章如愚，將章氏的作品與其他類似的著作互相比較。這提供了我們觀察章如愚的兩個角度，一是地域上的，二是時間上的。就地域上來說，章氏的活動與當地的「學」的文化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時間上來說，他的作品其實來自一個長久的類書編纂傳統，其中有理學的刺激與影響。筆者希望能兼顧二者，並探討這兩者未觸及的部分——歷史思想，浙東向來有重史的風氣，章氏的著作是否也受此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章氏對歷史的看法是必須要被討論的。

宋代類書、科舉、道學運動三者之間的關係，歷來一直都有相關的研究。如劉祥光的〈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一文，討論宋代科舉文化下所產生的參考書籍，其中就包含章如愚的《山堂考索》。作者除了分析宋代考試文化對士人的影響，也更進一步思考南宋大儒編纂考試用書的原因，劉氏認為這些儒者無法改變士人對科舉的追求，只能適應此文化，並努力將自己的認為的重要觀念編入書籍中，這是他們理想與現實的妥協。而這些考試用書，因為帶有「求學問道」理想，才能繼續流傳下來。⁹Hilde de Weerdt(魏希德)的專著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一書，則是分析在宋代科舉場域中競爭的三種教師：永嘉學派、宮廷、道學運動。其中，作者認為浙東地區永嘉學派在科場上的優勢，除了有特別的課程外，更有特別的教本。在永嘉學派的環境下，道學是有可能與科舉結合的。¹⁰Hilde de Weerdt 的另一篇文章“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⁷ Peter K. Bol,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頁 644-673。

⁸ Hoyt Cleveland Tillman, “Encyclopedias, Polymaths, and Tao-hsueh Confucian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 Ju-yu,” *JSYS*, 22(1990-92), pp.89-108.

⁹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頁 113-143。

¹⁰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作者認為宋代的私修類書的產生，與科舉有密切關係，而道學家在撰寫類書時，會將其道德概念放入其中，再透過發達的印刷術，傳佈到一般士人手上，進而影響他們的思想與觀念。¹¹上述的研究成果，提供我們一幅歷史圖像：南宋的士人，一方面追求為學之道，一方面要追求科舉功名，浙東學派則盡力讓兩者取得平衡，不只要學生有正確的道德觀念以及求學態度，也要他們在考場上得勝。在此研究基礎上，我們亦可把章氏放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以體會他編纂《群書考索》之心。

總結上述的研究成果，雖然對《群書考索》此書本身研究頗為豐富，但是對章如愚的思想卻著墨不深。宋人如何思考？他們對過去的想像為何？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張元的〈試析王應麟的歷史思想〉、〈簡析洪邁的歷史知識〉。張氏從王應麟及洪邁的著作中，探討他們在編纂廣博的資料的同時，如何運用他們的思考與分析能力，呈現他們對歷史的看法。¹²這對於分析章如愚歷史思維的方法上極具啟發性。因為王應麟與洪邁二人，與章如愚有一個共通點，都是讀書極為廣博，且善於蒐集、分類、編纂資料的學者，因此《四庫提要》在洪邁的《南朝史精語》才會說：「蓋南宋最重詞科，士大夫多節錄古書，以備遣用。其排比成編者，則有王應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¹³而將洪邁的著作與王應麟、章如愚的作品相提並論。張氏認為，這一類的學者雖然優點在於「博」，但是在思考的細密度上卻仍不足。那麼，章如愚是否也是善於排比、歸納資料，而缺乏細密的思考？這就要從章氏對於歷史議題的處理來看，他認為哪些是重要的歷史課題？他引用了誰的話來做解釋？這亦是筆者本文欲探討的目標之一。

¹¹ Hilde de Weerdt,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special volume, *Qu'étaien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 en Chine*, 2007, 77-102.

¹² 見張元，〈試析王應麟的歷史思想〉，《清華學報》，27：3(1997)：287-312；張元，〈簡析洪邁的歷史知識〉，《中國文化研究》（北京），39(2003·1)，頁 69-81。

¹³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65，頁 1414。

第三節、章節安排

本文預計分爲五個章節。第一章爲緒論，將闡釋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並回顧前人研究成果，最後對各章節的安排作一說明。

第二章將分析章如愚的生平經歷，以及探討《群書考索》的分類問題。章氏的生平資料篇幅不大且零散，其間又存在一些矛盾與衝突，歷來學者並未將之釐清，筆者欲結合所有文本，對章氏的生平做出綜述。例如王柏《魯齋集》、吳師道《敬鄉錄》、錢士昇的《南宋書》、《新安文獻志》，都有十分關鍵性的史料，但尚未被充分發揮。筆者要解決的問題有以下幾點：章如愚的師承爲何？他的任官經歷？他的著述狀況？都將在此章一一釐清。除了對章如愚的分析，筆者也會對傅寅與呂中多加著墨。傅寅的《群書百考》對章如愚有何影響？呂中爲何要增補《群書考索》？兩者師承與章如愚又有何關係？都是在此章要探討的問題。此章的另一重點，在於考察《群書考索》的成書與演變。《群書考索》的成書背景爲何？其地位由宋到清是否有所轉變？以理解《群書考索》在歷史上的定位。

第三章欲分析章氏的歷史人物論述。章如愚在《群書考索》中，大致將人物分爲三類進行論述，分別是君、臣、聖賢。這三類不只充斥於書中，亦自成三個獨立的部門，即〈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這是《群書考索》中，唯一以「人物」爲主題的部門。在這三門中，章氏引用了許多宋儒的意見，來表達他對這些人物的看法。透過對這三門的分析，筆者想了解章如愚對人物如何進行描述。筆者要提出的問題是，章如愚爲什麼要選擇這些人物？他們具有什麼樣的代表性？而章氏選用了哪些意見？從什麼角度，以什麼方式呈現這些歷史人物？透過回答這些問題，以瞭解章如愚對歷史人物的看法爲何。而在此三門之外，其他地方也有提到歷史人物，例如在〈夷狄門〉中，提到各代君王制夷的情形，就有漢武帝、漢宣帝、唐太宗……等人，但是這些人物並未被放入以「人物」爲主題的部門，因此筆者想藉由比較此點的異同，來釐清章氏心中可被稱爲「人物」的標準。筆者假定章氏心中有一幅歷史人物的等級圖，希冀能透過章氏對各類歷史人物的描述與評比，建構起章氏心中的圖像。

第四章欲分析章氏對歷代制度的看法。章氏注重的制度涵蓋經濟、軍事、教育三個層面，筆者欲從禮樂、官、學、兵、財賦制五大部分進行探討。章氏在制度方面用心極深，論述制度的每一門儼然就是一部制度演變發展史，在這些制度論述之後，更有他自己的「總論」，以評論歷代制度的興衰得失。筆者將分析章氏的各項總論，以及他所選取的宋儒議論，了解他如何運用歷史的思考來解釋制度的演變。此外，筆者更欲探察章氏在這些資料匯集背後的用意，是否隱含著他對現世的關心？在此處會配合其他制度性類書、政書進行比較，例如杜佑的《通典》、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王應麟的《玉海》、林駟與黃履翁的《古今源

流至論》等等，比較他們對於制度的論述有何異同。

最後一章將總結前述三章的成果，對章如愚的個人生平以及歷史思想有一個統整性的意見，並釐清他在南宋思想史的定位。希望藉由對章如愚的研究，能對南宋的一般士人思想概況有更豐富的理解。



第二章、章如愚的生平與經歷

本章欲探析章如愚的生平與經歷，首先將先確定章如愚籍貫的兩種說法，再進一步討論其生平經歷，依序分成求學、仕宦、教學三部分撰寫。由於章如愚編寫《群書考索》亦是其生命重要歷程，故另立一節討論。此節不只探究《群書考索》之成書狀況，也欲為《群書考索》的流傳與演變作一概述。

第一節、章如愚籍貫辨析

《群書考索》的作者為章如愚，其生平資料並不多，甚至有互相矛盾之處。以下將從兩種不同的章如愚傳記，來進行分析與解釋，試圖釐清章如愚的生平經歷。首先是明正德 3 年（1508）《群書考索》中的小傳，此也是最為通行的傳記版本：

按《宋史》本傳，章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自幼穎悟，負才尚氣。登寧宗慶元進士第，初授國子博士，凡詔誥制勅皆出其手。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鄉。乃結山堂數十間，以講道義，故遠邇之士，咸尊師之。及卒，門人諡為「山堂先生」。所著有《群書考索》及文集百十卷行於世。¹⁴

此篇文章大略勾勒了章如愚的一生，但仍有幾處疑點有待探討。第一，《宋史》並無章如愚傳，此段文字從何而出？第二，初登進士就擔任國子博士，略嫌過快，而「詔誥制勅」似是知制誥的職掌。第三，章如愚陳述了什麼政治意見，因而忤逆了韓侂胄？第四，章如愚罷秩歸鄉後，結山堂教書，教授內容究竟為何？諸多問題仍待探討。

另一則章如愚傳記，是來自明代錢士升的《南宋書》，此傳記與前引正德版中的小傳有極大差異：

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章祁人。官至史館編校兼官講。強記嗜書，自粗衣糲食、敝裘充虛之外，一切不問，徒知有書。仕進非其所欲，惟圖一詣史館抄錄所未見諸書而已。後兼官講，倖直以為妨功，遂投劾，歸。所著《考索》一書累百萬言。¹⁵

¹⁴（宋）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1982），明正德 3 年刊本，頁 3。下文以「正德版」代稱「明正德 3 年（1508）《群書考索》」。

¹⁵（明）錢士升，《南宋書》（濟南：齊魯，2000），二十五別史，卷 37〈三洪熊陸徐鄭列傳〉，頁 561。此處引文標點略與原書不同，為筆者自行更改。

此傳被錢士升放在〈三洪熊陸徐鄭列傳〉中，這篇列傳記載了洪適、洪遵、洪邁、熊克、陸游、徐夢莘、鄭樵等人的事蹟，而章如愚和馬端臨是此篇的附傳。這篇列傳雖無另立名目，但是顯然共同具有某種特質，才會將之編整成傳。錢士升在傳末贊曰：「三洪著述，一時推許。克遊文字，斐斐有致。商老《會編》，漁仲《通志》。廣搜群輯，允稱良史」，¹⁶可見這群人是因其著作的價值而被特別彙編成傳。

將正德版傳記與此傳相比，會發現兩者歧異相當大。第一，籍貫不同。前者為婺州金華人，後者為徽州歙縣章祁人。¹⁷第二，任官經歷不同。前者為國子博士、知貴州，後者為史館編校兼官講。第三，描述的具體事蹟也有歧異。前者是因忤韓侂胄而罷官，後者是因被認為妨功而罷官。除了皆為《群書考索》的作者外，幾乎是兩個不同的人之傳記。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呢？筆者以為《南宋書》的寫法似更真實的傳達出了章如愚本身的個性，「史館編校」之職似也更加貼近其撰著《群書考索》的可能，此資料究竟可不可用？

章如愚究竟為何方人士？在正德版出版之前，就已經有宋元的史料說明章如愚為婺州金華人。宋代方逢辰的〈橫城義塾記〉一文中，已有章如愚在婺州東陽縣教學的記載。¹⁸宋代王柏的《魯齋集》中，亦有章如愚在婺州活動的記錄。¹⁹而在元代吳師道的《敬鄉錄》中，明確記錄了章如愚的生平事蹟：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官。著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²⁰

此傳相較於正德版的版本，較為簡略，但可以視為明代版傳記的前身。除了元代的記載，明代也有不少史料支持章如愚為婺州人的說法，如地方文獻《明一統志》、《金華先民傳》、《金華賢達傳》、《兩浙名賢錄》，²¹以及明人文集《茅鹿門先生文集》、《弘簡錄》、《匏翁家藏書》。²²據上所述，可見章如愚為婺州人的說法明顯而確實。

¹⁶（明）錢士昇，《南宋書》，卷 37〈三洪熊陸徐鄭列傳〉，頁 561。

¹⁷ 章祁為徽州歙縣的一個村，此村落名稱在唐宋時期已出現，並以章為主要大姓。

¹⁸（清）黨金衡、王恩注，（道光）《東陽縣志》（南京：江蘇古籍，1993），中國地方志集成，頁 109，（宋）方逢辰，〈橫城義塾記〉。

¹⁹ 見（宋）王柏，《魯齋集》（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0，〈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頁 289-291、〈大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頁 288-289。

²⁰（元）吳師道，《敬鄉錄》（台北：新文豐，1988），卷 13，頁 280。

²¹ 見（明）李賢，《明一統志》（西安：三秦，1990），卷 42，頁 719。（明）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台北：新文豐，1988），卷 7〈文學〉，頁 448。（明）鄭柏，《金華賢達傳》（台北：新文豐，1988），卷 9，頁 365。（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3 理學，頁 107。

²² 見（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16，頁 680。以及（明）邵經邦，《弘簡錄》（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179〈道學〉，頁 189。（明）吳寬，《匏翁家藏書》（台北：藝文，1975），卷 39，頁 242。

再回頭看看《南宋書》的記載，早在明代弘治 12 年（1499）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中，就已有跡象可尋。《新安文獻志》收錄了一篇章如愚撰著的〈孺人葉氏節義傳〉：

〈孺人葉氏節義傳〉 章如愚

予頃謫南安，過賢女祠閱壁記，乃南康縣吳村劉氏女。及笄，父母許以適蔡氏，已而悔之，更適吳氏。吳氏卒，又欲復以歸蔡，女曰：「先使我棄蔡從吳，又欲從蔡，是重負吾。」乃自沈於江而死，鄉人義而祠之。又觀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傳記乎？籲人能悟此理為常，則人倫正而天下治，豈非世道深幸。今吾鄉葉氏女，許適程氏，未及婚而程氏卒，葉氏請於父，往哭而為之哀，覓其親從之子為其後，中外欽服，州縣上其事於朝，特賜綸命……迪功郎·史館編校文字·山堂章如愚撰。²³

章如愚的此篇文章歷來少有學者提及，只有陳曄仁先生在〈《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一文中，提到此文為章如愚唯一留存下來的文章。²⁴然而此篇文章卻還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此文提供了幾個關於章如愚生平的線索。第一，章如愚曾被貶謫至南安。第二，文中說到「吾鄉葉氏女」，這說明章如愚與葉氏女同為徽人。第三，章如愚的官職為史館編校文字。上述這三點，皆與正德版中描述的章如愚特質不符。但第三點卻與後來錢士升《南宋書·章如愚傳》中的記載相同。

同樣在《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畧〉「外郡」的部分中，亦有章如愚的傳記，但只有短短幾句：「章山堂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館編校兼宮講。所著書曰《山堂考索》」。²⁵可以肯定的是，在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之前，必定有相關資料支持章如愚為史館編校之職。值得注意的是，程敏政雖收錄了〈孺人葉氏節義傳〉一文，但並不認為章如愚為徽州人，而將之列為「外郡」。

三年後，在弘治 15 年（1502）刊行的《徽州府志》亦記載葉氏之事蹟，並於文末提及章如愚為之作傳之事，其文如下：

葉氏，名女同，婺源中平人，娉同邑程士龍，方行而士龍卒，……山堂章如愚為之傳。宋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官至迪功郎史館編校文字兼宮講，所著書曰《山堂考索》，《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畧〉列之外郡，今按山堂所撰〈婺源葉氏節義傳〉稱「吾鄉葉氏」，則山

²³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2004），卷 98〈行實〉，頁 2543-2544。

²⁴ 陳曄仁，〈《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07，頁 177。

²⁵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無卷，〈先賢事畧下（外郡）〉，頁 59。

堂乃徽人也，但不知的爲何縣耳，特記之以俟再考。²⁶

此文更進一步說明葉氏女的事蹟，並將細節交待的更加清楚。在結尾則附上章如愚的傳記，此小傳的內容與《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畧〉「外郡」的內容大同小異。最後加上方志編纂者評述，他認爲就〈孺人葉氏節義傳〉一文內容而言，《新安文獻志》不該將章如愚列入外郡。因此《徽州府志》的作者認爲章如愚必爲徽州人士，只是《新安文獻志》不察，而將之列入外郡，因此章氏出身具體屬於何縣則尙待考察。

至明代萬曆年間，徽州當地所修的《歙縣志》中，更直接出現章如愚就是徽州歙縣人的記載。²⁷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後來錢士升撰著《南宋書》時，就採納了弘治《徽州府志》、萬曆《歙縣志》的說法。因此可見錢士升撰寫的章如愚傳明顯成爲了一種典型，被後來的地方志編纂者援引，如到了清代，乾隆年間刊行的《歙縣志》就明顯以錢士升寫的章如愚傳爲主，不只文句相同，也將章如愚與鄭樵、馬端臨相提並論，顯然受到錢士升撰寫的章如愚傳之影響。²⁸

章如愚爲徽州歙縣章祁人的說法究竟可不可信？錢士升所撰的章如愚傳究竟能否爲我們採用？以下將從四個方面來討論。第一，傳記的記載詳略程度。明正德《群書考索》中的小傳在具體事蹟較爲詳細，並有活動年代可考；《南宋書》中的章如愚傳有大半篇幅偏向個人的描述，具體事蹟較粗略，並且完全未見其活動的時間點。兩相比較之下，前者的描述較爲可信。

第二，其他史料的從旁印證。如前所述，章如愚爲婺州人的資料較爲完善充足，從宋至明皆有史籍記載。尤其在金華的地方文獻中，有當地在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的進士榜單，其中就列出了章如愚之名。²⁹相反的，在徽州地方文獻中的進士榜單，則無章如愚的資料。

第三，徽州地方文獻本身的自相矛盾。程敏政在《新安文獻志》中，收錄章如愚提及「吾鄉葉氏女」的〈孺人葉氏節義傳〉一文，這對於章如愚爲章祁人的說法上有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從程敏政將章如愚列在〈先賢事畧·外郡〉一舉，可看出他並不認爲章如愚就是徽州人士。³⁰雖然明清的徽州地方志多採章如愚爲徽州人的說法，但是到了清道光七年（1827）刊行的《徽州府志》時，所採用的已不是《南宋書》的章如愚傳記：

²⁶（明）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12，頁173。

²⁷見（清）馬步蟾修、夏鑾纂，《徽州府志》（台北：成文，1975），清道光7年刊本，卷11-4〈文苑〉，頁913。在章如愚傳中記載「萬曆《歙縣志》云俊卿歙章祁人」。

²⁸（清）張佩芳修、劉大櫟纂，《歙縣志》（台北：成文，1974），清乾隆36年刊本，卷10〈文苑〉，頁807。

²⁹（清）鄧鍾玉等纂修，《金華縣志》（台北：成文，1970），清光緒20年修，民國23年鉛字重印本，卷6〈人物〉，頁265-267。

³⁰（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無卷，〈先賢事畧下（外郡）〉，頁59。

章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自幼穎悟，負才尚氣，登慶元進士，初授國子博士，擢知制誥，時詔勅皆出其手。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鄉，潛心著述，結山堂數十間，與學者講論道義，遠邇賢尊師之。及卒，門人諡為山堂先生，著有《群書考索》及文集百十卷行世。嘉靖《府志》、《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畧〉列俊卿外郡，今按俊卿所撰〈婺源葉氏節義傳〉稱「吾鄉葉氏」，則俊卿乃徽人也，但不知的為何縣，特記之以俟再考。見邵經邦《宏簡傳》。萬曆《歙縣志》云俊卿歙章祁人。

31

從上引文可看出，《徽州府志》編纂者採用的是較為通行的章如愚傳記，代表其認可章如愚為婺州金華人，僅在最後加上另一說法的質疑，可見在方志編纂者對此問題無法立即做出判斷。這段文字也透露出另一現象，《歙縣志》比起《徽州府志》更肯定章如愚為徽州人之事，自萬曆《歙縣志》編行以來，歙縣的方志編纂者大多將章如愚視為徽州人，此與徽州的方志編纂者採懷疑態度不同。³²因此，徽州的地方文獻對章如愚的定位並不清楚，甚至互相矛盾。

第四，引出章如愚為章祁人說法的〈孺人葉氏節義傳〉有沒有可能記載有誤？在明代嘉靖 45 年（1566）刊行的《徽州府志》中，有一絲線索可尋：

葉氏名女同，婺源中平人，聘同邑程士龍，方行而士龍卒。女同聞訃，請于父，往哭之，誓不再適。覓其親從子為嗣，事舅姑，以孝稱。縣以其事上于朝，特賜綸命，封孺人，表其門為列女坊。舊志章如愚為之傳，今查編校胡升撰。³³

此文所稱的「舊志」，應即是指明代弘治 15 年（1502）出版的《徽州府志》，前面已經引述過內文，當時的方志編纂者認為是章如愚所撰，而此處卻說「舊志章如愚為之傳，今查編校胡升撰」。嘉靖《徽州府志》的編纂者考察〈孺人葉氏節義傳〉的作者，認為此文應是胡升所著。編纂者據何判定，並沒有資料留下，其根據已不得而知，但或許可以從胡升的事蹟加以推究。

胡升是何方人士呢？胡升為南宋婺源人，時代比章如愚略晚，以下是胡升的小傳：

胡升（1198～1281），字潛夫，號定庵，婺源人。登淳祐十二年進士，

³¹ （清）馬步蟾修、夏鑾纂，《徽州府志》，卷 11-4〈文苑〉，頁 913。

³² 明代萬曆，清代乾隆、道光，民國所修的《歙縣志》，皆記載章如愚為歙縣人，並且是以《南宋書》章如愚傳為底本撰寫。見（清）張佩芳修、劉大櫟纂，（乾隆）《歙縣志》、（清）勞逢源、沈伯棠等纂修，（道光）《歙縣志》、（民國）石國柱等修、許承堯纂，《歙縣志》。

³³ （明）汪尚寧等纂修，（嘉靖）《徽州府志》（台北：成文，1983），嘉靖 45 年刊本，卷 20〈列女〉，頁 1566。

授國史編修。寶祐四年，丁大全據言路，逐尤煊，升以連誣，被謫九江，徙臨汝，又徙南安。升學於葉味道，學有根源，著有《四書增釋》、《丁巳雜稿》。元至元十八年卒，年八十四。³⁴

在胡升的生平經歷中，有幾項重點與〈孺人葉氏節義傳〉相吻合。一是胡升為婺源人，故與葉氏女同鄉此點無疑；二是胡升的確曾進入史館工作，弘治《徽州府志》亦說他「入史館，授國史編校」，³⁵此經歷的確與〈孺人葉氏節義傳〉的記載較為相近；三是〈孺人葉氏節義傳〉開頭提到的「頃謫南安」一事，在胡升的經歷中，的確有謫徙南安之事。而上述這幾點，卻是在通行的章如愚傳中未見到的，故嘉靖《徽州府志》提出的說法，其可信度的確較高。奇怪的是，在嘉靖《徽州府志》之後的徽州方志編纂者，卻未將此說法列入考慮，依然認為此篇是由章如愚所撰。直到清道光年間才開始接受章如愚為金華人的說法。

既然〈孺人葉氏節義傳〉不是章如愚所撰，那麼《南宋書》中〈章如愚傳〉的真實性就值得商榷了。錢士升在寫作《南宋書》的章如愚傳時，很可能受到徽州地方志的誤導，而將胡升的生平經歷與章如愚錯置。因此才會與通行的章如愚傳差異如此之大。故述論章如愚的生平時，對於《南宋書》的〈章如愚傳〉就必須慎加考慮。

討論了章如愚的籍貫，接下來是其活動時期。章如愚的生卒年代為何？傳中並未詳其生卒。若以章如愚在寧宗慶元年間登進士第的情形來看，略可推知其生年。在元代吳師道《敬鄉錄》中有更清楚的說明，章如愚為慶元丙辰（1196）進士，根據李弘祺在《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一書中的推測，宋代進士及第者的平均年齡為三十歲，因此向前推約三十年，³⁶大概是章如愚的生年，故章如愚很可能是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出生的。關於章如愚的卒年，也只能透過推算得知。現存宋版的《群書考索》為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的殘本，書前有汪有開之序，其中說到章如愚「書成而白玉樓召矣」，³⁷代表章如愚在此版書刊刻之前早已逝世。章如愚的卒年雖然不詳，但可知其葬在何處。清代《浙江通志》中記載：「宋知貴州章如愚墓，萬曆《金華府志》在八石谿」，³⁸而清代的《大清一統志》中，更進一步記載：「章如愚墓在蘭谿縣八石溪」。³⁹雖然章如愚為婺州金華人，但在去逝後是葬在鄰縣的八石溪。

³⁴ 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1984），頁 1554。

³⁵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 8，頁 15。

³⁶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1993），頁 249。作者根據翁同文的 *Répertoire des dates des hommes célèbres des Song* 一書之研究，推測宋代進士及第者的平均年齡為三十歲。

³⁷ 引自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文獻》，22（1985），頁 94。

³⁸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39，頁 445。

³⁹ （清）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299，頁 229。

根據上述粗略推算，可將章如愚的生平分成幾個歷程。一為求學階段，大約為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至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二為仕宦階段，自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至宋寧宗開禧（1205-1207）初年；三為歸鄉講學階段，自宋寧宗開禧（1205-1207）初年起，最多至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下文將據此三階段，對章如愚的生平作一綜述。



第二節、章如愚的生平經歷

一、求學

關於章如愚的求學經歷，在其傳中未曾提及，但是這與他的學術流派與思想發展有關，因此必須詳加考訂。在南宋王柏（1197-1274）為楊某寫的〈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中，記載如下：「麗澤收聲，其門人橘坡王先生、山堂章先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⁴⁰此段文字透露出幾個要點，第一，這裡提到的「麗澤收聲」，可能是在宋寧宗慶元黨禁（1196）的影響下，麗澤書院被迫停止講學時的情形。第二，王橘坡、章山堂（章如愚）、誠齋（陳震）三人皆為麗澤門人。王橘坡未知其生卒，陳震則是紹熙四年（1193）進士，與章如愚相差三年，此三人有可能在同一時期就讀於麗澤書院。簡而言之，章如愚的求學歷程與麗澤書院密不可分。

「麗澤書院」是呂祖謙與其弟呂祖儉在婺州明招山創立的，⁴¹此書院的講學活動自乾道二年（1166）始，期間呂祖謙病逝於淳熙八年（1181），之後由呂祖儉、呂祖泰繼續主持麗澤書院的講學活動，直至慶元二年（1196）呂學被禁為止。章如愚的求學歷程從其考取進士向前推二十年，約是1176-1196年這段時間，有蒙呂祖謙親自指導的機會，但是大部分時間則是受呂祖儉、呂祖泰的教導。

章如愚在麗澤書院中的學習情形為何？就學習環境而言，基本上章如愚不用擔心書院中的伙食問題，因為呂祖謙分派家中事務時，規定要有成員負責全院師生飲食，每日二膳，若有疾病，亦有藥物補助。⁴²在麗澤書院的學習有其規範，呂祖謙制定了多項學規，如《乾道四年九月規約》、《乾道五年規約》、《乾道六年學規》、《乾道九年直日須知》，在這些學規中，其中規定了與父母、兄弟、宗族、朋友相處之道，並強調同學間的互助合作、互相學習。在《乾道五年規約》中則更具體說明如何與同學互相學習，呂祖謙要求學生有寫日記的習慣，將平日所疑記在簿中，可與同學互相切磋請教。⁴³除了在同學間的學習上有所要求，呂祖謙更強調學生之間的應對進退之禮，如《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的規定中，詳細說明各地在籍人書信往來應注意的禮節。總而言之，麗澤書院的學規強調學生之間的相處，不只要在課業上有互助進益，其交往方式更應合乎一定程序。

就授課內容而言，當時的授課講義目前可知有由呂祖謙親自編寫的《麗澤講

⁴⁰（宋）王柏，《魯齋集》，卷20，頁289。

⁴¹潘富恩、徐慶餘，《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1992），頁397。

⁴²（宋）呂祖謙，《東萊集》（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別集卷1〈宗法條目〉，頁117。

⁴³（宋）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5〈乾道五年規約〉，頁205。

義》、《東萊博議》，目的是爲了幫助學生考取科舉之用。⁴⁴《麗澤講義》即後來門人輯錄的《麗澤論說集錄》，內容包括了呂祖謙講《易》、《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的部分，以及講論「史」和其餘無法分類的雜說。《東萊博議》則是以《左傳》爲主，從中發揮自己的觀點和想法，曾經作爲麗澤書院學生習作時的範文。除此之外，尚有《歷代制度詳說》一書，被視爲是「本家塾私課之本」，⁴⁵內容共分爲十三門，分論各種政治制度，先簡介制度源流發展，後再附詳說以表達自己意見，應是用於麗澤書院之課堂教學。前面曾經提及，呂祖謙編寫講義是爲了要幫助學生考科舉之用，由此可看出，呂祖謙雖注重性命義理之學，但不代表他對科舉採忽視態度，這也影響到後來章如愚編纂舉子書的目標。呂祖謙除了《歷代制度詳說》之外，與《群書考索》性質相近的著作尚有《十七史詳節》。《十七史詳節》其實是呂祖謙的讀史筆記，共有 273 卷之多，全書節錄了許多史書內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是「宋儒不廢史學之明證」。⁴⁶此種節錄古書的寫作方式，與章如愚的寫作如出一轍。雖然我們未能直接證明兩者的因果關係，但是不能否認兩者有相似之處。《群書考索》的編纂方式將在下二章中提及。

關於呂祖謙的思想，向來是學界深究的課題之一。一般認爲，呂祖謙受呂氏家學的影響深遠。呂氏家學有幾個特點，一爲「不主一門，不師一說」，⁴⁷二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⁴⁸前者造就了呂學「調和」的特質，後者造就了對「史」的重視。在「不主一師」方面，錢穆認爲呂氏家學「都主調和斟酌，不使偏鋒；都喜平易近切，不唱高調；都尙謹慎篤厚，不走險路」。⁴⁹此外，麗澤書院雖名列宋代四大書院之一，但是其講學模式卻不同於其他書院。基本上由呂祖謙主講，曾先後邀請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宣、葉適、陳亮前來講學，⁵⁰由此可以看出麗澤的教導方式有不主一師的特點。章如愚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之下，可以習得各家之長，也致使他有不拘一家之說的爲學態度，《群書考索》兼集眾說的特色可能亦與此有關。

在「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方面，可以連結到呂氏家學重「史」的特色。想要「多識前言往行」，便須求諸文獻典籍，因此容易轉入史學。⁵¹呂學的重史，其實與浙東的學風息息相關。元代蘇天爵曾論浙東學風：

南渡之初，一人大賢既以其學作新其徒。呂成公在婺，學者亦盛，同時有聲者有若薛、鄭之深淳，陳、蔡之富贍，葉正則之好奇，陳同父

⁴⁴ (宋)呂祖謙，《東萊博議》(台南：大東，1969)，〈序〉，無頁碼。

⁴⁵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卷 135，頁 2798。

⁴⁶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65，頁 1415。

⁴⁷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1986)，卷 23，頁 526。

⁴⁸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36，頁 704。

⁴⁹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台灣學生，1977)，頁 198。

⁵⁰ 秦玉清、張彬，〈呂祖謙與麗澤書院〉，《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 (1999.3)：33。

⁵¹ 李宗翰，《呂祖謙之歷史思想》，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8，頁 4。

之尚氣，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見于世。其為文也，本諸聖賢之經，考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官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襲，究其異同，參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用。⁵²

當時浙東諸子，如呂祖謙、薛季宣、葉適、陳亮等人，皆重視漢唐歷史，尤其在制度方面皆有研究。清代章學誠曾說：「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⁵³這樣的學風深刻影響章如愚著作《群書考索》的走向，下章在分析《群書考索》的內容時，將可看到《群書考索》做為一部類書，卻別偏重歷史的特色。總結以上所述，章如愚在浙東求學經歷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對求理解《群書考索》的著作動機以及思想內容時，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二、仕宦

章如愚的仕宦之路只有短短的 10 年時間，從慶元二年（1196）登進士第至宋寧宗開禧初（1205-1208）罷秩歸鄉。在章如愚等人登進士第前一年（1195），寧宗即位，朱熹不滿寧宗重用韓侂胄，因而辭去為皇帝講書的經筵之官。韓侂胄掌權，寧宗在慶元二年（1196）指理學為偽學，遭到牽連的大臣和儒者多達 59 人，呂學也在禁止之列，如呂祖儉、呂祖泰皆受牽連。到了慶元四年（1198）詔禁偽學，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呂學出身的章如愚考取進士，進入朝中。

章如愚在慶元二年（1196）登進士第，⁵⁴跟他同年進榜的金華人士有宋甦、夏明誠、王象之、潘自牧、葉秀發、姜彝。⁵⁵其中王象之與潘自牧值得多加留意。王象之出身於仕宦之家，從小就與父親宦遊四處，以博學多識著稱。⁵⁶其父王師古與呂祖謙之弟呂祖儉為友，王氏父子很可能也受呂學影響。⁵⁷王象之著有《輿地記勝》二百卷，流傳至今已有殘缺。⁵⁸此書蒐羅了大量資料，依據地名進行分類，記載南宋各地重要山川、歷史景點，並收錄文人的記詠詞章。⁵⁹《輿地記勝》雖為類書，但是以地理為主，與章如愚的《群書考索》走向並不相同。

⁵² （元）柳貫，〈序〉（蘇天爵著），《柳待制集》（江蘇：廣陵，1983），頁 1-2。

⁵³ （清）章學誠，〈邵與桐別傳〉，《章氏遺書》（台北：遠流，1983），卷 18。

⁵⁴ 關於與章如愚同年登榜的人物，某些記載似有訛誤。如清代王崇炳撰著的《金華徵獻略》中，提到章如愚「登慶元丙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清代王梓材的《宋元學案補遺》中也說章如愚「登慶元進士，與真西山同榜」，然而查閱真德秀的相關資料，卻發現其為慶元五年（1199）進士，晚了章如愚 3 年，兩人並非同年。見（清）王崇炳撰，《金華徵獻略》（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10〈文學〉，頁 176、（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1962），卷 79，頁 48。

⁵⁵ （清）鄧鍾玉等纂修，《金華縣志》，卷 6〈人物〉，頁 265-267。

⁵⁶ 李勇先，《《輿地記勝》研究》（四川：巴蜀，1998），頁 1-13。

⁵⁷ （元）吳師道，《敬鄉錄》，卷 12，頁 273。

⁵⁸ 李勇先，《《輿地記勝》研究》，頁 176。

⁵⁹ 李勇先，《《輿地記勝》研究》，頁 16。

潘自牧出身自儒學世家，其父潘景憲曾遊於呂祖謙之門，並執弟子禮，可見其學與呂祖謙亦有關係。潘自牧所著之《記纂淵海》亦是類書，其書共有二十二部、一千一百九十五門，將事物分門別類，再放入所選資料，其特色是以記言為主，與前輩類書以記事為主有所不同。

由上所述可知，在此年登科進士的金華人中，就有三位擅長史料的編纂和整理，且皆以知識廣博聞名，雖然三人著作著重的焦點不同，但是皆有收集、分類資料的特點，可見當時在金華地區的學術風氣，似有彙整知識、求博求廣的取向。

章如愚在登進士第後，旋即擔任國子博士宮講之職，⁶⁰包弼德對此感到懷疑，認為剛登科的進士擔任博士的可能性不大，這是明代《群書考索》爲了增加銷售而加上的用詞，⁶¹這點值得參考。我們可以推測，章如愚在擔任國子博士之前，應有其他的官職經歷，因爲在另外的史料中，記載的是「累官」、「仕至」國子博士。⁶²國子博士即國子監博士，在南宋時期職掌是負責教導太學生。⁶³「宮講」在章如愚史料中有時也作「官講」，但此銜仍未明其職守，推測可能爲指導、講學之類的官職。包弼德解爲「東宮直講」，⁶⁴雖未知其推測根據爲何，但宋代東宮確實有「東宮講讀官」一職，負責皇太子的學習。

在明版本《群書考索》中，記載其「初授國子博士，凡詔誥制勅皆出其手。」然而，草擬詔誥制勅並非國博宮講的職責，是否缺載了一段官職經歷？此問題在明代邵經邦的《弘簡錄》中得到解答。《弘簡錄》中說章如愚「初授國子博士，擢知制誥」，⁶⁵因此章如愚在擔任國博宮講之後，接著擔任的其實是知制誥，才得以撰寫朝廷的詔令。

章如愚在朝中待了不長的一段時間，隨即被派往地方。大多數的史料中皆記載章如愚被派至貴州，如明版本《群書考索》、明代應廷育《金華先民傳》、明代邵經邦的《弘簡錄》等，皆稱其「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⁶⁶但在清代《浙江通志》中則記載其「知眉州」，應爲訛誤。⁶⁷貴州，在宋代屬於廣南西路，⁶⁸地處偏僻，周遭有許多少數民族分布。宋朝對廣南西路的經營向來是消極且輕視

⁶⁰ 見明版本《群書考索》稱其「初授國子博士」。

⁶¹ Peter K. Bol,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頁 645。

⁶² 見（元）吳師道，《敬鄉錄》，卷 13，頁 280。（明）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卷 7〈文學〉，頁 448。

⁶³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1997），頁 346。

⁶⁴ Peter K. Bol,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頁 646。

⁶⁵ （明）邵經邦，《弘簡錄》，卷 179〈道學〉，頁 189。

⁶⁶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頁 3。

⁶⁷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 126，頁 343。

⁶⁸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1985），卷 90〈地理志〉，頁 2242。

的，大多以羈縻州的方式治理。⁶⁹因此貴州設置了防禦使、團練使等武備職務，以進行有效的統治。知州必須面對蕃民問題、推行化民政策，在如此難以治理的區域，其中的不易與辛苦可想而知。

章如愚在宋寧宗開禧（1205-1207）初年被朝廷召回，聽取其意見。史料中並未說明其被召之因，也未記載章如愚針對什麼樣的問題，給了什麼樣的意見。但是從「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鄉」這幾句可知，⁷⁰章如愚在開禧初年對於時政發表了一些看法，而這些看法抵觸了當時宰相韓侂胄的意見，因而造成他罷秩歸鄉的結果。推究當時的政治情勢，開禧初年，國之大事，就是由韓侂胄所發起的「開禧北伐」，向當時的金章宗宣戰。章如愚被召上疏，或許就是要他對此事提出意見，而他極可能站在反對的立場。

關於章如愚在對外族用兵的意見方面，《群書考索》〈夷狄門〉中透露了一些線索。章如愚在《群書考索》〈夷狄門〉中選擇了他認同的制夷意見，其中以葉適的史論居多。葉適在當時雖然是對金主戰派，但是認為北伐時機未到，在北伐前就上書勸寧宗暫緩，修實政、行實德，待變弱為強後，再行北伐之事，並提出許多具體的措施。⁷¹但是並不被韓侂胄接受。葉適與章如愚同樣受浙東學術影響，葉適更是浙東學術的代表人物，我們可以推想，章如愚在對外族用兵的政治立場可能與葉適相同，因為他們多用歷史經驗針對現狀提出建議。然而在開禧初年的政治情況下，章如愚並無葉適的地位與名聲，可能在意見不被重視的情況之下，罷官而去。

三、教學

章如愚在宋寧宗開禧（1205-1207）初年罷秩歸鄉，史載他歸鄉後「乃結山堂數十間，以講道義，故遠邇之士，咸尊師之」，⁷²可見章如愚回到金華後以教學為務，並且構築了一個私人的教書場地，稱之為「山堂」，並且受到當地士人的重視。章如愚的教學受到士人推崇也不無原因，前面曾經引述過一段史料說王橘坡、章如愚、陳震三人「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⁷³他們對於提拔後進都負有使命感，顯見章如愚等人對於教學有極高的熱誠。

章如愚並不只有在「山堂」教書的事蹟。宋代方逢辰的〈橫城義塾記〉中，記載了章如愚在他處教書的狀況：

橫城義塾者，東陽蔣君沐澤甫之作也，橫城其居之地也，其鄉之長衢、

⁶⁹ 安國樓，《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台北：文津，1997），頁 5-9。

⁷⁰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頁 3。

⁷¹ （宋）葉適，《水心集》（台北：中華，1965），卷 1，〈上寧宗皇帝劄子〉，頁 12-15。

⁷²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頁 3。

⁷³ （宋）王柏，《魯齋集》，卷 20，頁 289。

安恬，本東萊、水心、說齋、岷隱、山堂講道之所，故東陽至今彬彬多美才。⁷⁴

東陽縣同屬於婺州，與金華縣相距不遠，上述史料中記載了長衢、安恬兩間義塾，原本為呂祖謙、葉適、唐仲友、戴溪、章如愚講道之所，東陽縣因為有了這些先生的教導，使當地產生許多有才學、品格良好之士。

王柏的〈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一文，前半介紹了婺州東陽縣的士子求學環境，其中提到章如愚等人在當地的教學，以及其對東陽學習風氣的影響：

橘坡王先生、山堂章先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而靜軒呂公克紹家世，相與切磨其間，鄉評之所取重。雖不能不以舉業為工程，然躬行之實，講說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士有所則，數十年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泯也。⁷⁵

可見這些士人在當地的教學活動，形成一股重視文教的風氣，代代相承，非但風俗淳美，而且人才輩出。

雖然明版《群書考索》稱章如愚「講道義」，但其教學內容究竟為何？從浙東地區的文化背景來看，當地的教學不可能置功名不管。浙東地區在宋代一直是科舉考試的常勝軍。兩浙路在區域行政上，於全國占的面積很小，但是進士比例卻相當高，並且浙東進士數目多於浙西。⁷⁶這不只因為文風鼎盛與經濟繁榮的關係，很可能也與當地重視科舉有關，章如愚的《群書考索》的編纂就是一個例證，在《敬鄉錄》中曾記載章如愚「著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⁷⁷無論《考索》一書最初是否是為了舉子編纂，它在其後都發揮了幫助學子考科舉之功用。在此之前的當地人士，如呂祖謙，也已經編寫過《歷代制度詳說》這類的舉業書籍。又如陳傅良的《永嘉八面鋒》一書，也是為舉子所編。其後更有黃震的《古今紀要》，王應麟的《玉海》。可見此地區對功名科舉的重視。

章如愚處於這樣的背景下，其講學便不可能脫離科舉。如前所引王柏撰著的〈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一文，其中提到的東陽學者群，大多是「以舉業為工程」，⁷⁸其中也包含了章如愚。可知，當時前來求學的士子，很可能即以舉業為目標。如在王柏為樓叔茂寫的墓誌銘中，提到樓叔茂年輕時，為求舉業順利，曾經「從誠齋國錄陳公、山堂國博章公學」，⁷⁹可見章如愚在當時是重要的舉業名師之一。

⁷⁴（清）黨金衡、王恩注，（道光）《東陽縣志》，頁109。

⁷⁵（宋）王柏，《魯齋集》，卷20，頁289。

⁷⁶黃寬重，〈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宋史叢論》（台北：新文豐，1993），頁100。

⁷⁷（元）吳師道，《敬鄉錄》，卷13，頁280。

⁷⁸（宋）王柏，《魯齋集》，卷20，頁289。

⁷⁹（宋）王柏，《魯齋集》，卷20，頁289。

從章如愚的例子可看出，一位在宋代罷秩歸鄉的士人，其晚年生活即是在著述與教書中渡過，並與科舉密不可分。章如愚寫作科舉類書，又為舉業名師，這一類的人在南宋或許並不少見，但是往往由於無卓絕的識見而為人忽略。從章如愚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士人的一生，從讀書求學、參加科舉、及第任官，到貢獻所學、忤逆權貴、辭官歸鄉，晚年築舍聚徒講學、編著舉業典籍，其著作既有實際功用，亦藉以記載自己的思想與觀念。章氏一生多少反映南宋士人走過的共同軌道，透過對章如愚生平的觀察，我們正可看見這一類士人的生命縮影



第三節、《群書考索》成書

一、宋代類書編纂概況

《群書考索》一書的撰著過程，並無資料留存傳世，章如愚也未留下隻字片語交代其著述動機。然而我們可以從當時其他類書的編纂，來了解章如愚在成書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境，以及解決的方法。

潘自牧在其《記纂淵海》序中，提及其成書經歷，可讓我們藉以了解當時編著類書的概況，

自少嗜書，欲用前輩類書、記事體，參以纂言，自成一編，獨唱興和，或坐或止。東陽賈君昉成甫，幸聘吾妹，間語及之，於是慨然從臾，十涉春秋，繙卷數萬。而書稍就，又得金華汪君淳叔川取決而增益之。至於校理差誤、考訂編旁，則又叔川之功，為與記纂之成，蓋非出一人之胷絃矣。⁸⁰

潘自牧自小便喜歡讀書，也喜歡記錄、整理前人的作品，耗費十餘年的功夫才完成了這一部著作。推究《記纂淵海》的成書歷程，潘自牧在慶元二年（1196）考取進士，在慶元六年（1199）出版《記纂淵海》，可知其在入仕之前就已開始進行這樣龐大的工作。而此工作並非由他獨自一人完成，收集材料、編寫內文這部分似乎不假他人之手，但是完工後的增補、校對、整理，則有同鄉友人相助。

另一則編寫類書的例子，則是南宋初年閩人葉廷珪的《海錄碎事》，他在自序中說到：

始予為兒童時知嗜書，家本田舍，貧無書可讀。曾大父以差法押綱至京師，傾行橐市書數十部以歸，因得盡讀之。其後肄業郡學，升貢上庠，登名柱籍，牽絲入士，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多，未嘗一日手釋卷，秩食以頤口，怠以為枕，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得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之曰海錄。……每讀文字見可錄者信手錄之，未嘗有倫次。閱歲既久，所編猥繁，檢閱非易，嘗以為病。紹興十八年秋，得郡泉山，公餘無事，因取而類之為門百七十五，為卷二十有二。雖摘裂章句，破碎大道，要之多新奇事，未經前人文字中用，實可以為文章攸助，豈小補哉。⁸¹

⁸⁰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中華，1988），頁4-6。

⁸¹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上海：上海辭書，1989），頁6-7。

從這則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宋代書籍流動仍有其限度，非士人家庭者，必須遠到京師購書，或向士大夫之家商借，而這或許也是「類書」產生的原因。從上引文可知，葉廷珪在他的讀書生涯中，不斷讀書、借書、抄錄，才累積了這些資料，其編著類書的時段其實橫跨了四、五十年。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類書編纂者的工作有兩大部分，先是抄錄，接著再將之系統化。抄錄是最基本的工作，這在宋代另一部類書《錦繡萬花谷》的編纂過程中，亦可得見。

《錦繡萬花谷》不著撰人，成書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其自序一開始，也同上述各序，先敘述其在窮鄉僻壤得書之不易，以及自己愛書成癡的個性，作者就形容自己讀書「如小兒之於飴劑有加而不能自止」。⁸²接著作者描述其抄書的情形，起初是「二三年間抄益多，然而瑣碎而無統」，⁸³且由於任職的關係，這些資料無法帶在身上，最後往往遭到破壞。但是作者仍舊繼續進行抄錄工作，並且「晚益困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其抄錄的種類也愈來愈多。作者完成了此部著作，但也感嘆自己「困於時也」，⁸⁴能見能用的書不夠多，所以此書仍有不足，最後希望將來的人能夠「見吾之艱難如此」。⁸⁵

從上述三部類書的著作過程，可以發現幾個難題。首先，是書籍取得的問題，抄錄類書必須要有大量的書籍提供資源，即使在書籍流通相當發達的宋代，取得書籍仍有難度。第二，大部頭的類書，即使皆由一人完成，但在完成後考訂、校對方面，仍需要人力支援。第三為「抄錄」與「系統化」的問題，類書編纂者在抄錄各種資料後，必須花心思分類排比，以免「瑣碎而無統」。⁸⁶類書雖往往被視為單純的資料彙編，但由上所述可看出，編纂類書並非易事。透過這些類書編纂者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推想章如愚編纂《群書考索》的過程，可能也有相似的處境。

二、傳寅的《群書百考》

如上文所論，編著類書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而章如愚撰寫《群書考索》一書，不能完全當作是個人的成就，也必須結合類書編纂者的著作傳統。在元代吳師道《敬鄉錄》的傳寅傳中，提到其著作《群書百考》：

同叔所著有《群書百考》，章如愚俊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今《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者矣。⁸⁷

⁸²（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台北：新興，1974），頁1。

⁸³（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頁2-3。

⁸⁴（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頁5。

⁸⁵（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頁5-6。

⁸⁶（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頁2-3。

⁸⁷（元）吳師道，《敬鄉錄》，卷13，頁280。

到了清代，俞樾亦說：

至今章氏山堂考索猶存，傅氏之書實章氏之先河，《卓約》之書爲考索之精騎，惜皆失傳矣。⁸⁸

可見一般認爲，傅寅的《群書百考》是章如愚《群書考索》的先河。此處的「同叔」、「傅氏」指的就是傅寅。關於傅寅的資料，最爲詳盡者，可見於元代黃潛所著〈杏溪祠堂記〉。傅寅（1147-1215），字同叔，爲婺州義烏縣人，時代約早章如愚 20 年。年少時曾至東陽向唐仲友學，由於學識淵博，唐仲友曾讚：「吾益友也！」亦曾向門人說：「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其《群書百考》亦受呂祖儉欣賞。平居之日與馬之純、孫祐相善，亦受彭龜年、章穎、葉適等名士推崇。晚年居住於東陽縣，隱居不仕。⁸⁹

既然《群書考索》淵源於傅寅的《群書百考》，此書更需一探。然而《群書百考》現已失傳，其內容究竟爲何？我們只能從他人的評論中推測而知：

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群書百考》。太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為集先儒之大成矣！」⁹⁰

從文中可知，《群書百考》是由各類主題的圖文所組成，《禹貢圖》則是其中之一，呂祖儉十分欣賞。雖然《群書百考》、《禹貢圖》現皆不存，但傅寅留存至今的作品尚有《禹貢說斷》一書，這兩者之間必有密切關係。

喬行簡爲《禹貢說斷》作序，其中說道：⁹¹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為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曆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憊。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為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群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

⁸⁸ （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台北：新興，1986），卷 11，頁 248。

⁸⁹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台北：新文豐，1988），卷 14，頁 118。

⁹⁰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14，頁 117。

⁹¹ 喬行簡（1156-1241），字壽朋，東陽人，從學於呂祖謙，曾拜參知政事、右丞相。傳見《宋史》，卷 417，頁 12489-12495。

可見《禹貢圖》原為《群書百考》之一部分，由於《群書百考》份量太多出版困難，在傅寅去世之後，才將其中討論〈禹貢〉的部分出版為《禹貢說斷》。從這段資料可以看出傅寅撰著此書的過程，其家貧無書，必須多方向人商借才有足夠的資料，這在葉廷珪的例子中也可得見。傅寅透過細讀深究這些資料，再將這些說法分類編排，以自己的意見進行判斷，此亦透露出類事之家善於蒐集、分類的為學特色。

從上文可知，喬行簡認為南宋科舉之弊即為不重實學，但傅寅能博覽群書，以成其學，實屬難能可貴。另一方面，此文透露出傅寅亦為舉業師的事實，就身分與著述類型來說，傅寅與章如愚其實有許多共通點。喬行簡慨歎今學不若古，無利於科舉的學問皆無人重視，傅寅等人雖是舉業之師，其著作卻能發揮近古的精神。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婺州舉業之師往往都有善於整理、排比資料的長才，他們編纂的著作也都有共同的特性，重視制度源流、兼採各家說法。

章如愚與傅寅之間的關係值得深究，可惜無更多的直接的資料說明。但是從間接的資料來說，兩人或許曾有交流的機會。

（呂祖儉）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為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⁹³

傅寅曾被呂祖儉邀至麗澤書院講學，其《群書百考》甚至被作為教材，甚至也讓傅寅為學生解惑。雖然傅寅與章如愚的直接關係未見於記載，但是兩人透過麗澤書院很可能有所接觸。若章如愚當時在麗澤書院求學，即有可能在這樣的機會下接觸到傅寅的作品，甚至直接求教於傅寅本人。

另一方面，傅寅晚年在郡守的協助下，居住於婺州東陽的泉村，寧宗慶元二年（1196），傅寅因為呂祖儉等人遭黨禁被謫放，而杜門不出。⁹⁴章如愚則在寧宗開禧（1205-1207）初年罷秩歸鄉，也曾至東陽講學，在這段期間，兩人很可能有接觸的機會。

《群書百考》雖無留存後世，但是從當時人的閱讀心得來看，仍可得窺一二：

⁹² （宋）傅寅，《禹貢說斷》（台北：新文豐，1985），〈序〉，頁122。（清）朱彝尊，《經義考》（日本東京：中文，1978），卷94，頁507。

⁹³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60，頁108-109。

⁹⁴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14，頁118。

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并授，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兇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考》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⁹⁵

傅寅極度推崇《周禮》一書，因此在《群書百考》中特別對周代制度有一番考究。但傅寅並非只是空談上古之制，而是希望能正確的用之於國。由此也可以看出，傅寅對熙寧變法的慨歎，他認為若對周禮沒有一定的了解認識，猝然推行於實政，往往有害。

清代王崇炳認為傅寅的《周禮》之學出自唐仲友：

予讀唐悅齋（唐仲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為圖。今觀杏村（傅寅）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蒙恬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為竹簡漆書也。苟存三代聖王之心，即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哉？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銳欲復古如此，婺州諸賢亦猶此志也。⁹⁶

從這裡也可看出，宋代婺州諸賢重視《周禮》，並希望能付諸實行，是一個當地學者共有的普遍現象。若我們追尋《群書考索》的思想源流，從唐仲友到傅寅的這條線也不能忽視。雖然章如愚與其並無直接的師承關係，但是卻共同分享了婺州此時的學術氛圍。《群書考索》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不只承繼了傅寅《群書百考》的文本傳統，也承繼了婺州學者的學術風氣。

《群書百考》與《群書考索》兩部著作，大約都在南宋出現，但之後的命運卻完全不同。到了元代，《群書考索》仍是盛行的類書，《群書百考》卻較少人閱讀了。⁹⁷甚至到了清代，《群書考索》尚在，但《群書百考》已經失傳。⁹⁸就內容而論，兩書性質相同，但《群書考索》顯然比《群書百考》更加詳盡，因此較多人使用，或為此書得以留存的主要緣由，故產生了《群書考索》獨存的情形。即便如此，仍不可忽視《群書百考》一書，正是促成章如愚編纂《群書考索》之主因。

⁹⁵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14，頁117-118。

⁹⁶ （清）王崇炳，《金華徵獻略》，卷10，頁173-174。

⁹⁷ （元）吳師道，《敬鄉錄》，卷13，頁280。

⁹⁸ （清）俞樾撰，《茶香室四鈔》，卷11，頁248。

三、 呂中的增補

綜觀明版《群書考索》的篇目，共有 212 卷 4 集 55 門，如下所列：

表一、《群書考索》篇目表

前集 17 門 66 卷	六經門、諸子門、諸經門、諸子百家門、韻學字學門、正史門、聖翰門、書目門、文章門、禮門、儀衛門、禮器門、樂門、律呂門、曆數門、天文門、地理門
後集 10 門 65 卷	官制門、官門、士門、四學門、兵門、民門、財門、賦稅門、財用門、刑門
續集 17 門 56 卷	經籍門、諸史門、文章門、翰墨門、律曆門、律門、曆門、五行門、禮樂門、封建門、官制門、兵制門、財用門、輿地門、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
別集 11 門 25 卷	圖書門、經籍門、諸史門、禮樂門、曆門、人臣門、士門、財用門、兵門、夷狄門、邊防門

明版《群書考索》的分類與宋版不同，崔文印根據殘存的汪有開序文中，得知宋版原只有 100 卷，並且是以十干分成十集。然而宋本的《群書考索》現已不存，我們只能根據明版進行分析。⁹⁹在這些分類中，可以發現「財賦門」、「諸史門」、「文章門」、「財用門」、「經籍門」、「禮樂門」、「曆門」、「士門」、「兵門」這些名稱有重覆，其中「諸史門」、「財用門」還重覆了二次。並且，即使名稱未重覆，有許多的分類仍是相似的，例如「臣道門」與「人臣門」，或「圖書門」與「書目門」。崔文印認為這些重覆的部分是南宋呂中所增廣，但根據李偉國的研究，呂中所增廣的可能只有別集的部分。¹⁰⁰

因為在元明刻本中，別集有「溫陵呂中增廣」六字，代表現存《群書考索》經過呂中增補。故對於呂中，我們也必須做一番了解。呂中，字時可，為泉州晉江縣人，其時代比起章如愚較晚，是在理宗淳祐七年（1247）登進士，擔任肇慶府教授。後除國史實錄院檢閱，參與國史與實錄的編修。後遷國子監丞以及崇政殿說書，為皇帝講讀經史。¹⁰¹但因兄卒而請假歸鄉，第二年以秘書郎召回朝中，權臣丁大全忌之，因而出知汀州，後又主管成都玉局觀。留下的著作有《類編皇

⁹⁹ 崔文印，〈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頁 64-71。

¹⁰⁰ 見崔文印，〈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頁 64-71。以及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頁 91-98。

¹⁰¹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頁 45。

朝大事記講義》、《演易十圖》、《論語講義》、《治迹要略》，¹⁰²然而只有《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留存至今。

關於呂中的師承，在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辯證》中有一番考訂。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曾說呂中的《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一書，「前有興國軍教授劉實甫序，謂水心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則是書乃中平日講論稿本。葉適等爲之編次云」，¹⁰³意指呂中爲葉適之師。然而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辯證》中指出，劉實甫爲呂中寫的原序中記載的是：

予頃遊膠庠，有同舍示一編書，曰：此止齋水心之徒，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所以措之事業，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槩可見也。¹⁰⁴

從文意上看來，陳傅良、葉適才是呂中之師，反而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判斷不周。¹⁰⁵由此可看出，呂中雖非浙東人士，但是他的求學歷程卻與浙東息息相關。

從呂中的著作——《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傾向與浙學的相似之處。《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共二十三卷，內容涵蓋宋太祖到宋欽宗時期，按照時間評論當時的朝政概況，如政事制度、百官賢否，並分析當時的政策得失，此與《群書考索》重視當朝政治的特色相符。而浙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呂祖謙，也曾撰著《大事記》，然而未完成就已去逝。今日所見之《大事記》，內容從周敬王開始，至漢武帝爲止。雖體例與寫作內容和《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不同，但兩者皆以分析王朝政事、借鑑歷史興衰得失爲主。呂中的《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並沒有自序，因此無法得知其著作題材是否有其淵源，然而在浙學中已先有呂祖謙的《大事記》一書，承襲的意味濃厚。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呂中在浙東求學時，可能接觸到章如愚的《群書考索》。或許也與章如愚繼承傅寅的工作一樣，呂中認同這樣的學術著作，並加以增補。由此可看出，當時的浙東地區流行著編寫類書的風氣，士人欲透過編寫類書呈現其關懷，但編類書的工程浩大，並非人人都可進行這樣的學術工作，只能像章如愚與呂中，對現有的類書加以發揚或增補。「增補」雖然可能代表對現有作品的不滿意，但也代表對此作品有極大部分的認同。若深入研究《群書考索》一書的內容，或許可以了解在當時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

¹⁰² 呂中的生平資料見（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卷 51，頁 42。（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台北：台灣商務，1971），卷 33，頁 4-5。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香港：中華，1974），頁 510。

¹⁰³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8，頁 1836。

¹⁰⁴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台北：台灣商務，1971），頁 1。

¹⁰⁵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頁 510-511。

第四節、《群書考索》流傳情形

歷來的書目文獻學者對於《群書考索》版本流傳有諸多推測，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並且大多聚焦於版本的流傳，對於《群書考索》自宋之後的重要性和地位的轉變未加注意。以下將根據學界的研究成果統整規納，並試圖釐清《群書考索》在各朝功能性的轉變。

一、宋元時期的《群書考索》

《群書考索》在宋代確有出版，但是否由章如愚出版？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群書考索》前有汪有開之序：

山堂先生自書契以來至於今日，經史子集傳記之書充棟汗牛，反覆批覽，門分類析，編輯成書。上下數千載，鋪列數百條，援古証今，舉綱撮要，凡大議論、大制度、大沿革，嘻！盡之矣。……惜哉書成而白玉樓召矣！後生晚學，罕見其大全，同抱遺恨。惟中隱曹君盡得之，懼其傳之不博，有孤先生之用心，鏤梓以示同志，凡一百卷，厘為十集，摹印未竟，紙價增貴矣。第恐學者得書之易，不思其用力之艱，臨用檢覓，平時漫不加意，又豈先生之志歟！先生姓章，諱如愚，字俊卿，仕至國博宮講，山堂其自號，《考索》其書之舊名云。淳祐戊申良月望日，後學朝奉郎監行在權貨務汪有開敬題。¹⁰⁶

這裡提到「書成而白玉樓召矣」，可能章如愚在書成而未出版時就已逝世。直到中隱書院的曹氏將之刊行，而這裡指的「凡一百卷，厘為十集」可能也並非出於章如愚之手。而從中隱書院「新刊」此句可知，《群書考索》在宋代至少出版過兩次，在中隱書院淳祐戊申（1248）年出版前就已有一次，而這次是重新刊行。¹⁰⁷

《群書考索》宋刻本現今已無全本留存，陳曄仁先生的〈《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一文，其中對宋刻本《群書考索》流傳與收藏現況敘述最為完整，下表是參考陳曄仁、李偉國的著作製成：¹⁰⁸

表二、《群書考索》收藏現況

¹⁰⁶ 轉引自李偉國，〈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頁 94。

¹⁰⁷ （宋）章如愚，《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甲集）》（北京：中國，2008），目錄頁。

¹⁰⁸ 見陳曄仁，〈《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頁 171-193。及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頁 91-98。

宋版《群書考索》				
書名	版本	卷	原存	現存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刻宋印巾箱本	《官制門》十卷	(明)毛表 (1638-1700) (清)朱爲弼 (1770-1840) (民國)袁克文(1890-1931)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甲集十卷》	宋金華曹氏中隱書院刊本	甲集十卷	傅增湘 (1872-1949) 所見	未知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目錄十卷、丙集十卷、丁集十卷》	宋口山書院刊本巾箱本	目錄十卷、丙集十卷、丁集十卷	傅增湘 (1872-1949) 所見	未知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十卷丁集》	宋刊巾箱本	十卷丁集	傅增湘 (1872-1949) 1918 年所見	未知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刻本	卷9 丙集第一頁	周越然 (1885-1962)	似爲《宋元書式》中書影
《山堂考索》	宋小字本	十冊	周叔弢 (1891-1984)	未知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巾箱本	十冊木集	陳清華 (1894-1978) 陳國琅	中國國家圖書館
《山堂考索》	宋金華曹氏中隱書院	甲集 10 卷	王雨 (1896-1980) 所見	未知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丙集十卷》	未知	存四卷(卷四至六、八)	未知	北京圖書館 (中國國家圖書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	宋淳祐戊申(1248)金華曹氏中隱書院刊本	丁集十卷,己集十卷,甲集殘頁。	未知	上海圖書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未知	存十六卷	未知	天津圖書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金華曹氏中隱書院刊本	甲集十卷	北京中國書店	已於 2008 年印行出版
元版《群書考索》				
書名	版本	卷	原存	現存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	元延祐庚申（1320）圓沙書院刻本	前集 66 卷，後集 65 卷，續集 56 卷，別集 25 卷	未知	國家圖書館
明版《群書考索》				
書名	版本	卷	原存	現存
《群書考索》	明正德十六年（1521）劉洪慎獨齋刊本	前集 66 卷，後集 65 卷，續集 56 卷，別集 25 卷	未知	各大圖書館

由此表可知，現存宋本《群書考索》，其分類方式以天干為別，與後代不同。並且散佚的情形嚴重，無全本留存。元明兩代皆有再版，而兩者體例與宋代歧異甚大。

前面提到宋代的分集以天干為主，那麼到了元代又是如何呢？至少在元代，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百卷的版本：

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¹⁰⁹

從上亦可看出，《群書考索》的實用價值仍在，甚至被精簡為二十卷，方便科舉考試使用。而元代《群書考索》雖有一百卷的版本流傳，但是現存元代刊刻的《群書考索》卻是以前、後、續、別四集做為分類，卷數也增加到 212 卷，可見《群書考索》在宋元之際被增補修改，更離章如愚最初的版本愈遠。除此之外，元代的另一個指標性意義，在於書名的改變。在元之前，所稱皆為《考索》或《山堂考索》，即使認為其出於傅寅的《群書百考》，但仍未稱其為《群書考索》。直到元代刊行才加上「群書」二字，這也影響了明版《群書考索》的定名。

我們可以確定元代士人仍有使用此書的情形，在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更可看到實際上如何被運用：

¹⁰⁹ （元）吳師道，《敬鄉錄》，卷 13，頁 280。

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畧》、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畱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為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為名物度數之細而畧之。平日誠能沉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倣《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為舉業資而已。¹¹⁰

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繼承自朱子的讀書法，¹¹¹其中載明讀書的具體方法以及時間分配。在「制度」此區塊，程端禮便將《群書考索》列入。他更進一步敘述《群書考索》的成書經過，說明章如愚為學的方法，及值得學習之處。這些對制度細節的了解，正是格物窮理的展現，並且在擔任要職時有實際的幫助，並不僅止於作策之用。程端禮這一番話，點出了《群書考索》等書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這些書與治道密不可分，有實際的幫助，並不只用於考取功名而已。但另一方面，程端禮的呼籲也顯示出，元代大多數人仍將《群書考索》視為舉業之用。

二、明清時期的《群書考索》

前面曾提及，元代出版的《群書考索》已非宋版的分集方式，到了明代，《群書考索》仍採取元代四集 212 卷的方法。目前可知明代至少有建陽劉洪慎獨齋的刊本，刊行於明正德十六年（1521），此書前有鄭京之序：

《山堂考索》一書，乃宋儒章公俊卿之所編集，板行於世，間被回祿，失傳久矣。文獻故家，或有存者，又秘之以為己寶。乃者吾閩僉憲院公賔，巡歷抵建陽，手出是書，以示邑宰區公玉曰：「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蹟，君道臣道之宏遠，經史禮樂之淵懿，以至兵刑制置財用盈縮、官制邊防沿革，靡不深探本源，具載無遺……。」

……且因區宰初意復劉徭役一年以償其勞，劉自領命以來，與諸儒碩

¹¹⁰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台北：新文豐，1985），卷 2，頁 12。

¹¹¹ 程端禮（1271-1345），字敬叔，號畏齋，鄞縣人，端學兄。治朱子之學，薦授建平縣學教諭，累遷建康江東書院山長，除鉛山州學教授，以台州教授致仕。至正五年卒，年七十五。著有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畏齋集六卷。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新文豐，1982），頁 1433。

校讐維謹，鳩工督責，兩越春秋，始克成書。¹¹²

此序完成於前集刊成之時，當時爲正德三年（1508），雖然序中稱「兩越春秋」，但後集、別集則分別是在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十六年（1521）完成，刊刻的準備時間長達十餘年。¹¹³此序更說明了元明間《群書考索》失傳的遭遇，以及當時文獻故家「秘之以爲己寶」的情形。明版不只繼承元版的分集方式，也沿用其名「群書考索」，甚至進一步將「山堂先生」從書名去除，或許隔了一個朝代，章如愚本身的頭銜已無號召力，故「山堂」、「宮講」等詞不再出現在書名中。若我們更進一步深思，《群書考索》在明代可能也有性質上的轉變。

宋元兩代，《群書考索》被視爲舉業之書，甚至在元代還精簡爲二十卷以便考試之用。但是明代士人提起《群書考索》時，似乎並不將之與舉業連結：

讀鄭氏諸畧，極牢籠今古之奇矣，然杜之《通典》、馬之《通考》，其於禮樂兵農之屬尤爲詳盡，亦經世者所必資乎。而章先生《山堂考索》一書，則囊括天人，包舉鉅細，在二通之上，顧世弗甚彰，豈書亦有顯晦，與近代唐應德有左右編，鄧徵君有《函史》上下編，唐以左勝，勝在識也，鄧以下勝，勝在核也，他雖有作，弗敢知也。¹¹⁴

錢棻注重其「經世」之效，並認爲《群書考索》內容在二通之上，只是書有顯晦，《群書考索》名氣不甚彰著，若章如愚有其他著作，不見得就會如此沒沒無名。

《群書考索》在明代與《通典》、《文獻通考》並列的情形，也可見下文：

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功蓋什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¹¹⁵

此是明代茅坤爲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稗編》所作之序，¹¹⁶茅坤讚唐順之此作超越《通典》、《文獻通考》、《群書考索》諸書，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群書考索》在當時可與《通典》、《文獻通考》相提並論。

除此之外，《群書考索》在明代並非被視爲舉業之書尚有一例，見明代吳寬的〈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¹¹²（宋）章如愚，《群書考索》，頁 1-2。

¹¹³ 李偉國，〈《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頁 96。

¹¹⁴（明）錢棻，《蕭林初集》（北京：北京，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卷 7 〈史部四集史〉，頁 115-116。

¹¹⁵（明）茅坤，〈荊川先生稗編序〉，《茅鹿門先生文集》，卷 14，頁 651。

¹¹⁶ 茅坤（1512-1601），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吳興）人。爲明朝學者、藏書家。傳見《明史》，〈文苑〉，卷 175，頁 7374-7375。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爲明朝嘉靖八才子之一，對文學評論最爲深入者，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軍事家。傳見《明史》，〈唐順之傳〉，卷 205，頁 5422-5425。

然予聞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¹¹⁷

此是吳寬為即將歸鄉的同學章廷佐所作之序，文中說到章如愚是章廷佐的先人，姑且不論此是否為附會之說，至少章如愚已是金華當地重要的先賢。特別的是，吳寬在此提到《群書考索》時，主要是希望章廷佐回鄉後，能以書為友，藉此尋找樂趣。在這裡，《群書考索》便不是士子汲汲於功名的科舉用書，而是用以增廣見聞的知識性書籍。

從上述這些史料可以發現，明代費時重新校對、刊刻《群書考索》，顯示對此書的重視，即使《群書考索》在科場上可能已退流行，但在明代士人間卻有著極高評價，家中亦有收藏。楊士奇提到《群書考索》時道：

《群書考索》，前後續別四集，宋章如愚編，此書後出，纂錄先儒論說，精義特多，故便益學者，吾所畜十七冊，得之友人武昌鄧貞存誠。

118

楊士奇收藏的十七冊《群書考索》，¹¹⁹是從朋友鄧貞處得來，¹²⁰此透露了明代士人間交流此書的情形。

到了清代，《群書考索》似未再被刊刻。至今未曾發現《群書考索》的清代刻本。只有四庫全書收錄，其提要說道：

宋自南渡以後，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議論而尠考證。如愚是編，獨以《考索》為名。言必有徵，事必有據，博采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頗以經世為心。在講學之家，尚有實際。惟其書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於一時，不免有重複牴牾之處。……然大致網羅繁富，考據亦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之中，較《通考》雖體例稍雜，而優於釋經。較《玉海》雖博瞻不及，而詳於時政。較《黃氏

¹¹⁷ （明）吳寬，《家藏集》，卷 39，頁 242。

¹¹⁸ （明）楊士奇撰，《東里續集》（台北：台灣商務，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8，頁 4。

¹¹⁹ 楊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今泰和縣澄江鎮）人。官至禮部侍郎、大學士，與楊溥、楊榮於文淵閣任事達四十年，史稱「三楊入閣」。著有《東里文集》、《文淵閣書目》、《三朝聖諭錄》、《歷代名臣奏議》等。傳見《明史》，〈楊士奇列傳〉，卷 148，頁 4131。

¹²⁰ 鄧貞，《明史》無傳，現今留存的作品有〈十事疏〉，見（清）邁柱，《湖廣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91，頁 358-360。

日鈔》，則條目獨明。較呂氏《制度詳說》，則源流為備。前人稱蘇軾詩，如武庫之兵，利純互陳。如愚是編，亦可以當斯目矣。¹²¹

《群書考索》的引用皆有憑有據，且在考據上頗有心得，是四庫讚賞的原因。清代注重考據學，因此在評判這些書籍時，不免受到影響。但是仍不足以支持《群書考索》再次刊刻印刷，足見《群書考索》在清代未有實際需求。

或許《群書考索》原本的功能被許多新興類書所取代，也無益於清代盛行的考據學。因此其留存下來的原因，可能已與前代不同，例如王崇炳在《金華徵獻略》中說道：

《考索》一書至今猶存，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為金華三大書云。¹²²

從「好古家皆購求之」可知，《群書考索》在清代的角色已轉變為「好古家」所重視的書籍。《群書考索》長期以來建立起的地位，元代已有與二通鼎立的美譽，此時更被稱為金華三大書，與呂祖謙、金履祥的著作齊名，因而使好古之士人趨之若鶩。又如清人錢泰吉的例子：

山堂之學當與王伯厚（王應麟）抗衡，《考索》四集共二百十二卷，參處於《通典》、《通考》之間，足以鼎立，鄭氏《通志》所不及也。嘉慶丙子得於聞川陶氏，聞陶氏得之洙涇程氏，蓋曾為愛廬侍御所藏，當時以為元刻，實則明正德時慎獨齋刊本也。有志於古者，當訪求元刻校正之。余嘗欲摘其中論漢事者，合之《玉海》《通典》《通考》《五禮通考》所錄漢事，以補徐氏會要之未備，暇日當成之。¹²³

錢泰吉在這裡點出了《群書考索》在清代的作用。對於「有志於古」的士人來說，《群書考索》正是參考史事的對象，其對各代史事的記載可讓人了解過去的世界。錢氏也曾在提到《荊川稗編》時道：「雖不及章氏《山堂考索》之精核，亦考古者所必資」，¹²⁴這說明《群書考索》在清人眼中，是了解過去最具代表性的書籍。錢泰吉等人會如此重視《群書考索》的資料，也與其書的特質有關。由於《群書考索》中所使用的資料大多有註明出處，因此較為可信。王崇炳就曾說：「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尙有其書」，¹²⁵說明了《群書考索》能做到「言必有徵」，是它能留存至今的原因之一。

並且俞樾也說：

¹²¹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35，頁 2805。

¹²² （清）王崇炳，《金華徵獻略》，卷 10〈文學〉，頁 176。

¹²³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台北：文史哲，1973），卷 7〈曝書雜記〉，頁 312-313。

¹²⁴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 7〈曝書雜記〉，頁 312。

¹²⁵ （清）王崇炳，卷 10〈文學〉，頁 176。

按至今章氏《山堂考索》猶存，傅氏之書實章氏之先河，卓約之書爲《考索》之精騎，惜皆失傳矣。¹²⁶

這裡說的「傅氏之書」指的就是傅寅的《群書百考》，「卓約之書」指的即是元代史料中提及的二十卷精華本。《群書考索》是「傅氏之書」的加強版，「卓約之書」又是爲了便於科舉而濃縮的精華本，兩者都無法通過時代的考驗，到了清代皆已消失。可見《群書考索》在內容上仍有保存下來的價值，清代士人並不以舉業之書目之。

這一點從包世臣爲睦秉衡寫的墓表中可以看到：

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爲舉子業者，尚爲陳腐之詞。君獨鉤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今古興衰之要，人率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就試既不當有司，乃挾貲遠賈，泝江絕洞庭，窮五溪，度九阡，三致萬縉皆輟覆，君故不事積。¹²⁷

《群書考索》在此時與《資治通鑑》被相提並論，對睦秉衡來說，兩者都能「求今古興衰之要」。一部在宋元被視爲舉業之書的作品，到了明清，隨著科舉考試形式的轉變，已失去科舉參考書的功能，這點從上述引文中，爲舉子業的同學與睦秉衡的差別就可看出，顯然當時求取功名的士子已不讀《群書考索》了，因此睦秉衡才會被人非笑。然而，這更可以回應前文的主題：《群書考索》在內容上仍有保存下來的價值，其中記載的士人對歷史的看法、制度演變的原因，可以呈現今古興衰的道理，這才是《群書考索》歷久不衰的價值所在。

在以書籍爲主題的研究中，不只要深入著作本身的內容與思想，更要關心當時士人對此書的態度與想法，亦即此著作的影響性。除此之外，一部著作在不同的時代，會被投以不同的眼光，《群書考索》正可做爲一個例證。從宋到清，《群書考索》因應時代需要，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時至今日，《群書考索》仍未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¹²⁶ （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卷 11，頁 248。

¹²⁷ （清）包世臣，《小倦遊閣集》（上海：上海古籍，2002），續修四庫全書，卷 24，頁 581。

小結

章如愚的生平，以及《群書考索》的成書與流傳，向來爲人所忽略，然而這提供了我們對於南宋的新認識。章如愚的求學歷程與其學術源流皆與呂學習習相關，其在麗澤書院的學習，讓他接觸到呂學「不主一門」、「不師一說」，以及「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之爲學特色，而呂祖謙的作品更深深影響著章如愚日後的爲學形式。在章如愚登科當年，正值黨禁，麗澤書院也被迫停止講學，然而這些門人並不放棄傳播學識之路，各自成爲提攜後進的舉業之師。章如愚在罷官歸鄉之後，亦成爲鄉里的舉業名師。我們可以看到南宋這一類的士人並不少見，只是無卓絕的識見，而被思想史研究摒除門外。章如愚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看見這一類士人的生命軌跡。

《群書考索》的成書與婺州的學風密不可分。與章如愚同年登科的金華人士，就有潘自牧、王象之等擅長史料的編纂和整理者，他們皆以知識廣博聞名。其中更直接與章如愚相關者爲傅寅，其亦以學識淵博著稱，並編纂《群書百考》一書，《群書考索》正淵源自此。章如愚在婺州的學風影響之下，吸收了浙東學者以史見長、重視《周禮》的特色。增補《群書考索》的呂中，爲葉適之徒，也同屬於這個學術氛圍下。在婺州的這群學者，構築了一個精密的類書文本傳統，分享著共同的價值觀。

《群書考索》的發展，反映了由宋至清的學術史。南宋浙學重實學，《群書考索》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自然偏向於經世致用。宋元明的科舉興盛，《群書考索》也占有一席之地，其豐富的史論與制度介紹，便於士人準備科舉考試。到了清代《群書考索》刊刻的情形日益減少，似已被考據學主流文化邊緣化。但其評價卻日益提升，從科舉型類書轉變爲與三通並立、且能求古今興衰之要之書。一部書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功能和評價，《群書考索》讓我們看到了書籍的演變史。

第三章、《群書考索》歷史人物分析

對歷史人物的論述，是《群書考索》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章如愚在《群書考索》中，大致將人物分為三類進行論述，分別是君、臣、聖賢。這三類不只屢見於書中，亦自成三個獨立的部門，即〈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這是《群書考索》中，唯一以「人物」為主題的部門。透過對這三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看章如愚對人物是如何進行論述。筆者要提出的問題是，章如愚為什麼要選擇這些人物？他們具有什麼樣的代表性？而章如愚是從什麼角度，以什麼方式呈現這些歷史人物？透過回答這些問題，以瞭解章如愚的歷史論述的特色。

本章主要的史料來自於《群書考索》的〈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三門。章如愚在這三門資料的呈現形式是，首先依其選擇的人物分成各部分，如堯、舜、禹等等。再各別放入所選取的相關資料，每段資料都賦予一個標題，用以表達此人物的特色與精神。筆者在此欲先論述其選取的資料有哪些特點，是爲了先掌握章如愚的學術傾向。再考究其選擇人物的標準，了解章如愚的思想與關懷。最後再從其分類、分析資料的方法，探究其爲學方式。

第一節、選材內容的特質

在進行歷史論述的分析之前，筆者欲先探討《群書考索》在歷史人物此部分的選材，章如愚在此處的選材略與《群書考索》的其他篇章有所不同。《四庫提要》說：「蓋南宋最重詞科，士大夫多節錄古書，以備遣用。其排比成編者，則有王應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¹²⁸因此，章如愚的《群書考索》可以說被視爲是古書的摘要，以供士子取用。此書的其它部分雖有節錄古書的情形，但在論述歷史人物部分，則完全不同，採用的大多是當時士人的評論。將《群書考索》與同時代的類書相比，就能看出明顯的差異。

就以〈君道門〉和〈聖賢門〉而論，在南宋陳元靚編著的《事林廣記》中，其〈歷代門〉記載的帝王資料，大多來自於正史的記述，詳其姓氏來源、生平事蹟，對其人的評價和君道的闡發完全沒有著墨。¹²⁹而《事林廣記》〈素王事蹟〉提到孔子時，也注重在孔子的祖譜、歷代封贈情形、子孫襲封情形，對於孔子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則沒有深論。¹³⁰南宋葉廷珪編著的類書《海錄碎事》中，亦有〈帝王部〉和〈聖賢人事部〉，¹³¹主要是解釋與帝王相關的語詞，以及古代聖賢的別名由來，如「雲中鶴」所指何人？便可從此書得知爲邴原，此稱號來自公孫淵所

¹²⁸（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卷 65，頁 1414。

¹²⁹（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1999），甲集卷 6，頁 194。

¹³⁰（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丙集卷 1，頁 232-237。

¹³¹（宋）葉廷珪，《海錄碎事》（上海：上海辭書，1989），卷 7 上-卷 10 上，頁 172-330。

讚。¹³²又如「甲夜觀事」、「笑有爲笑」等語詞是來自於哪些君王的事蹟，《海錄碎事》就是提供這樣的檢索功能。¹³³南宋謝維新所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中，亦有〈君道門〉、〈臣道門〉，¹³⁴他採取的方式是，列舉 19 項君王的作爲，如「改元」、「恤刑」、「赦宥」等，再於其下列舉各代君王在此方面的作爲，臣道部分，則是列舉 17 項臣子相關的作爲，如「諫諍」、「清廉」、「恬退」等，再列舉代表性的歷史名臣，這些資料的補充大多是以史事爲主。其他又如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雖有〈帝王后妃部〉，¹³⁵但是以考究「帝」、「天子」等名詞源流爲主，較無涉及對人物的描述。宋代官修類書《太平御覽》的〈皇王部〉，則是選取了許多相關史料，來補充這些帝王的事蹟。

相較於上述這些類書的資料檢索性質，《群書考索》則呈現較爲不同的歷史人物書寫，因爲《群書考索》使用的材料，直接對歷史人物進行論述與評價，而非只是資料的堆積。那麼，章如愚究竟選取了哪些人的意見，來呈現他想要表達的人物特質呢？考察章如愚在這三門中採用的宋儒意見，可見下表的記載：¹³⁶

表三、《群書考索》人物部分資料來源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作者	作者生卒	作者活動時期	君道門	臣道門	聖賢門	總數
無作者			69	9	18	96
呂祖謙	1137~1181	南宋	21	3	3	27
真德秀	1178~1235	南宋	12	3	3	18
蘇軾	1036~1101	北宋	8	1	4	13
程頤	1033~1107	北宋	2		11	13
程顥	1032~1085	北宋	2	1	8	11
范祖禹	1041~1098	北宋	3		5	8
謝良佐	1050~1103	北宋	2		6	8
楊時	1053~1135	北宋—南宋		4	3	7
陳傅良	1137~1203	南宋	5	1	1	7
劉子翬	1101~1147	北宋—南宋	2	1	3	6

¹³²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 9 下，頁 305。

¹³³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 10 上，頁 314-315。

¹³⁴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台北：新興，1971)，後集卷 1-10，頁 538-630。

¹³⁵ (宋)高承，《事物紀原》(上海：上海古籍，1992)，卷 1，頁 12-17。

¹³⁶ 此表根據《群書考索》的〈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製作。最左邊的欄位，填寫的是章如愚收錄的資料的作者名錄；第二欄是作者生卒；第三欄是作者生平時期；第四到六欄是各門引用此作者的意見數量；最後一欄則是這些意見的總量。整個表格的排序是照意見總量的多寡安排。

張九成	1092～1159	北宋—南宋	1	1	3	5
蘇轍	1039～1112	北宋	3		2	5
石安世	不詳	不詳	2		2	4
呂大臨	不詳	北宋		1	3	4
楊萬里	1127～1206	南宋			4	4
張栻	1133～1180	南宋	1		2	3
王禹偁	954～1001	北宋	2			2
余元度	不詳	不詳	2			2
司馬光	1019～1086	北宋	2			2
歐陽修	1007～1072	北宋	2			2
張耒	1054～1114	北宋	1		1	2
王安石	1021～1086	北宋	1		1	2
朱熹	1130～1200	南宋			2	2
謝諤	1121～1194	北宋—南宋			2	2
張載	1020～1077	北宋			2	2
姚子材	不詳	南宋	1			1
鄭鑑	不詳	南宋	1			1
胡瑗	993～1059	北宋	1			1
石宗昭	不詳	南宋	1			1
陸唐老	不詳	南宋	1			1
陳孝錫	不詳	南宋	1			1
邵雍	1011～1077	北宋	1			1
夏僎	不詳	南宋	1			1
陳朴	不詳	北宋	1			1
汪雄圖	不詳	南宋	1			1
胡林卿	不詳	南宋	1			1
陳誠中	不詳	南宋	1			1
葉適	1150～1223	南宋	1			1
劉穆元	不詳	不詳	1		1	1
周孚先	不詳	北宋	1			1
秦觀	1049～1100	北宋	1			1
胡安國	1074～1138	北宋—南宋	1			1
林之奇	1112～1176	北宋—南宋	1			1
李覲	1009～1059	北宋	1			1
胡寅	1098～1156	北宋—南宋	1			1
范仲淹	989～1052	北宋			1	1

李清臣	1032~1102	北宋			1	1
尹焞	1071~1142	北宋—南宋			1	1
周敦頤	1017~1073	北宋			2	1
游酢	1053~1123	北宋			1	1

關於此表，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點。第一、章如愚採用的皆為宋代諸儒的意見，較無引用古人的看法，北宋人數略高於南宋；第二、這些儒者大多與理學有相當的關係；第三、未註明出處的意見占最高位，共有 96 條之多，究竟是否為章如愚的意見？容下文再進行探討。第四、呂祖謙的論述對章如愚的影響甚大，引用的次數也只居於未具名作者的意見之後。

針對上面所列的特點，以下有一些說明與分析。《群書考索》是一本蒐集資料的類書，但並不代表此書沒有思想性，章如愚選擇了哪些人的意見，這就反映了他的思想歸趨。首先，他採用的大多數是宋人的議論，從這點可以看出，章如愚已意識到宋代對於君臣聖賢的想法，有其時代特色。關於宋代士人對君臣聖賢的想法，王安石認為君王應效法堯、舜、殷高宗，能辨別君子與小人，自然有如皋、夔、稷、高般的理想臣子輔佐。唐太宗之流的君主，並非理想的效法對象。而魏徵、諸葛亮則是「有道者所羞」，真正掌握了「道」之人，不屑以其為目標。¹³⁷這反映了宋代對君臣聖賢的看法，他們欣賞上古三代的聖君賢相，而非漢唐盛世的人物。這點從《群書考索》在〈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選擇的人物就可知曉，或許這就是章如愚以宋儒議論為主之因。

章如愚選取的宋代士人，大多與理學有淵源。53 人中，除了石安世查不到生平資料之外，其他人皆有資料可考。章如愚雖未被列入《宋史·道學傳》中，但是他對理學卻十分重視。明代的《兩浙名賢錄》說章如愚：「自幼穎悟，潛心理學」，¹³⁸明代《弘簡錄》亦說他在罷秩歸鄉後，在鄉里「與學者講論道義」，¹³⁹這都說明了他一生關注的是理學。雖然他並沒有相關的論著，也無文章闡發其理學思想，但是在《群書考索》中，從他對理學家議論的引用，仍能看出他對理學的重視。我們亦可以想像，透過《群書考索》一書的傳佈，理學思想也就更能普及於各士人之間。

章如愚在歷史人物方面，究竟選擇了哪些儒者的意見？又以誰的議論為主呢？看到上表中所列，有 96 條資料並未註明作者，這 96 條是否皆為章如愚自己的意見？田浩先生曾經對《群書考索》〈聖賢門〉做過統計，對這些不記名的資料並未予以注意。¹⁴⁰經筆者一一對照查證，這些未記名的意見仍非章如愚自己的

¹³⁷ (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1985)，〈王安石傳〉，卷 327，頁 10543。

¹³⁸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3 理學，頁 107。

¹³⁹ (明)邵經邦，《弘簡錄》(上海：古籍，1995)，續修四庫全書，卷 179 〈道學〉，頁 189。

¹⁴⁰ Hoyt Cleveland Tillman, 'Encyclopedias, Polymaths, and Tao-hsueh Confucian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 Ju-yu,'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2 (1990-92),

議論，其實大部分來自呂祖謙、林之奇、蘇軾等人。綜上所述，呂祖謙對於章如愚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其對歷史人物的論述，屢被章如愚引用，這或許與章如愚曾在麗澤書院求學有關。呂學有別於宋代諸學，一是特別注重史學，二其包納不同思想的治學風格。而這兩個特點，在章如愚的《群書考索》中都可以看到。《群書考索》雖被歸為類書，但重視典章制度源流，相較於其他類書，史學的特色更顯著。在上表中，章如愚所引用的諸儒意見，我們也可以看到呂學「不主一門，不私一說」的風格，除了婺學外，洛學、朔學、蜀學三派等北宋名儒皆為章如愚所引用。特別是對蘇軾、蘇轍言論的重視，更是受到婺學影響。¹⁴¹不過，從上表中，我們也能看到章如愚對程頤、程顥、楊時、謝良佐等人意見的看重，這說明他的學術立場與洛派近似。

除此之外，章如愚也收錄其他士人之言論。例如余元度、姚子材、胡林卿、陸唐老、陳孝錫、陳誠中、劉穆元等人，大多是史傳上沒有特別記載的文人，但這些人的史論可能在當時都頗受歡迎，如余元度的文章被選入《宋文選》中，¹⁴²劉穆元的議論亦被收入《十先生奧論》中。¹⁴³甚至這些人可能也撰寫一些舉業之書，如陸唐老的《增節音注資治通鑑》，就是宋代的舉業之書。¹⁴⁴

即使是博采眾說的章如愚，對於朱熹的意見卻較為忽略。然而這並不是章如愚排斥朱熹的學說，如清代唐燮就曾說過：「《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¹⁴⁵這表示在《群書考索》的其他部分，可能有大量引用朱熹的情形。如〈經籍門〉中「易」的部分，採用了許多朱熹的《易學啓蒙》，「詩」的部分也引用了許多朱熹文集的內容，¹⁴⁶只是在討論歷史人物的部分較不以朱熹的意見為主。

pp.89-108.田浩先生根據〈聖賢門〉引用資料的統計，認為這些被引用的儒者，遠比朱熹定義的道學人物，對章如愚更具影響力。

¹⁴¹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台灣學生，1977），頁 29。錢穆認為以蘇門為首的蜀學，其言論思想無系統、無組織，向來被宋學正宗朱熹所嚴斥，但卻被呂祖謙、陳亮等婺學及永康學派所追蹤。

¹⁴² （宋）不著撰人，《宋文選》（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2，頁 191-201。

¹⁴³ （宋）不著撰人，《十先生奧論》（台北：台灣商務，1970），前集卷 9，頁 1-19。

¹⁴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此書「於司馬光書內，鈔其可備科舉策論之用者」，清代陸隴其在《三魚堂日記》說其「是宋季舉業之書」。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48，頁 1057；見（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北京：學苑，2006），卷 10，頁 326-327。

¹⁴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 7，頁 53

¹⁴⁶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1982），續集卷 2，頁 979-984；續集卷 6，頁 1013-1016。

第二節、歷史人物的選擇

一、君、臣、聖賢

章如愚唯一以「人物」為主題的部門，即是君、臣、聖賢。我們可以由此推測，在章氏心目中，值得列出比較的歷史人物就是此三類，這也反映了他對歷史人物的選擇有其偏好。在宋代其他類書中常列舉的人物，例如佞臣、神仙、列女等其他類書中常有的人物描寫，在《群書考索》中則沒有提及。我們或許也可以推想，章如愚希望能留在人們心中的歷史人物，是如先聖先賢一般，有著令人景仰的道德與處世智慧的人物。在〈君道門〉中，章如愚列舉的有堯、舜、禹、啓、湯、盤庚、高宗、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始皇共 12 位君王。〈臣道門〉則有皋陶、稷、夔、伊尹、傅說、周公 6 位。〈聖賢門〉計有孔子、顏子、閔子騫、子貢、季路、曾子、子思、孟子、伯夷、柳下惠、老聃、莊周 12 位。

章如愚在〈君道門〉的人物選擇自堯開始，這與其他類書有極大的不同，例如北宋類書《太平御覽》〈皇王部〉是從「天皇」、「地皇」、「人皇」開始記載，¹⁴⁷南宋類書《事林廣記·歷代門》則是從三皇開始編列。¹⁴⁸從這樣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出每種類書的所關心的議題並不一樣，《太平御覽》、《事林廣記》雖然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類書，但是他們選擇從歷史的角度去記載君王，而章如愚心中則有一個標準。其實章如愚所認為的「君道」、「臣道」，與理學的「道統」有緊密關係。依照朱熹的說法，道統的承接自堯舜開始，歷經湯、文、武之君，以及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臣，孔子雖然沒有其位，但能「繼往聖，開來學」，開創道學。¹⁴⁹朱熹對道統傳承的理解，就此影響了南宋士人的道統觀。例如南宋類書《事林廣記》中的一幅「道統傳授之圖」，就是依照這樣的思路呈現：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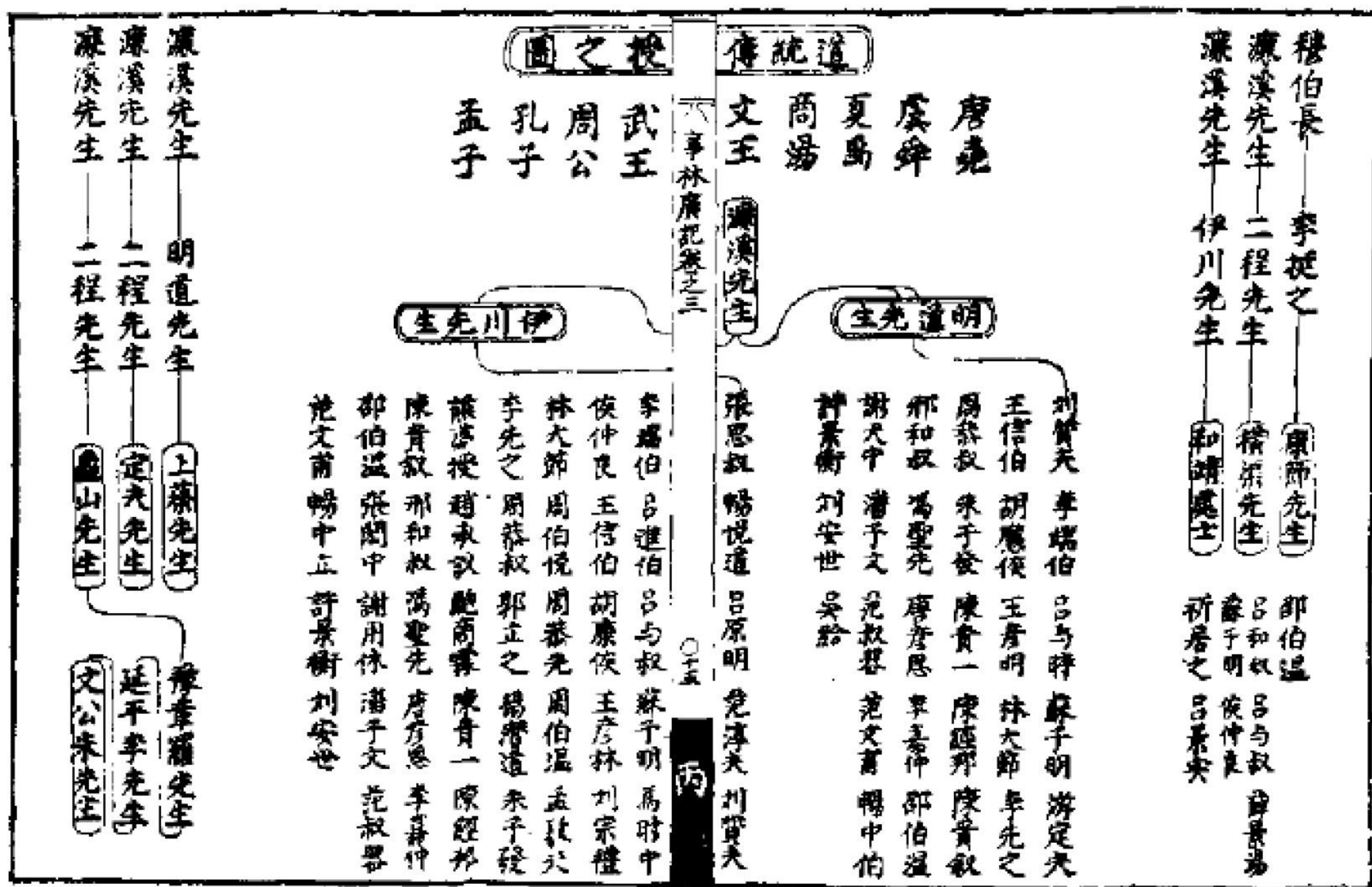
¹⁴⁷（宋）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卷 76-116，頁 652-873（冊 1）、頁 1-144（冊 2）。

¹⁴⁸（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甲集卷 6，頁 194。

¹⁴⁹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1991），頁 14-15。

¹⁵⁰（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丙集卷 1，頁 238。

圖一、道統傳授之圖



此圖正反映了南宋理學發展成熟之際，士人間對「道」傳承的普遍看法。章如愚對〈君道門〉、〈臣道門〉的人物選擇，大致上也依循這樣的思路。因此至少在秦之後，便無人再被選入這三門之中，可以看出章如愚並不認為漢唐盛世的君主或臣子符合他所謂的「道」。

章如愚要說的「道」，其實可以從「不得已而發道之秘」此條記載中，窺知一二：

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可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固悲夫舜之時不逮乎堯也，自舜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乎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

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呂祖謙)¹⁵¹

從此條我們可以看出，章如愚所謂的「道」就是堯舜相傳的「允執厥中」。¹⁵²此道原本是秘而不發的，因勢之所逼而不得不以文字相傳。自堯舜開展的「執中之說」、「精一之說」，影響到了後世的儒家思想。如此可看出，堯舜等〈君道門〉中記載的君主，與理學家的道統有密切關係。

除了上古君王相傳以道，「臣」的角色也很重要。章如愚引張九成的「卓然獨見」一文，描述君與臣相傳此道的情形：¹⁵³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為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迹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¹⁵⁴

此正是章如愚設〈君道門〉又設〈臣道門〉之因，因為此「道」有賴君臣間的互相傳承。君與君之間「道」的聯繫若中斷，有賴臣的以道自任。相較於其他類書設置〈帝王門〉、〈君主門〉，章如愚設〈君道門〉、〈臣道門〉更顯示他對「道」的重視。即使有設置〈君道門〉、〈臣道門〉的類書，如《海錄碎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事物記原》，但都沒有看到明顯的譜系概念。

在理學的譜系之外，章如愚依循此架構，加上了其他的人物，例如在〈君道門〉的啓、盤庚、高宗、成王、宣王等人，在章如愚的認知裡，這些人同樣傳載了道統，筆者認為這是章如愚根據宋人研究《尚書》的結果。除了人物選擇與《尚書》較為近似之外，其實從章如愚所引用的資料，也可以看出其與《尚書》的關係。上文已說明章如愚大量採用呂祖謙的言論，這些資料大多來自呂祖謙的《書說》，此外還有來自林之奇的《尚書集解》，以及夏僎的《尚書詳解》。可以看出，章如愚基本上是根據宋代諸儒對《尚書》的闡釋，來完成他對人物的描繪。

在這些「有道之君」中，「始皇」則是個例外，除了其非三代之君外，被納

¹⁵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3。

¹⁵² 堯傳舜「允執厥中」一句，舜傳禹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見《尚書·大禹謨》。朱熹與呂祖謙對此情形的解釋不一，朱熹認為是舜用以「明夫堯之一言」，這說明道體的闡釋必愈後愈詳；呂祖謙在此文中則是悲嘆環境對於傳達「道」的影響，後世之說愈多，離「道」愈遠。無論如何，兩者都認為「道統」在上古已出現，這對於宋代理學家強調君主要「行道」是堅強的後盾。關於宋代理學家「得君行道」的思想，可見余英時，〈道學、道統與「政治文化」〉，《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頁 26-60。

¹⁵³ 章如愚與朱子學術關係值得深究，清代唐燮就曾說過：「《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顯見章如愚亦服膺朱子之學。但是朱子不滿張九成之佞佛，章如愚卻能取張九成之言，代表其不被朱子所侷限。

¹⁵⁴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5，頁 1334。

入選擇的意圖也很值得推敲。在涉及始皇的部分，作者選取了八條資料來說明，無論是「天厭秦」、「詩書之道廢」……以至「吏不肖」等等，¹⁵⁵皆無法彰顯始皇符合君道的表徵。那麼章如愚設〈君道門〉的涵義為何？其實作者不只是以「符合君道」為選取標準，也舉出始皇來說明「不合君道」的反例。

從這三門的人物選擇中，可以看出在章如愚心中有一個理學的系譜，這三類人雖各是君、臣、儒者，但都承載著「道」。以余英時先生的理論來說，朱熹認為上古的這些君臣掌握的是「道統」，因為他們結合了「內聖」與「外王」，不僅有德也有位，自孔子之下的這些儒者則是開創了「道學」，因為他們已無力繼承全面的「道統」，這其中展現了「道」與「治」的關係。¹⁵⁶章如愚無疑也受到這個看法的影響，不然不會將〈君道門〉與〈臣道門〉的人物標準提的如此高，而另外將孔孟等人放在〈聖賢門〉中。

在〈聖賢門〉中，除了孔孟一系之外，還包括了伯夷、柳下惠、老聃、莊周。這與前述章如愚的理學思想似有違背。但是章如愚並不是一個「純正」的理學家，一直以來，人們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儒者」看待，¹⁵⁷一直要到明清才被某些士人視為理學家，¹⁵⁸而這個變化的原因，尚待日後研究。從前述章如愚對於呂學和蘇學的傾向來看，他的思想頗為多元，這可能是他選取伯夷、柳下惠、老聃、莊周之因。但是從內文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對此四人真正的態度。

首先關於伯夷和柳下惠，在「以清和成性」此條中，章如愚雖然讚賞柳下惠之和與伯夷之清，也認為這是他們「階於聖人」之因，但是最後則加上一句「但德差偏」。¹⁵⁹章如愚接著引王安石「以身救天下之弊」之意見，認為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都能救天下之弊，但「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¹⁶⁰因此不予認同。最後章如愚又引蘇轍「清之過」之論，此條則以反面角度來論述伯夷叔齊二人，認為過於「清」反而「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¹⁶¹因此，章如愚認為伯夷與柳下惠雖然都具備了成聖的特質，但是卻偏離中正之道，雖然將此二人放入〈聖賢門〉，然而態度卻與孔孟一系的聖賢相異。

對於老莊，章如愚的態度更加明顯，其列舉的四條議論，都以討論老莊學說的弊病為主。例如在引用真德秀的「老氏所該者眾」一文，認為老子的學說造成

¹⁵⁵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4，頁 1329-1331。

¹⁵⁶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 26-60。

¹⁵⁷ 雖然《宋史》並沒有章如愚的傳，但在明版《群書考索》前的序言卻說《宋史》〈儒林傳〉有其傳。明代的《金華先民傳》把他放在〈文學〉中，見(明)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台北：新文豐，1988)，卷 7〈文學〉。

¹⁵⁸ 明代邵經邦撰的《弘簡錄》中，將章如愚放在〈道學〉中，見(明)邵經邦撰，《弘簡錄》，卷 179 道學，頁 189。而清代王梓材等人編著的《宋元學案補遺》也收錄了章如愚，見(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1962)，卷 79，頁 48。

¹⁵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 56，頁 1345。

¹⁶⁰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 56，頁 1345。

¹⁶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 56，頁 1346。

後世神仙方藥之說、申韓之說、清談之害的出現，雖然老子的本意不是如此，卻產生了許多流弊。¹⁶²而在章如愚引用蘇軾的「申韓出於老莊」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申韓之害，使天下「敢於殘忍而無疑」，而這都來自老莊學說。¹⁶³這些言論都尚未直接攻擊老莊本身，僅以爲是後世產生的流弊。但在最後章如愚引楊時的「其辭夸」一文中，則認爲莊子往往將事誇大而言，其所言都不出子思、孟子之論。¹⁶⁴顯然，章如愚雖認爲此四人符合他對聖賢的標準，但是與孔孟相比，仍有高下之分。

總結章如愚對歷史人物的選取，其時限大多在秦以前，可以看出在章如愚心目中，符合君之道、臣之道，以及可稱爲聖賢之人，自秦以後便沒有了。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他心中存在著一個道統譜系，此譜系以理學爲主，這也體現了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二、《群書考索》中其他人物描繪——以唐太宗為例

除了君、臣、聖賢，章如愚在《群書考索》中仍有對其他人物的描繪，只是與君、臣、聖賢相比，在篇幅上較少，在標題上也不夠細緻。例如在《後集》卷33中的〈歷代人才〉，列舉了各朝的名人，但並未多做描述，僅以一句形容其人物特質。其次，是在其他門類中會提到的人物，例如〈別集〉中〈夷狄門〉的諸位君王。在〈夷狄門〉中，章如愚探討各朝的制夷政策，其中就牽涉到君王的作爲，因此也就有對君王個人的形象描繪。例如漢武帝、漢宣帝、唐太宗，皆是在此門中論及的人物，其中尤以唐太宗的篇幅最多。以下就以唐太宗制夷狄爲例，了解章如愚如何呈現其對唐太宗的觀察。

在〈夷狄門·唐太宗御夷狄〉中，章如愚採用了9條意見，那麼章如愚採用的這些史論，是從什麼角度分析唐太宗的夷狄政策？

第一，他們看重唐太宗本身對於夷狄的看法。也就是身爲中國君主，對夷狄應有的態度。在崔鷗的評論中，¹⁶⁵提出了他對於夷狄的看法，他認爲「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大小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爲廩則癯矣，其益不已則死」，¹⁶⁶中國對夷狄的態度應當以順其自然的方式，不應強行征伐，否則會招致災禍。對他而言，唐太宗的態度就不可取。

不只在評論唐太宗的部分，其實在〈夷狄門〉中，章如愚的選擇就表達了他

¹⁶²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56，頁1346。

¹⁶³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56，頁1346。

¹⁶⁴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56，頁1346。

¹⁶⁵ 崔鷗，字德符，雍邱人。爲徽宗時期人物。見(清)高宗敕撰，《續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7)，卷365，頁5414-3。

¹⁶⁶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別集卷22，頁1533。

的夷狄觀。例如在總論夷狄的部分，做了許多古今對照。他引葉適之論，¹⁶⁷認為三代的御夷政策是秦漢唐無法超越的，唐太宗雖有其功，但卻非三代所尚。三代之所以伐夷狄是不得不然，唐代不知三代之意，才使得「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¹⁶⁸這說明了在章如愚心中，唐太宗的對照組其實是三代。章如愚又引葉適的另一則論，認為古者以「夷狄前來臣服」為太平之世驗證，但後世則以「征伐夷狄」為強盛之世的功績。¹⁶⁹這裡的「古者」，舉的是周人的例子，「後世」則是以漢代為例，說明了古今對夷狄的兩種不同態度，唐代基本上也屬於「後世」這一類。

因此，回到唐代制夷政策的部分，章如愚等人並不贊同唐太宗的心態。如葉適提到太宗之征夷狄，並不認同其以「仁義之師」為名義，他說太宗「嘗謂嚴尤，『謂御戎無上策，今朕自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君長皆帶刀宿衛。』」¹⁷⁰葉適所引的資料來自《資治通鑑》，¹⁷¹從中可以看出太宗對自己的自信，但他認為太宗雖自云行仁義，其實際作為並非如此，太宗「斥大邊境，破薛延陀，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¹⁷²所謂的四夷自服，其實是在武力的逼迫下形成的。葉適更嚴厲的批評，「仁義」必世百年而見其功，不能自說自話。葉適另外又提到，太宗認為自己制夷得上策，但在葉適的看法中「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可論？……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¹⁷³唐太宗與先王的高下，在此便可得知。

對夷狄應有的態度，宋人有一套說法，在章如愚自己的評論中，引用了范祖禹《唐鑑》中的意見：¹⁷⁴「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¹⁷⁵因此夷狄是必然會存在的現象，重要的是自己國家是否政治清明。范祖禹接著列舉了各代御夷的方式，認為三代以後的君主，對於外族，不是仇恨而欲滅除，就是因愛悅而將之招來，這兩者皆是不對的。秦和隋正是此二者的代表。章如愚因此批評唐太宗憑仗著自己的能力，想要將夷

¹⁶⁷ 葉適（1150-1223），字正則，溫州永嘉人。見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1984），頁 3237。

¹⁶⁸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29。

¹⁶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29。

¹⁷⁰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2。

¹⁷¹ 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1956），卷 193。《舊唐書》、《新唐書》中並無記載。

¹⁷²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2。

¹⁷³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4。

¹⁷⁴ 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一作純父、純甫），一字夢得，華陽人。見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663。

¹⁷⁵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4。

狄與中國合一，這不符合先王之意。以上是就唐太宗對夷狄的態度而言。

第二，從唐太宗的個性而論。他們認為唐太宗的個性是好戰的，並且十分在意自己的表現與前代的比較，其對夷狄的征伐並不是單純以國家安全為考量，而是與自身喜好有關。葉適就說太宗「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¹⁷⁶秦始皇與漢武帝的對外戰績，是太宗想要挑戰的對象，因此他征伐夷狄的心態是想與前代一較高下。葉適也提到唐太宗「雖偃文修武，而其按劍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¹⁷⁷好戰的個性增長其攻打高麗的野心。崔鷗認為唐太宗這樣的個性不是憑空而來，他說「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尤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¹⁷⁸因此唐太宗的好戰，是來自於他過往的經歷。

范祖禹亦有同樣的觀點，他說唐太宗之征高麗，並不是只因為國力的強盛而已，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以往的戰功，塑造了他四方征討的個性，他說太宗「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范祖禹肯定太宗的勇武，但對於其好於用兵的個性則不認同，更進一步認為，要「禮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才能擁有真正的勇敢。¹⁷⁹又如章如愚否定唐太宗引諸戎入朝的政策，其中一個原因是認為，太宗「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¹⁸⁰由此可以看出，太宗浮誇的個性，影響了他對待夷狄的策略。章如愚在另外一條〈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中，也說唐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¹⁸¹從這幾條資料來看，可以發現宋人對於唐太宗個性的評價不高，並且其夷狄政策也受此影響。

第三，從政策方面而論。採此種角度論述的例如張耒，¹⁸²他認為太宗攻高麗未掌握時機，選在高麗強盛時，當然必敗。而高宗在恰當的時機攻打高麗，故是因敵勢自敗而取勝，¹⁸³這是張耒從戰略運用方面而論。章如愚自己也從政策得失上論唐太宗的制夷，他先舉出唐代群臣如顏師古、李百藥、竇靜、溫彥博、魏徵等人，對於降唐突厥部落處置的爭議，太宗最後採納溫彥博的建言，引諸戎入中。章如愚強力批評這項政策，認為這「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¹⁸⁴他是從夷狄與中華文化對立的方面立論。另外還有一則，是李倩讚賞唐太宗用賄賂

¹⁷⁶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2。

¹⁷⁷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2。

¹⁷⁸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⁷⁹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⁸⁰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⁸¹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4。

¹⁸² 張耒（1054-1114），字文潛，號柯山，楚州淮陰人。見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232。

¹⁸³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⁸⁴ 此段爭議見於（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3。是貞觀四年之事。

及和親的策略，¹⁸⁵這條意見的詳細內容，會在下文論述。總而言之，單就政策方面而論的並不多，大部分還是從唐太宗態度及個性兩方面討論。

整體而言，章如愚所引唐太宗制夷史論，大部分是否定其作為的，只有採用一則李倩的史論是少數肯定的。¹⁸⁶李倩是針對太宗處理頡利可汗與薛延陀的部分作論，一個是賄賂頡利可汗的事件，一則是與薛延陀和親之事。李倩認為唐太宗最初以賄賂及和親的方式處理，是最佳的制夷策略，因為可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在中國得到充分休息後，才能為日後的征伐做好準備，最後「擒頡利可汗」，並使「延陀襄陂失據而死」。¹⁸⁷關於賄賂頡利可汗的事，自高祖以來就有，¹⁸⁸但是關於答應薛延陀的求親這件事，在唐代當時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在《資治通鑑》中，記載了貞觀十七年（643年）薛延陀求親的事件，當時朝中有反對的意見，連太宗自己也以為不可，但是已經答應了便無法失信於人，只好採用親迎禮的條件欲使之知難而退，最後以聘禮未備為由，取消了此次婚約。然而這件事也引發大臣的不滿，褚遂良就曾上言，認為君主應該信守諾言。¹⁸⁹

李倩臣認為唐太宗答應與薛延陀和親，是因為民厭苦於兵，故事戎以盈中國之氣。而他是從何處知道太宗並非與敵示弱呢？或許是從《資治通鑑》中得到的想法。在《資治通鑑》中唐太宗對於這件事的回應是，「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再加上「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¹⁹⁰這表達出對自己國家實力的自信，以及擔心夷狄趁此機會坐大的憂慮。對照李倩的評論，司馬光的史論則是從君王應守信的角度出發，沒有談到和親是否有益於中國的問題。¹⁹¹雖然李倩贊同唐太宗的此項策略，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賄賂或是和親，都是較為懷柔的手段。也就是說，在章如愚對史論的選擇中，即使有贊同太宗制夷政策的部分，也只是這種懷柔的手段，《群書考索》在這方面基本上是反對積極征伐的。

總結章如愚等人對唐太宗的評價。他們在評論唐太宗的夷狄政策，較少從戰略的運用、實際的效果來談，即使有，篇幅也較小。最主要是從太宗本身對夷狄

¹⁸⁵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⁸⁶ 李倩，不詳。在宋庠的《元憲集》中有〈審刑院詳議官太子中舍李倩可殿中丞制〉、〈審刑院詳議官太子中舍李倩加上騎都尉制〉二文，若兩者為同一人，則李倩大約為真宗、仁宗、英宗時期的人物。見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861。

¹⁸⁷ 《群書考索》，別集卷 22，頁 1533。

¹⁸⁸ 見《資治通鑑》，卷 189、190。武德四年「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武德五年「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

¹⁸⁹ 褚遂良的上書，可見於《資治通鑑》卷 197、《舊唐書》卷〈褚遂良〉、《新唐書》卷〈褚遂良〉皆有收錄上書內容，但《資治通鑑》與《新唐書》選錄的部分較少，

¹⁹⁰ 唐太宗對此事的回應，只見於《資治通鑑》，卷 197。新舊唐書皆未有此段資料。

¹⁹¹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見《資治通鑑》，卷 197。

的態度、他個性的影響來批評，這呈現了章如愚等人重視心性的思考方式。另外，雖然他們批評唐太宗的待夷態度，但並不否定其才能，論中往往也說到「太宗明達」、「太宗聰明英武」、「志氣英果」、「夫勩之才豈過太宗哉」、「唐太宗如彼其才」等，顯示唐太宗個人仍有值得稱許之處。

但章如愚等人對於其制夷的評價並不高，這或許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有關。南宋與金的南北對峙，到了宋寧宗時期遭遇了一場變局，即「開禧北伐」。章如愚與葉適皆為宋寧宗時期的人物，葉適更是活躍於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為韓侂胄所用。在本文第二章中已提到，章如愚的傳中說他「開禧初，被召上疏，極諫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¹⁹²若章如愚贊同葉適對制夷的意見，很可能提出反對開禧北伐的諫言。我們無法得知章如愚對開禧北伐的意見為何，但《群書考索》其實呈現了他的夷狄觀，從他對過去世界的評論，我們或許能推測他對當前情勢的觀感。

因此，就對夷狄的政策來說，唐太宗並不符合「有道之君」的標準。三代以下的君主皆未納入君道門，也並未被選為一個以「人物」為主的描述對象，而是中國歷代各項制度、政策中的參與者。由此，我們也可看出《群書考索》中對「人物」的不同態度。



¹⁹² (明)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台北：新文豐，1988)，卷7〈文學〉，頁448。

第三節、歷史人物的分析方式

一、分析方式

章如愚可以說是一個資料編纂者，但是一個人對於事物的分類編輯，必定也隱含他的想法和意見，這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作者選用的內容以及選擇的人物表達了他的思想與認同，這在上節已詳述過。此節欲從他的分析方式探討，亦即探究作者如何編排這些資料。而章如愚在這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分類」與「下標」。

首先關於分類。章如愚按照歷史人物時代先後，安放宋儒的意見，但是他遇到一個問題，也就是人物並列的情形。宋儒在論及歷史人物時，往往有二人、三人並列而論，進行歷史比較。此時究竟要以誰為主角，成了選擇和分類的一大難題。章如愚採用的方式是，另設一項分類，來安放這些意見，如另設「堯舜」、「孔孟」項目。另一個方法是，採用「附」的方式，例如在「孔孟」下註明「顏子附」，或像是在湯的「順天應人」條下註明「武王附」。此外，還有另一項難題，就是一些較宏偉的議論，不僅提及許多人物，甚至橫跨多個朝代，這些並不適合單放在某一人物之下，但又與君道相關，對此章如愚又另設條目，例如「夏商周」、「周」、「秦」等。從這些另設分類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在宋人的歷史論述中，有一些思想集合體是被強調的，例如「堯舜」、「孔孟」、「夏商周」，對當時的人來說，這些人物或朝代有許多的共通處，在進行論述時必須相互聯繫延伸。

然而，由於這些議論皆非章如愚所出，因此在人物的分配放置上，不免產生了矛盾。例如在〈聖賢門〉討論到伯夷、柳下惠時，章如愚選用了王安石的「以身救天下之弊」，此條前面曾經提及。王安石在這條意見中，討論的並不是只有伯夷和柳下惠，還有伊尹：

聖人所以太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告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¹⁹³

此處的伊尹，被認為有「多進而寡退」的弊病。但在〈臣道門〉裡講到伊尹，則肯定他的以道自任，認為他能取信於天下，因此他廢太甲，「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後又復太甲，而「太甲不以爲專」。¹⁹⁴因此兩邊的伊尹形象似有所矛盾，評價也不相同。但細究可發現，這是由於從兩種不同角度來論伊尹的結果，在作

¹⁹³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聖賢門〉，續集卷 56，頁 1345。

¹⁹⁴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5，頁 1334。

爲聖賢的部分，伊尹與伯夷、叔齊相比略遜一籌，但是在作爲臣的部分，卻值得效法。這是章如愚在編寫時，不免會出現的矛盾。

其次關於下標。章如愚選取的宋儒言論，往往是擷取他人論著中的幾段文字，因此在編排時，必須下適當的標題以呈現此段文字的主旨。我們可以看看章如愚如何掌握文章主旨，例如在〈君道門〉談到堯舜的這段文字：

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渾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草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銖銖銖，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汙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曆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廢羲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呂祖謙）¹⁹⁵

章如愚對此段文字做了一些小幅刪減，並命名以「敬天」。此文完全未提到「敬天」二字，呂祖謙也未說明堯舜不廢羲和之曆象、璿玉之璣衡的原因，但章如愚閱讀此段文字，細心體會堯舜之意，更欲點出呂祖謙的未竟之言。堯舜不廢曆象璣衡的原因，在於他們能「敬」，敬的對象不只是羲氏和氏、璿玉璣衡，更是他們仰觀俯察所得的天地運行之理。因此章如愚爲此段下標爲「敬天」，可以說是用心閱讀，體會聖人之意的結果。同樣在「外天下」、「先覺覺後覺」中，¹⁹⁶當文句無法提供直接的標題時，章如愚便依自己的判斷提出標語。

但是章如愚在下標方面，有時也與原作者意旨不合，例如在〈聖賢門〉討論到孔子的這段資料：

夫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范祖禹）¹⁹⁷

章如愚對這段文字下的標題是「門人皆有用之才」。此文是范祖禹對於《論語》〈先進〉中，孔子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的評論，他的這段評論也被收在朱熹的《論孟精義》中。¹⁹⁸章如愚應該明白范祖禹這段話的重點其實在於「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否則他也不會將之留下，而應該僅留前面對孔子門人的敘述。但他卻以「門人皆有用之才」爲題，忽略了范祖禹對這些人遭遇的感慨，這是爲什麼呢？筆者認爲，這是因爲章如愚欲用標題來呈現聖賢的各項特點，在「孔子」的這項分類下，「門人皆有用之才」正能表達孔子爲師的身

¹⁹⁵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3。

¹⁹⁶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4、1315。

¹⁹⁷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38。

¹⁹⁸ （宋）朱熹，《論孟精義》（台北：台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6 上，頁 245。

分與重要性。因此雖然有背於原作者的意思，章如愚仍然選擇這樣的標題。

如同上述，章如愚對各文句的下標，可以呈現他想表達的歷史人物特色。而這樣簡短的標語，也是一種簡便而快速的知識呈現，這是《群書考索》整體的特點，讓讀者能透過目錄，立即掌握重點，即使不去翻閱內容，從分類的細目中，也可以立即了解這些君臣聖賢的特色。

因此在論述這些歷史人物時，掌握每個人物的重要事蹟是章如愚最重要的工作，其所挑選的宋儒言論都要根據這個前提來進行。例如堯之用舜、去四凶，舜的被試煉、處理政務、解決人倫問題，禹的勤儉、治水、傳子問題。而這些言論，往往都先提出一個歷史問題，再加以解答，或提出一些歷史之定見，再加以反駁。例如殷高宗因夢用傳說，此事歷來爲人所爭論，在「高宗」這一項就有四條資料談論傳說。其中一條是「用傳說不可以常論」：

嘗恠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是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帝試舜斯可矣。¹⁹⁹

此條章如愚未註明出處，但其實是出自陳經的《尚書詳解》。²⁰⁰這段資料解決了高宗用傳說的疑慮，那就是此二人不能用常人的情況視之，肯定高宗與傳說之聖。同時也比較了漢文帝及漢光武帝的事蹟，認爲這都不足爲信，因爲他們都沒有高宗與傳說那樣的資質。但是，讀者一定會產生一個疑慮，爲什麼堯與舜不是這樣的情形呢？他們不也是聖人嗎？爲何舜必須經過堯的試煉呢？因此章如愚選取了另一條資料，即呂祖謙的「用傳說」一文：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帝不知舜，方且觀其刑於二女，而又歷試以諸艱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畧，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復請問其目。曾子之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捷徑。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呂祖謙）²⁰¹

¹⁹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4，頁 1324。

²⁰⁰ （宋）陳經，《尚書詳解》（台北：台灣商務，1983），卷 17，頁 788。

²⁰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4，頁 1324。

在這段資料中，說明了堯帝試舜與高宗用傳說的差異。一則是詳，一則是略，但都是同一件事，只是「各宜其時」罷了。另一個原因就是，舜是由別人所推薦的，因此堯必須再三考核，傳說則是高宗自己認可的，因此不須再作試煉。從這兩個例子可看出，章如愚在選擇、編排資料時，能夠把握問題，把適當的言論加以排比，讓讀者從中得到一個經過論證、比較而產生的答案。也比單純閱讀史事的記載，得到更有意義的歷史知識。

二、重視「君臣關係」

從前述殷高宗與傳說的例子，可以延伸出下一個問題，也就是君臣關係。章如愚在進行君臣論述時，「君臣關係」是他注重的焦點之一。從〈君道門〉與〈臣道門〉中，也能看出章如愚理想中的君臣關係。余英時先生認為，宋代的道學與治道有緊密的關係，「內聖」雖然是道學的特色，但是「外王」才是士所要追求的目標，士最終要與君王「共治天下」。而君臣之間的關係，不管是程頤還是朱熹，都嚮往一種「虛君制度」，君主修德而任用賢臣，臣子負責推行政務。²⁰²章如愚對於君臣之際也有類似的看法。

章如愚選擇與君臣相關的言論約有十幾條，歸納而得的重點，君主的「修德」與「用人」的確為第一要務。在〈君道門〉中的「舜能用君子之朋」一文說道：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修）²⁰³

這段資料此出自歐陽修著名的〈朋黨論〉，²⁰⁴強調君主必須明辨君子小人，才能像舜一樣為「聰明之聖」。但堯在這段資料中似乎失去了他身為聖君應有的行為，因此在章如愚引的另一文「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說道：

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舉而委之於舜，俾得以行其賞罰焉。蓋使舜而不有是功，則堯亦無以明舜於天下。²⁰⁵

說明堯自然知道此四凶之應罰、此十六相之應舉，但只是借舜之力去完成，讓天

²⁰²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 156-248。

²⁰³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6。

²⁰⁴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台北：中華，1965），卷 17，頁 4-5。

²⁰⁵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5。

下明白舜的才能，以繼任其位。在另一條引用蘇軾的「四凶非盡小人」中，也說「若堯世有大奸在朝，則堯不足為堯也」。²⁰⁶因此無論是堯或舜，都能做到辨明所用之人，這也是宋儒對君主的期待。

除了舉用賢才之外，章如愚也認為君臣之間的心意相通是很重要的。如他引石宗昭之言，說「昔堯舜之世……君臣之間無遺情」。君臣之間因為有「誠意」，因此「無不通之情」。²⁰⁷又如湯與伊尹，從伐桀這件事可以看出其君臣之心相通，見章如愚引蘇轍之言：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爾。²⁰⁸

這段文字重點雖在於湯之不欲遽奪夏，但從中可以看出伊尹和湯之間的互相信任，心意相通。這是宋儒對君臣關係的美好嚮往。從上述所引之例，可以看出宋儒的確認為君主應該盡到舉賢去凶的責任，但似乎君臣之心相通是更臻完美的境界。

在「用人」之外，還有對君主「修德」的論述，如舜之「忘貧賤與富貴」，禹之「勤儉」、「無間然」，文王之「涵養」等，而這也是其之所以為聖人的原因，因為他們的道德與行為，對後世的影響都非常大。章如愚引陳孝錫「察人倫」之論，就說明了聖人對後世的影響：

舜之心，實為天下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易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況不為頑嚚者耶！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矣，況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況無舜之難且變耶！舜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法。（陳孝錫）²⁰⁹

舜如何解決其人倫問題，是影響後世孝道觀念的重要因素。因此陳孝錫才會說「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世之利害」，聖人的影響是超越時代的，因此才會成為「千萬世之法」。

透過對聖人道德的強調，使聖人本身成為一個概念，而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

²⁰⁶（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5。

²⁰⁷（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4。

²⁰⁸（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4，頁 1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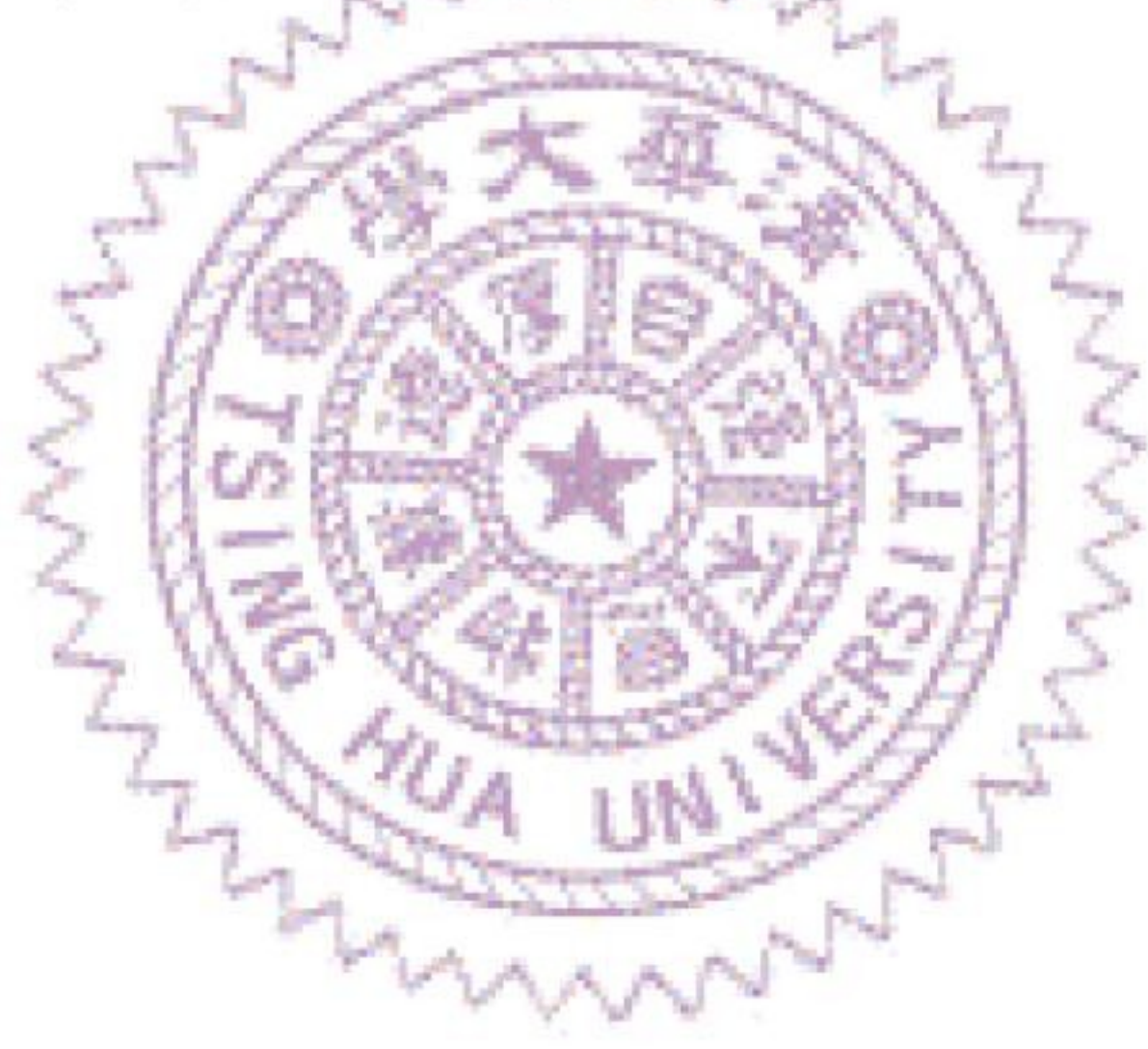
²⁰⁹（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53，頁 1316。

人物。章如愚引鄭鑑的「與人同」一文就說道：

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强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孝悌，孝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孝悌所以為真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人者，皆勛華之徒也。漢武之欲參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輩堯舜，思以此而齊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輩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律。（鄭鑑）

從此文可看出，「堯舜」本身就是道，君主要從自身去尋找堯舜，而非做某些事去比附之，這樣只是使原本是「一」的，劃分為「二」。從章如愚選擇這樣的言論來看，章如愚本身受理學的影響極深，他也相信天理就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這也呈現出宋儒對漢唐之帝的看法，他們認為漢武帝、唐太宗都不是君主所應效法的對象。

總結章如愚在論述歷史人物的方法，雖然只是分類與下標，但是其中仍呈現了章如愚本身的思考與認同，如果我們不去深究其價值，就很難去理解為什麼這樣的書得以傳世，其中必有值得稱許之處。



小結

《群書考索》與其他類書論及人物所引資料性質有所不同，大多為宋代諸儒意見，宋儒的意見則多與理學相關，這反映了《群書考索》此書的時代特色，因此無論是論史或論人，皆有濃重的時代氛圍。例如對君臣關係的重視，章如愚選擇君道、臣道論述，並不只是要討論君臣本身的作為，更強調君主與臣子之間的心意相通至關緊要。透過章如愚對人物的論述，反映了宋儒對君臣之際的看法。

然而《群書考索》並不完全符合宋代理學主流，因為從諸儒意見的數量分析可知，章如愚的學術傾向偏於浙學，其中以呂祖謙的意見為大宗。浙學重實學，更關懷現世，因此雖論歷史人物，實隱喻現實政治狀況。如在唐太宗禦夷狄的部分，細緻的討論唐太宗如何對待外族，其實反映的是南宋與北方民族抗衡的現實。不過，他注重太宗本身對夷狄的態度，以及其個性的影響，較少戰略上的評論。此自心性論人的特質，與宋代理學的特質相關。

宋代理學也影響了章如愚在歷史人物的選擇，以符合「道」與否的標準，來選擇他認為值得論述的歷史人物，此受到理學譜系的影響。因此有所謂君、臣、聖賢，這些都是承載道之人。此「道」即是堯舜相傳之道，在章如愚的理解中，只有上古的君臣與聖賢人物能做到道的相傳與繼承，即使秦始皇被列入〈君道門〉，也只是做為反例。這除了與章如愚多用宋儒對《尚書》的闡釋有關之外，也反映宋代理學尚古的風氣。《群書考索》中亦有論及人物的部分，但並未像此三門獨立論之。如〈夷狄門〉講歷代君主制夷的情形，提及漢武帝、漢宣帝、唐太宗，顯然其並未符合君道，而未被納入君道門。或許章如愚的選擇失之偏頗，但是也反映了宋人的價值觀。

由於章如愚採用了宋儒的意見，在呈現方式上，必須要有適當的安排，才不至於錯綜雜亂。章如愚運用了「分類」與「下標」的方式，來反映他的選擇和思考。在「分類」上，他以時代順序為原則排列，有時也根據人物的特性合併成組而論。在「下標」上，章如愚則能掌握文章意旨，給予適當標題，讓讀者一見標題就能掌握人物特色。過去對《群書考索》的理解，往往只以為是資料的堆砌，但是其中蘊含了章如愚的選擇、安排與發揮，此不可不知。



第四章、《群書考索》歷代制度分析

本章欲分析章氏對歷代制度的看法。由於《群書考索》全書注重的制度包含經濟、軍事、教育三個層面，故筆者欲從禮樂、官、學、兵、財賦制五個部分進行探討。首先分析章如愚對制度的分類，從中了解其分類的依據與精神。接著再探究其對制度的編排方法，理解章如愚的為學方式。最後則是根據其所引用的史論，討論章如愚在制度上的思想與關懷。

第一節、《群書考索》制度分類與引用資料

理解《群書考索》對制度的安排，主要的工作應在章如愚如何「分類」上。進而了解章如愚對知識分類的依據，並探索其分類的個人思路以及與宋代歷史脈絡的結合。《群書考索》中的大致篇目分類，在第二章已列表做過說明（見第二章表1），在這些篇目分類中，筆者整理出與制度相關的部分。前集、後集、續集、別集皆有關於制度的內容，然而並非整體連貫，各類制度散見在各集中，其內容大致包含禮樂、官、學、兵、財賦制五大部分。以下根據此五大部分製成細表以說明之（詳見本節附錄）。田地、水利、刑、封建等制度，由於篇幅較小，故不另做細表說明。律、曆則因與禮樂內容重疊，而劃入禮樂此部分。詳見下面五張表：

表四、《群書考索》禮樂制表

一、集	二、卷	三、門	四、內容
前集	卷 23-24	〈禮門〉	歷代禮類、朝儀類、宴享類、封禪類
	卷 25-27		郊祀類、宋朝配享類
	卷 28		明堂類
	卷 29-30		廟制類
	卷 31		禮書類、朝儀、祭天地
	卷 32		明堂、社稷、雜祭祀、時祭禘祫、禘祫、仲春群祀、廟制昭穆
	卷 33-35		禘祫類、群祀類、六宗類
	卷 36		釋菜釋奠類、告禮類、祈報類、恭謝類、壇壝類、牲牢類、酒醴類、鬱鬯秬鬯類、裸類、圭璧類、圭幣類
	卷 37		鄉飲酒類、大飲蒸類、射類
	卷 38		旌旗類、佩綬帶、冠帶、衣裘、鹵簿儀衛、門觀宮殿、臺觀館閣樓室、唐車輿

			衣服令、唐洪文定制禮儀、洪文沿革、王儉學士館、宋朝三館、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煥章、華文
	卷 39		祭祀、禮制、禮器、冕服、車
	卷 40	〈儀衛門〉	鹵簿類、車輅類
	卷 41-42	〈禮器門〉	車輅類、旂常類、冕服類
	卷 43		后服類、舄履類、佩類、采就類、帶類、佩魚類、贄儀類
	卷 44		圭璧類、笏類
	卷 45		樽罍類、爵斚類、器用類
	卷 46		鼎類、寶璽類、印綬類、符節類、刀劍類、博物
	卷 47	〈樂門〉	樂、律、奉天、祖宗
	卷 48-51		樂名類、樂器類、樂舞類、樂歌類
	卷 52		律類
	卷 53		律呂類
	卷 54-55	〈曆數門〉	曆類、閏餘類、時令類
	卷 56		天文器類、占候類
	卷 57	〈律歷門〉	星官類、天文類
	卷 58	〈天文門〉	天文類、中星、分野、渾天儀、刻漏、曆
續集	卷 19	〈律曆門〉	律曆
	卷 20	〈律門〉	律數
	卷 21		律聲、律量、律權衡
	卷 22-23	〈曆門〉	曆
	卷 25	〈禮樂門〉	禮樂
	卷 26		禮
	卷 27		樂、樂律
別集	卷 13	〈禮樂門〉	禮樂、典禮、禮書、禮器、射禮、鄉飲酒、冠禮、贄禮
	卷 14		祭祀之禮、封禪、郊祀明堂、社稷、宗廟、禘祫烝嘗、裸禮、蠟祭、禋祭、雩祭、祠禴、祭器儀
	卷 15		車服、玉佩、圭笏、樂律、樂器
	卷 16	〈曆門〉	古今曆、閏法、土圭、漏刻、正朔、年號、遁甲
	卷 17		渾天儀、渾象疏

表五、《群書考索》官制表

一、集	二、卷	三、門	四、內容
〈後集〉	卷 1	〈官制門〉	官數類、官品類、官制總序（伏羲—隋）
	卷 1-4		總序類（唐—宋）
	卷 5-6		三公類
	卷 7		翰苑類、列曹尚書
	卷 8		六部類
	卷 9		九卿類
	卷 10		秘書類
	卷 11		太學、武學、將作監類、軍器監類、日曆所、東宮類、會要所、敕令所
	卷 12		東宮官、王府官、六院、四轄、三衙類、閣職類、四廂類、環衛官類
	卷 13		監司類
	卷 14		太守、沿邊太守、通判、縣令、京畿令、縣丞、主簿、薦舉、銓選
	卷 15		考課類
	卷 16		吏祿類
	卷 17		職田類、任子
	卷 18		設官沿革類、封爵
	卷 19		文階類
	卷 20		武階類、太史局類、醫官類、后妃、外命婦類
	卷 21	〈官門〉	唐官制
	卷 22-24		漢官
	卷 25		官兵士風田賦刑法曆法、監司、守令、冗官、久任、爵祿、賞罰、銓選、諫諍、考課、循吏、薦舉
〈續集〉	卷 29	〈官制門〉	歷代官制
	卷 30		三公、三公九卿、三省、六省、都司
	卷 31		宰輔
	卷 32		唐宰相、宋朝人材、參樞
	卷 33		六尚書類
	卷 34		翰苑
	卷 35		漢館閣、宋館閣、史館、寺監

	卷 36		臺諫、經筵
	卷 37		監司、郡守、守令、縣令、奉使、內外官
	卷 38		吏治、考課、薦舉、選舉、銓選
	卷 39		爵秩、資格、任子、久任、人才、節義、朋黨
〈別集〉	卷 18	〈人臣門〉	三公、三省、宰相、執政、樞密使、侍從、給舍、臺諫、監司守令

表六、《群書考索》學制表

一、集	二、卷	三、門	四、內容
〈後集〉	卷 26	〈官門〉	學制類、唐館
	卷 27	〈士門〉	學制類、小學
	卷 28		學法類
	卷 29		國子監解額、武學
	卷 30		宗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醫學、儒學、蕃學
	卷 31		天子學
	卷 32		選舉教養之法、漢選士之法、魏九品中正、兩晉選舉之制、宋代選舉之制、齊代選舉之制、梁代選舉之制、陳代選舉之法、後魏選舉之制、北齊選舉之制、後周選舉之制、隋代選舉之制、唐取士之科、宋朝取士之法
	卷 34		唐取士之科、科舉、學校、教化、射、博洽
	卷 36-37		貢舉
〈別集〉	卷 19	〈士門〉	科舉、經義、詞賦、論策

表七、《群書考索》兵制表

一、集	二、卷	三、門	四、內容
〈後集〉	卷 38-40	〈兵門〉	兵制類
	卷 41		州兵、民兵
	卷 42		用將、教閱
	卷 43		兵食類、兵器

	卷 44		馬政類
	卷 45		車戰類、舟師
	卷 46		守邊類、冗兵類
	卷 47		兵法類
	卷 48		歷代兵類、漢軍政、漢兵、材官、車騎、樓船、漢南北軍、雲臺諸將、漢唐備禦之策
	卷 49		漢邊兵、漢兵將、漢唐邊備、唐府兵、唐藩鎮、三國晉宋兵、將、擇將
	卷 50		御將、任將、兵食、兵法、兵器、軍捷、軍旅、車戰、舟戰、馬政、馭夷狄、恢復、屯田
〈續集〉	卷 40	〈兵制門〉	周兵
	卷 41		漢兵
	卷 42		三國養兵、晉兵、六朝兵、隋兵
	卷 43		漢唐兵、唐兵、府兵、方鎮、禁兵
	卷 44		宋朝兵
〈別集〉	卷 21	〈兵門〉	兵車、兵法、鄉遂之兵、保伍、井田軍賦、府衛兵、禁兵、州縣兵、古今兵制總論

表八、《群書考索》財賦制表

一、集	二、卷	三、門	四、內容
〈後集〉	卷 52	〈財門〉	漕運、常平義倉、蓄積、鹽鐵酒茶、和糴、財用、稅賦、賦稅、唐賦稅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錢、楮
	卷 53	〈賦稅門〉	田賦類
	卷 54		雜賦類、財賦總論
	卷 55		漕運類
	卷 56		役類
	卷 57		茶鹽類
	卷 58		酒類、銅錢貨幣之論
	卷 59-60		銅錢
	卷 61		鐵錢類
	卷 62	〈財用門〉	楮幣類、坑冶、鬻爵
	卷 63		鬻僧類、經總制、月椿、會計錄、數目

	卷 64		內庫類、貢獻、四夷方貢、續本朝內藏庫、元豐庫大觀東西庫
〈續集〉	卷 45	〈財用門〉	周財用、周漢唐財用、漢財用、唐財用、宋朝財用
	卷 46		東南財賦、東南牧養、東南歲入、東南縣邑民財、九州所產、九州之田、九州田賦、九州土貢、唐鄧汝穎陳蔡許洛地利、兩浙地利、荊州地利、楊州地利、淮浙財賦、江淮巴蜀財賦、兩淮湖廣四川財賦、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兩浙版帳江西月椿、兩浙租賦、諸郡土貢、國都漕運、關中漕運、汴京漕運、關西漕運、國都漕運
〈別集〉	卷 20	〈財用門〉	財、錢幣、節財、內帑、上供、經總制錢、稅賦、商稅、榷酤、榷鹽、和買、和糶

從此節附的五個表，可以發現幾點特殊之處。首先，在《群書考索》中同為一制度者，分散在書中各集，五大制度都有同樣的問題。如官制的部分，除了出現在後集，也出現在續集中；又如財賦制度，各出現在後集、續集、別集中。由此可推敲《群書考索》的編纂情形，這代表《群書考索》各集可能並非同一時間修訂而成，否則作者應該會將之匯集在一起。其次，同一制度中的類目，在下一集中也會出現，例如在官制方面，後集、續集、別集重覆的類目就有「三公」，而在兵制方面，後集、別集中都有「兵法」一類，此類情形頗多，由此可看出各集完成時間不一，當前集完成後，續集可能就以前一集的類目為依據，新增了部分內容，而根據新增的內容，可能也對類目有所調整，因此造成其類目疊床架屋，但內容卻沒有重覆的情形。

《群書考索》類目重覆的問題暫且不論，這些分類皆顯示了作者對知識如何整理、編排的看法。就以《群書考索》中的各個小類目來說，這必須追溯至宋代類書的分類傳統。就以宋代類書普遍的編纂形式來說，其源自於北宋初期官修類書的樣貌，如《太平御覽》，為了做為統一王朝的象徵，其知識分類涵蓋天地、無所不包，大多從開天闢地說起，而以花草鳥獸做結，尤其注重各項制度細節的呈現。例如在禮樂律曆制度方面，《群書考索》中諸如冕服、車輅、射禮這些細節的分類，皆源自傳統類書。

排除細節的呈現不論，從較大的制度分類上來說，《群書考索》另外還反映了宋代對於制度中的重要議題的看法，這近似於「政書」的體例，反而不似傳統類書以開天闢地的主題為始。而這樣的改變與宋代類書的發展息息相關，南宋尤

其特別。類書發展至南宋時期，開始出現了專業化的傾向，²¹⁰以實用性質為主的類書日益增加，在閱讀需求上也從「覽」變成「記」。²¹¹北宋初期類書的編纂致力於包羅萬象，認為所有文化傳統要提供認識天地、人事的重要事情，²¹²但是到了南宋，科舉考試帶動了類書編纂的變化，²¹³《群書考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產生的科舉型類書。

但是章如愚個人的思路對《群書考索》的分類仍有影響，從他對制度順序的安排或可看出其思考要點。前面曾經說到，各制度雖被分散到各集中，但在同一集中對制度的安排大多有一定順序。綜觀全書，大致先是安排禮樂制，接著是官制，再是學制，然後是兵制，最後才是財稅制，這樣的排序或許有重要性先後的意義。在章如愚之前的制度代表作品，莫過於唐代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中的分類依序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可看出杜佑將代表民生的〈食貨〉擺在第一，再將〈選舉〉排在第二，〈職官〉為第三，〈禮〉、〈樂〉、〈兵〉則在這些分類之後。《通典》的排序有其意義，杜佑在自序中就說明：

夫理道之先在行乎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故職官設然後禮樂興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²¹⁴

由此可知，杜佑對於章節的安排有其道理在其中，杜佑認為國之制度應重視部分的有足衣食、教化、理道三項，終極目標是要「理道」，但是要達到此目標要先從「足衣食」開始做起，這與「倉廩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的傳統思想相合。²¹⁵但是章如愚並未留下序言說明其安排的原因，不過從《群書考索》各個制度引用的資料中，或許可以發現其排序或設置這些類目的意義。

《群書考索》四集對制度的安排，在各集中的順序大致是禮樂、官制、學制、

²¹⁰ 姚政志，〈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政大史粹》，15（2008.12），頁63。

²¹¹ 戴建國，〈漢宋之間類書的嬗變〉，《圖書情報知識》，3（2008.5），頁74-76。

²¹²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2001），頁159-160。

²¹³ 王安石改革了科舉重詩賦的現象，而以試策論為主。但到了南宋，科舉考試策論試題與答案漸趨標準化，為此設計的類書也漸增。見 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55-85. Hilde De Weerd,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special volume, Qu'étaien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 en Chine*, 2007, 77-102.

²¹⁴ （唐）杜佑，《通典》（台北：新興，1956），卷1，頁9。

²¹⁵ （周）管仲，李勉註譯，《管子》（台北：台灣商務，1990），〈牧民第一〉，頁1。

兵制、賦稅制。²¹⁶相較於《通典》，我們可以看出章如愚認為制度應首重禮樂，不只在排序上，份量上也大過於其他制度。在此，章如愚強調了禮樂的功能和重要性：

西漢《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為急。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箎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²¹⁷

此文引自《漢書·禮樂志》，²¹⁸但是經過章如愚的刪減，措其精要。其中說明禮與樂治內修外的作用。另一方面，章如愚也說明聖人制禮作樂的原因：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之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友于閨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遵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略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大而原本以俟君子²¹⁹

因為禮樂之本，可以改變人之心，使之「遵情性、復仁義」，因此聖人制禮作樂以安定秩序，除了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的「本」，也要有「玉帛牲幣」、「鐘鼓管絃」的「文」來彰顯。從章如愚對禮樂功能的重視，我們可以推測，章如愚認為國家制度應首重人心的安定，因此將禮樂放在制度之首，這與荀子的政治概念相近，認為人的欲望應由禮約制，應以禮為中心，建立起一個平治的社會。相較於《通典》以民生為首的觀念，章如愚認為應將最重要的「理道」放在前面，標示出精神意義，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或許章如愚認為人心陶冶才是最基礎的制度需求，此受到南宋理學強調心性的影響亦甚明顯。

另外，從上段引文可以看到，雖然章如愚體認到禮樂之本的重要，但似乎對於這方面的把握沒什麼信心。因此在禮樂的「本」和「文」上，章如愚選擇了「文」進行大略介紹，然後「大而原本以俟君子」。由於這段總論放在「續集」，文中所謂「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可能指的是「前集」、「後集」，比較細節性的資料蒐集。從此也可以看出，章如愚的著作雖然以彙整資料為主，但是他清楚意識到自己做

²¹⁶ 見第二章表 1。

²¹⁷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1982），前集卷 23，頁 171。

²¹⁸ （漢）班固，《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1962），卷 22，頁 1027-1029。

²¹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25，頁 1139。此文查無作者，疑為章如愚親撰。

的只是「文」的整理，還有更高遠、更重要的「本」存在，從這裡可以看到他對自己作品定位的看法。

其次是「官制」的部分，其份量可與禮樂制並駕齊驅。〈官制門〉總序說道：

三代之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故凡君臣庶民皆人也。人不能以自治，故必推其能順天地以治人者，戴之而謂之君。君不能以獨治，故必擇其能代天工以共治者任之，而謂之臣。君臣之間，兩盡其職，則民得其所矣。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生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為民，職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家設官以為民極，皆順天地代天工者也。以一君而統百官，而理萬民，所謂本也。以萬民而養百官，以百官而奉一君，所謂本立而末自舉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不知所本，而君臣重於自奉，輕於為民，是豈天地之心哉？故夫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苟可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革也，寧因。必攷已事之驗，不為鑿空之談，則古今官制名實之是非、煩簡因革之當否，其如指諸掌矣。²²⁰

章如愚先說明了「職官」出現的原因，即是因為「人不能自治」的關係，因此才有「君」、「臣」，而這兩者主要任務是「順天地、代天工」。而官的位置是處在「君」與「民」之間，上需奉君，下則有民養。接著說到建官的原則，必須與實際事務相配合，有是事才有是職。在禮樂門中，章如愚點出禮樂是人最終要追求的目標，但是因為人不能自治，所以要有實行禮樂的人，因此以官制門接續在禮樂門之後，說明為官的任務和選拔原則。

在官制後面，接著是學制的部分，總論性的文章可見後集〈士門〉談到儒學的一則總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章如愚對「學」的想法：

言理學者主張程，言數學者主康節，而言經學則泰山之明復、徂徠之守道，而安定先生則其待學者也。宋初士以浮靡相高，以雕刻相尚，體用之學懵然未之知也。公也以身先之，……學者明體用以為政教之本，先生之力居多焉。……。當是時，出其門者淵篤純明、溫直簡諒，色色有之。而治邊防者有人，興水利者有人，政事文學不可悉數，安定之功大矣。或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安定之學猶未離乎科舉者。噫！有所學必有所用，學而無用與不學等耳，使人人盡棄科舉而談虛空，則國誰與理民誰與

²²⁰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 29，頁 1167。

治耶？……安定之教非專以科舉也。伊川嘗曰：「凡從安定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可知」，伊川亦不敢忘其本也，吾從學者之妄雌黃，故具言之。事並見前。杜駟文²²¹

章如愚引的這段文字出自林駟之語。²²²此文主要論述對象是胡瑗，先說明其在宋代儒學上的貢獻，尤其是在「體」「用」的調和上，最後再強調學必須兼顧「用」的層面。這段話可看出一位南宋士人對北宋初期儒學的追懷，²²³此問題正是宋代儒學的一大爭論，亦即「道」與「舉業」兩者之間的矛盾。從上引文字可看出，章如愚贊同林駟對「學」的意見，認為「學必有所用」，因此不能「棄科舉而談虛空」，《群書考索》基於這個理念，不只以科舉為主要目的，書中所提供的資料更以有助於政教為主。由於治理國家的官員是從「學」的制度或機構產生，因此「學制」接在「官制」後面是合理的。

林駟的這段話其實也回應了自己作品的意義，他曾與黃履翁著《古今源流至論》也是記錄宋代思想學說、史書的一部科舉型類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之與《群書考索》並列，認為此二書是在宋代以策論取士的影響下，產生的科舉型類書。²²⁴我們可說，《古今源流至論》和《群書考索》關係密切，產生背景相近，甚至章如愚在歷史制度源流方面，也多以林駟的意見為參考對象。此書類目較為繁雜，多為小類目合而成卷。如卷一有太極圖、太極論、西銘、性學、心學、中、仁、樂道、中庸大學。卷二有語孟、古史、新舊唐史、通鑑、離騷、文選文粹文鑑、杜詩、雜體。卷三有策試、書法、方言、鄉評、慶曆人材、元祐人才等等。共有前、後、續、別四集，共十卷。《古今源流至論》雖然並沒有制度上的分類，但是在資料的選擇上與章如愚有相近之處，都是引用宋儒之意見，在內容上更加受到理學的影響。

在兵制方面，章如愚並未有綜論性的文章，而大多是在各個主題下分列小的總論。例如「總論軍糧」、「總論軍器」、「總論馬」、「總論車戰」、「總論舟師」。然而這不代表不重視兵制，章如愚在書中提到：

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吳兵書，皆兵志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班孟堅漢史，止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傳記之間，本末源

²²¹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 30，頁 692。此處「杜駟」應為「林駟」之誤。

²²² 林駟，字德頌，寧德人。清修苦學，博極群書，九經註釋，暗記成誦，尤習當代典故，領嘉定中鄉薦。著《源流至論》、《皇鑑》。傳見（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1962），別附卷 2，頁 39-40。

²²³ 宋學以胡瑗為首，可見於清代黃宗羲之《宋元學案》。然而此處說法更早，顯見宋代士人已認為胡瑗為宋學之開創者。

²²⁴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卷 135，頁 2806。

流無所統壹，聊於暇日，採摭大要，所以備漢以來兵志云。²²⁵

章如愚在這段文字中說明了幾點意見。第一，他認為每個時代必須對當時代的兵制有系統性的論述，而此是史家的任務；第二，漢以來的史官皆未重視兵制的部分，直到宋代歐陽修的《新唐書》才為兵作志；第三，為了彌補歷代以來對兵志的忽視，因此他考究歷代的兵法、統整雜亂的史傳，將兵制作大概的陳述。

章如愚如此重視兵制並非沒有原因，此肇於對宋代兵制的反省。例如在《群書考索》續集中，兵制門討論了各代養兵用兵之策，但篇幅最多的還是在宋代的部分。而從篇名「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太宗兵制壞於童貫」、「開禧用兵不是處」等，以及多處檢討政策的部分，²²⁶可看出章如愚對於宋代用兵的深切關懷，以及強烈的失望感。此連結到他在開禧初年上奏，因忤韓侂胄而罷秩歸鄉的事件，²²⁷可以想見章如愚對於開禧北伐的不認同。在章如愚之前，浙東學者陳傅良亦有《歷代兵制》一書，論述從周代至宋代兵制的得失，其中尤重宋代的部分，亦是因於南宋時目睹兵制的敗壞而著此書，其與章如愚的關心亦同。

財賦門也是全書篇幅極廣的部分，但是放在其他制度的最後，可見他與杜祐的視角並不相同。杜祐將食貨置於篇首，是注重教化人民的先後順序，認為應先足衣食再行教化，這與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概念相當。章如愚則將禮樂置於前，財賦置於後，是注重教化之核心，則較與荀子重視禮的概念相近。章如愚有「財賦總論」一文，²²⁸將歷代以來各朝的賦稅和國家理財的狀況簡介一番，等於是一篇小型的財賦史整理報告，但是時限卻斷在紹興年間，似未完成。章如愚認為，國家的財賦政策優劣，從三點可以看的出來：一則國用是否充足？二則徵稅賦是否造成百姓困擾？三則是否有適合的人才擔當大任？此為章如愚在財賦制度的基本態度。但就財賦門整體而言，從其類目的重覆和比重不一的情形來看，顯示這是所有制度中最為瑣碎並難以統整的部分，《四庫提要》曾稱《群書考索》「不免有重複牴牾之處」，²²⁹這樣的情形在財賦門中最為顯著。

章如愚對制度的論述依照時間順序及類別的方式進行。第一個方式，是以制度的時間為主軸。如官制部分，在〈後集〉卷一到卷四中，是以時間排序的方式論述，從上古論及宋朝。但自卷五之後，是以第二個方式，就各個官職詳述其源流。這樣的寫法帶來的好處是，前者可視為官制沿革史，後者較近於一般類書的名詞解釋。我們由此也可以考察《群書考索》的編纂傳統，其書雖有類書的特質，將知識分門別類。卻又有政書的內涵，不只有名詞解釋，而更重視制度的精神和

²²⁵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40，頁1243。

²²⁶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44，頁1267-1271。

²²⁷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無卷，頁3。

²²⁸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54，頁866-868。

²²⁹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35，頁2805。

其演變情形。因此在明代才有把《群書考索》、《通典》、《文獻通考》並立之說。²³⁰這可能是類書發展到宋代，因應文化形態轉變而產生的突破與結合。然而，從整體的類目編排而言，這些分類的名目，以現在的眼光看來，是相當凌亂的。首先是「門」的取名，如「財門」、「賦稅門」、「財用門」三者無明顯區別的門類，卻同樣出現在〈後集〉，顯示作者並未經過統整加以定名。其次是在細目定名部分，如「稅賦」、「賦稅」雖是同義名詞，卻在同一卷中並列為兩個分類。我們從這樣混亂的編輯手法來看，章如愚在寫作上似未先列明大綱，再安排資料的置入，而是以資料的內容，就地取名。卻在完成後，沒有進行統一整理的工作。

前面曾提到《群書考索》的性質像是政書而非類書，在此可將其對制度的分類與其他類書做一比較。如宋代著名的類書王應麟的《玉海》，共 200 卷，其類目依序為天文、律曆、地理、帝學、聖文、藝文、詔令、禮儀、車服、器用、郊祀、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宮室、食貨、兵捷、祥瑞、辭學指南。與《群書考索》的類目相較之下，兩者有許多雷同之處，在禮樂、官、學、兵、財賦制五大部份兩者皆有論及。並且在類目的排序上，亦是以禮樂為先，食貨為後，可見兩人與杜佑的排序角度皆不相同。但是細究兩者分類情形，又略有不同。如「車服」一類，在《玉海》中獨為一類，在《群書考索》中卻是歸於「禮門」、「禮器門」之下；「朝貢」在《玉海》中獨為一類，但在《群書考索》中卻是歸於「財用門」之下。這反映出兩人思維方式的不同，王應麟將《玉海》視作是網羅各項知識的總匯，因此內容包羅萬象，分類也較無層次。章如愚的《群書考索》卻欲以治世為主要目的，故其分類較大，並有層次輕重之分。此外，《玉海》中討論「禮儀」、「學校」、「選舉」、「官制」、「兵制」等制度的部分，雖也按照時代擺放其選取的資料，但是對於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變的敏感度似乎並不高。相較之下，在《群書考索》中出現對制度的統整性總論，以及針對資料所下的判斷性標題，在《玉海》中都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曾比較《群書考索》與《玉海》，說《群書考索》「較《玉海》雖瞻博不及，而詳於時政」，²³¹可見其與《玉海》的最大不同，在於《群書考索》不僅僅只是做為一部類書，而是欲對現實政治有所助益的一部治道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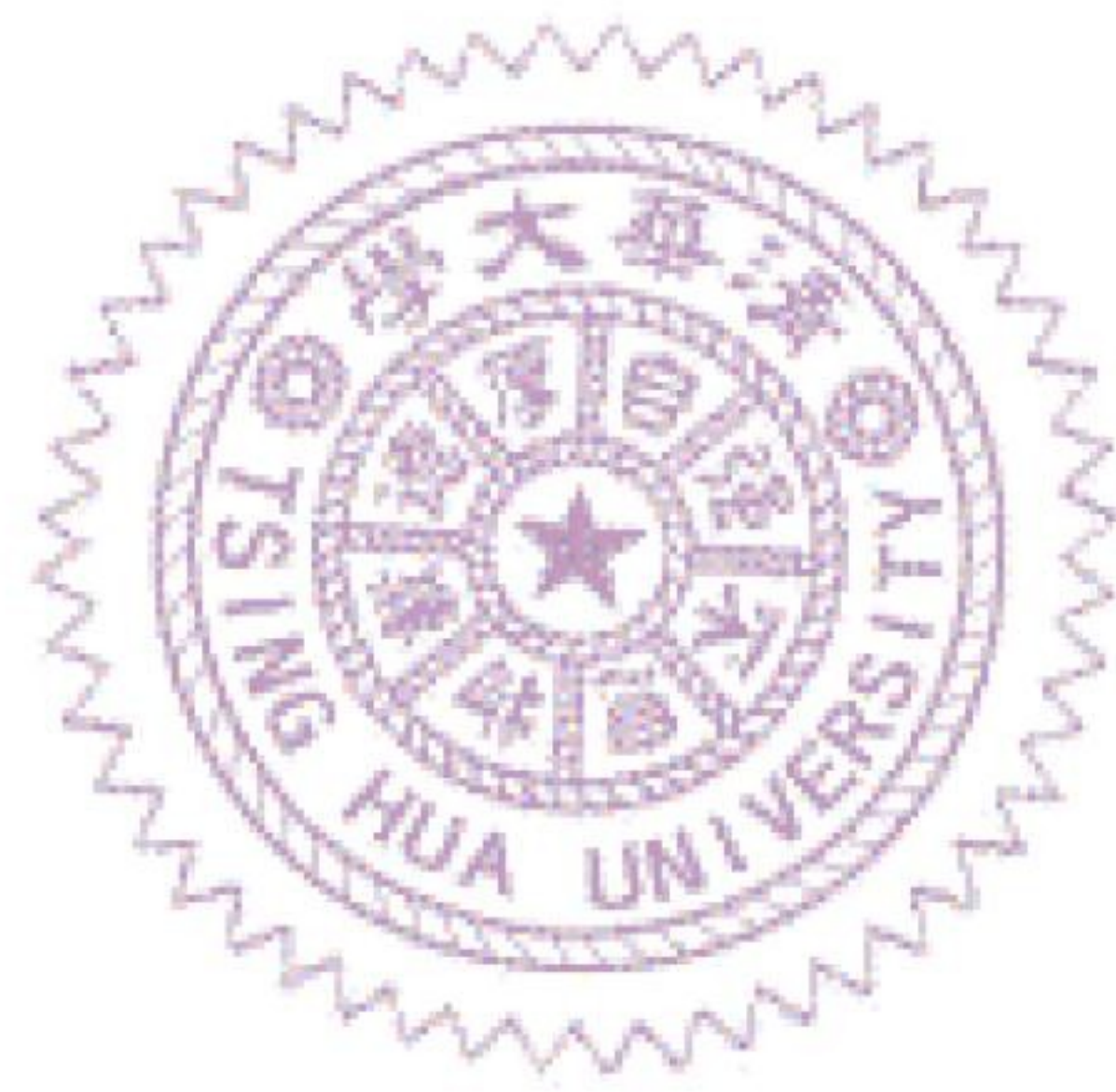
另外，關於《群書考索》制度類別中引用的資料也須做說明。在制度類別中，章如愚引用的資料，一部分是來自正史、實錄等官方檔案，一部分則是來自宋人的史論。在官方檔案的部分，其中較大宗的部分為《通典》內文。在唐代《通典》出現以前，制度史的記載大多依附於正史之下，但也因此被割裂其連續性，未有統整比較，也就看不出制度的變遷和因革損益。²³²《通典》具有的劃時代意義也

²³⁰ （明）茅坤，〈荊川先生稗編序〉，《茅鹿門先生文集》，卷 14，頁 651。

²³¹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35，頁 2804。

²³² 梁啟超曾說過：「紀傳體中有志書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記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仍發生兩種困難：敬不追叙前代，則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的應此要

就在此，將斷裂的制度史變成一種通史。故章如愚在制度部分如此重視《通典》，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宋人論制度的史論部分，則引用了朱熹、呂祖謙、陳亮、葉適、陳傅良、林之奇、曾鞏、石介、蘇總龜、黃庭堅、唐仲友、林駟等人的議論，其中以朱熹和呂祖謙為大宗。而朱熹的議論尤其以科舉制度及宰相制度為最多，呂祖謙則是在漕運的部分較多。但就其引用的學者進行統計，就人數上來說，仍以浙東學者為多。



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1989），頁 31-32。

第二節、《群書考索》制度的分析方式

儘管《群書考索》並未效法《通典》的分類排序，但是卻引用了許多《通典》的內文。究竟章如愚在分析歷史制度的方法上，有何特異之處？此節將與《通典》作一比較，試圖理解章如愚的分析方式及其意義。

首先，《群書考索》多有選取《通典》資料的情形。《群書考索》在制度的內容上承襲了《通典》的許多部分，章如愚究竟是如何運用呢？在此處以〈官制門〉為例（亦即《通典》的〈職官〉）。其一，有完全照錄的部分，如《群書考索》的〈官數類〉、〈官品類〉皆是《通典》原本的類目及內容。其次，有簡化改寫的部分，如《群書考索》的〈官制總序〉，是以《通典》〈職官〉之序改寫而成，其中簡化了《通典》中較詳細的敘述。如《通典》提到少皞氏以鳥名官之事，²³³《群書考索》省去了元鳥氏、伯趙氏等的職司，直接以「少昊氏立，鳳鳥適至，故以鳥紀鳥師鳥名。²³⁴」一語帶過。又如顓頊有春、夏、秋、冬、中等五行之官，在《通典》中詳細列舉，並介紹其管轄之權，但在《群書考索》中則以「五行之官」簡介之。其三，有擷取加強的部分，如《群書考索》〈官制門〉中提到宰相制度的部分，採用的是《通典》的一段敘述性文字，再另行補充資料。在《通典》中，提到宰相時稱「黃帝置六相，堯有十六相，殷湯有左右相……。」²³⁵但在《群書考索》中則是以此為題，下面再詳細補充：

黃帝置六相，謂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封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堯有十六相。

虞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穀於四方，內平外成，謂之十六相。並《通典》。

殷湯有左右相。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宋·百官志》。武丁得傳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說命篇》。²³⁶

從上述這些情形可看出，章如愚對《通典》的資料也並未一味抄錄，在某些部分依循《通典》的架構，但仍然有自己的選擇與補充。

以上是從方法上而論，可看出《通典》對《群書考索》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就雙方的觀點進行比較，章如愚並未完全同意杜佑的看法。杜佑認為制度隨著時代的發展將會愈來愈完備，因此他並不認為後世不如上古，例如他說到上古：

²³³ 《通典》，〈職官〉，卷 19，頁 105。

²³⁴ 《群書考索》，〈官制門〉，後集卷 1，頁 496。

²³⁵ 《通典》，〈職官〉，卷 19，頁 110。

²³⁶ 《群書考索》，〈官制門〉，後集卷 5，頁 524。

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²³⁷

杜佑認為上古的生活情狀是無制度可循的，反而近似夷狄。因此在各項禮制上，都還十分粗淺，未能完備。但是《群書考索》則沒有這樣的論點，章如愚傾向認定先王的制度已是成熟的狀態，認為沒有資料留存並不代表就沒有禮制。例如《群書考索》談論「禮器」制度時，引了一段這樣的文字：

自空虛浮誕之說勝，而儒生無考古之實學，禮器之不明後世也久矣。²³⁸

由此可看出章如愚的基本態度，他認為上古制度的不可知，是因為後世沒有考古之實學，才使古之制度湮沒不明。因此，他不去考慮文明產生以前的情形，在章如愚的想像中，上古是一個具備完美制度的時期。

其二，《群書考索》中有敘寫方式上的歧異。在此以「明堂」為例，在《通典》中已整理好的明堂制度源流，章如愚按朝代拆成各段，便於閱讀及查詢。雖然杜佑在撰寫《通典》時，已依朝代安排順序，但是《群書考索》以更明顯的方式呈現，其採用的方式是，在各段之前以朝代做為小標，內文也依朝代各別另起一段。兵制的部分亦是如此，除了如前所述以朝代做為小標之外，在內文中提朝代的部份，也會加上邊框，使其更加清楚。如下引文所示：

東漢自明帝至順帝，南軍凡二出，北軍凡六出：明帝永平中，鄧鴻率五營士屯鴈門。章帝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焉。章和二年，竇憲將北軍五校北匈奴。和帝永元六年，遣鄧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擊降胡及出塞者。安帝永初五年，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順帝永和五年，且凍寇，三輔遣馬賢將左右羽林五校屯漢陽，蓋左右羽林南軍五校五營皆北軍。²³⁹

不只特別突顯朝代名稱，帝號及年號亦復如此。雖然此為明代刊本，無法確定宋本、元本是否也有相同情形，²⁴⁰甚至我們也無法確認此是否為章如愚本意，但至少從這個角度觀察，可以看到當時必定存在著某種需求，使作者或刊刻者加強文章的時間感，此需求即是對制度演變的時間點的重視。故《群書考索》重視制度演變的時間點，採取各種手法來突顯之。這或許是因為《群書考索》作為科舉型類書，內容駁雜，為了方便記憶，若無適當的提綱挈領，讀者不方便使用。而刊刻《群書考索》的印刷業者，無論是基於便利性還是市場競爭的考量，都很有可

²³⁷ 《通典》，〈邊防〉，卷 185，頁 985。

²³⁸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39，頁 281。

²³⁹ 《群書考索》，〈兵門〉，後集卷 39，頁 755。

²⁴⁰ 現存宋版《群書考索》殘集並未見到這樣的標示方式。見（宋）章如愚，《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甲集）》（北京：中國，2008）。

能因此調整排版、加強標示。如清代《四庫全書》版本的《群書考索》，就無這樣的設置與安排，可見由明到清，因出版目地的不同，而使《群書考索》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第三，結尾處放入總論性質的文章。《通典》中亦有杜佑的評論，但是性質似與章如愚不同。杜佑在正文中有「說曰」、「議曰」、「評曰」、「論曰」、「按」，用以表示自己的意見。章如愚的意見卻未像《通典》一樣清楚標明，而是引述他人的評論，置於制度源流發展的最後，直接代替自己的意見。例如「明堂」，在敘述完各朝明堂建造與使用的情形後，另引《新唐書·禮樂志》對唐代明堂制度的評論，又再另撰一篇「總說明堂」置於最末，此「總說明堂」雖非章如愚親作，卻是他採集各家說法，合成一篇。而其選擇的論點、編排的方法，仍有可談之處。「總說明堂」一文，在結構上經過章如愚精心的安排。先蒐集各家學者對於明堂應如何設置的意見，章如愚在最後則總評了各家理論的得失，大致上可分成幾段來分析，首先是第一個部分：

觀諸儒之論，康成博而證，其失也雜；伯喈辨而裁，其失也固；袁準質而明，其失也刻；摯虞簡而質，其失也短；宇文愷才而富，其失也巧；李謐孚而篤，其失也苛。至於王儉之典雅，顏監之該詳，其皆讜論也，然終非萬世之法。²⁴¹

由上文可知，章如愚在「明堂」這個條目下，收集、整理了各種資料，如鄭玄、蔡邕、袁準、摯虞、宇文愷、李謐等人對明堂的議論。經過他的採用與閱讀後，對這些資料發表了一段自己看法，辨明各家論述之得失。接著是第二個部分：

武帝雖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纖；梁武得之於裘冕，而失之牲牢；齊丈得之配偶，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羣議，而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²⁴²

此段是各代建設明堂的情形，章如愚分析各朝優劣得失，並引出第三個部分：

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互說之末，必欲排之，庸知明堂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策。²⁴³

此段以分析孟子和韓愈的意見為主，透過對孟子的支持表達他對明堂的個人意見。接著是第四個部分：

²⁴¹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28，頁 209。

²⁴²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28，頁 209。

²⁴³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28，頁 209。

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考言以脩人治，適其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重屋」、「總章」不必徇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闢以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為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足以周旋禮文，潔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者，袁準之〈正論〉而已。²⁴⁴

此段講述建設明堂的意義，章如愚認為不應拘泥於名稱、古制，而要以明堂用途為考量進行建造。在此，他認為蔡邕之論不可取，袁準的意見則最優。是要回應章如愚在前面所引的蔡邕和袁準之意見。考究兩者對明堂意見的差別，蔡邕認為明堂的各種稱呼，如「大廟」、「大學」、「辟雍」，指的同樣都是明堂，只是因其各種功能，而有不同的稱呼。但是袁準則認為明堂不可能兼具多種功能，把明堂當作宗廟或大學，而就人鬼之事，有違於理。²⁴⁵因此章如愚在此做出了他對明堂意見的取舍。

章如愚的總論結構完整，他注重制度本身的精神和原始意圖，並表達出對制度可變動性的寬容態度。不僅只於制度本身，亦擴及歷來談論這些問題的說法，評論其優劣得失，這可能與章如愚對評論作品較有興趣有關。可看出他頗有勾玄提要之功，以及品隲高下之趣。例如在《群書考索》中篇幅不小的〈六經門〉、〈諸經門〉、〈經史門〉……等，皆以評論作品為主。就這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出，章如愚其實並不喜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許這與他的學力有關，無法像許多識見卓絕的學者一樣，撰著出精彩的議論。但另一方面，或許是他習慣用他人的意見來替自己發聲，而他也擅長編排眾人議論，這正是章如愚的為學風格。

²⁴⁴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28，頁 209。

²⁴⁵ 《群書考索》，〈禮門〉，前集卷 28，頁 208。

第三節、《群書考索》制度所引史論探析

《群書考索》在制度部分的行文特色如上所述，總結而言，包含兩大部分。一是對制度源流的編排鋪陳，一是諸儒對制度的議論。這樣的行文特色，我們可與《通典》和《文獻通考》並列而觀。早在唐代杜佑《通典》就已有先描述制度，而後收集各家議論的情形。到了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更是體現了「文」與「獻」的意涵，亦即「文」指的是典籍，「獻」指的是賢者之言，也就是當時的人或後人對制度的評論。學者認為《文獻通考》這點是承襲《通典》精神而來，²⁴⁶但我們不應忽略在《通典》出現後一直到《文獻通考》產生之間的這段期間內，宋代的制度性作品是採取什麼樣的行文方式。從《群書考索》就可看出其論述制度時重視「文」與「獻」的特色，這點與其說是承襲杜佑《通典》而來，不如說是在此時論述制度的方式已有普遍通行的形式存在。例如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依序分為以下幾個主題：科目、學校、賦役、漕運、鹽法、酒禁、錢幣、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馬政、考績、宗室、祀事。在每門就分成「制度」和「詳說」兩個部分，「制度」引的是歷代文獻，整理制度的源流和演變，「詳說」則是呂祖謙對於此制度的分析和評論。若從章如愚的師承視之，繼承呂祖謙論述制度的方式也不足為奇。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正是宋代論述制度的形式，連結了從《通典》到《文獻通考》的寫作精神和形式。

《群書考索》同樣重視「文」與「獻」，然而其方式有略有不同。如上二節所述，《群書考索》在制度部分引用了許多正史、會要、制度性書籍來鋪陳制度源流，但是這樣的情形大多在〈前集〉、〈後集〉中，〈續集〉和〈別集〉所選取的資料則不大相同，而是以史論為主。以官制部分為例，在〈後集〉中的資料大多為正史或官方文書記載，例如各代職官志、《唐會要》、《唐六典》，以及宋代歷朝會要、實錄等。在〈續集〉中則大多為宋人評論，如呂祖謙、林少穎、蘇軾、薛季宣、陳彥群等人的議論。同樣的採用大量宋人評論的情形，我們也可以見上一章討論《群書考索》歷史人物的部分，〈君道門〉、〈臣道門〉、〈聖賢門〉也位於〈續集〉中。

由此可見從〈後集〉到〈續集〉之間有一個斷層，是兩種不同的編纂方法，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章如愚先後不同的安排，也可疑為不同人所作。以往認為〈別集〉才是由呂中增補，²⁴⁷但是由此可發現〈續集〉和〈後集〉的差異也很明顯，因此〈續集〉是否也為章如愚所著，值得懷疑。但是就「文」與「獻」的精神來說，這樣的安排或許正是章如愚的用意。在〈前集〉、〈後集〉先處理制度「文」的部分，〈續集〉、〈別集〉則用來安置「獻」的部分。而本節所要討論的，正是

²⁴⁶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1973），頁 267-271。

²⁴⁷ 見崔文印，〈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頁 64-71。

《群書考索》中「獻」的部分，從中了解章如愚對制度的看法。

關於章如愚對制度的看法，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對前代制度的反省。章如愚所選擇的史論中，呈現出對古今制度得失的反省，尤其以三代和漢唐的比較最為顯著。漢唐的史實多被用以借鑑制度之得失，例如冗官的問題：

漢初建官，……初未見其冗也。自武帝以好大喜功之心，承文景積累之餘……則治獄之吏冗……則分刺之官冗。光武中興，於是為之減省吏員……漢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唐初太宗，……官不冗而祿易給，初未見其冗也。自中睿而後，……而太僕之職冗，……而戶部之職冗，……李吉甫……於是減省冗官，凡八百矣，李德裕之相武宗，……請罷郡縣吏凡三千餘員，唐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²⁴⁸

章如愚選擇的這段史論，表達了一個朝代官制弊病的因革。漢初到漢武帝為一個階段，是冗官冗員的滋長期，從漢武到漢光武則是另一個階段，為革除冗官冗員的時期。在漢代的例子之後，則是唐代的冗官冗員情形，其發展也與漢代類似。此論舉漢唐二例，呈現出制度必有興衰的變化過程。在宋人眼中是否就沒有理想中的完美制度呢？似乎又不是如此。撇除漢唐的例子不論，在這段史論中，三代制度跳脫出這樣的興衰循環之外：

周建六官，屬各六十，總之為三百六十焉。其間如掌葛掌茶之屬說者，則以為必兼官，無事則未必置也。行司馬與司馬之屬，說者以為非專官臨事而後置也。至於塚宰，歲終之詔廢置又有所廢者焉。司士之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又有所謂損者焉。夫以三百六十之職，以待天下之才，而其中又為之省約，曾又如此，則天下之官，安得而冗。²⁴⁹

在周代官制的設置之下，似乎沒有冗官冗員的問題。雖然在這段史論中，作者顯然是以兩套標準在看待三代與漢唐官制的設置。對於三代官制，只注意其理念的理想性部分，而未以史實加以驗證。但這也呈現出作者對三代、漢、唐的看法，三代是理想性制度的楷模，漢唐則是現實狀況下制度興衰的例證。

第二，《周禮》為制度之範本。前面說到章如愚對三代的憧憬，而在《群書考索》討論制度的部分，屢屢可見對《周禮》的推崇。包弼德曾討論到《群書考索》與《周禮》的議題，他認為《群書考索》前身《群書百考》的作者傅寅，以及與傅寅同時代的唐仲友，甚至是當時在婺州的學者，如鄭伯謙、王昭禹、陳祥道等人，皆對《周禮》的研究有高度興趣。這些風氣亦影響了章如愚著作《群書考索》。²⁵⁰

²⁴⁸ 《群書考索》，後集卷 25，頁 657。

²⁴⁹ 《群書考索》，後集卷 25，頁 657。

²⁵⁰ Peter K. Bol,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頁 655-659。

《周禮》的成書雖為戰國後期，但是一直是儒家對上古世界的想像認知。唐代杜佑《通典》中，就以《周禮》為理想制度的典範。²⁵¹章如愚對《周禮》的重視，正反映了宋人對上古理想世界的追求。但是並非不顧現實層面的考量，章如愚引此語道：

後世不可行周制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羣國，其相處如閨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精粗本末兼舉之耳。王莽荊公之時如何，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旦暮之間乎。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²⁵²

周禮用於制度改革的失敗，為顯而易見的事實。章如愚認為這並不是周禮本身的問題，而是時代與人都與成周之時相異，除非環境許可，人心純正，否則也只是「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徒勞無功。從這點來看，章如愚雖然推崇周禮呈現的理想國度，但也清楚理想實行於現世的困難。

第三，重視制度的精神。在章如愚的理解中，制度的發展有興有衰，造成制度興衰的原因，在於制度的精神是否改變。如章如愚選擇的一條史論中說道：

唐之制度，徃徃多壞於開元。憲宗謂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亦既美矣，然淮西既平之後，志意驕逸，竟不能自保其終。有讀太宗《政要》，而慨然興慕者，文宗也，而不能振委靡不振之弊。有讀太宗《金鑑錄》而舉其要者，宣宗也，而不能去察察之明。是又徒有法祖宗之言，而未知所以法祖宗之道。²⁵³

章如愚認為，制度一開始的立意總是良善的，就像唐太宗的建立的制度，造就了大唐之治世，但是延續者僅就條文上遵守，並未能掌握制度的精神，亦即「徒有法祖宗之言，而未知所以法祖宗之道」。作者接著說道：

欲法祖宗者，當以我朝仁宗為法，昔慶厯中邇英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宗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四十二年太平之事實由於此，方其初年，從李淑之請而作三朝寶訓之書，則固已有意祖宗之治，及邇英進讀，則又以真宗正說先之，其後御紫宸而詔三館近臣，以觀三朝訓鑒之圖，則一言一動未

²⁵¹ 甘懷真，〈中國古代的周禮國家觀與《通典》〉，《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論文集》（台北：政大歷史學系等，2008），頁 43-70。

²⁵² 《群書考索》，前集卷 4，頁 51。

²⁵³ 《群書考索》，前集卷 47，頁 345。

嘗不以祖宗爲心。²⁵⁴

當北宋政治從開創進入保守之際，最爲重視的就是維持祖宗家法，尤其在仁宗朝「祖宗家法」更是愈被尊崇並發揮作用。²⁵⁵到了南宋，對於祖宗家法的重視，仍被士人認爲是致治的關鍵，這正體現了宋人對祖宗之法的重視。王夫之曾評論過宋代政治之所以「稱治」，就是因爲「家法爲之繫括」。²⁵⁶但是南宋的政治環境與累積的制度上的問題，使得在此時提出「祖宗之法」的意味又與北宋不同。「祖宗家法」之說，在宋代政治上屢屢被提出來重新闡發，到了南宋已有僵化的情形。²⁵⁷對照章如愚此時對於祖宗之法的看法，正可看出他對這種僵化情形的反省，若是「徒有法祖宗之言，而未知所以法祖宗之道」，便無法維持制度的完善，因此章如愚認爲仁宗才是真正掌握精神，以祖宗爲心的楷模。

第四，關懷宋代政事。章如愚選擇的史論，多與宋代現況相關。這些史論對於熙寧變法的態度，值得細究。例如張演之論宋代官制，²⁵⁸張演認爲宋代延五代後唐設置三司使是「制之善者」，²⁵⁹將國家財政事務獨立開來，而「朝廷未嘗預焉」，²⁶⁰但是到了王安石變法之際，將財政權轉移一部分給宰相，三司使的權利受到剝奪，而「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²⁶¹張演更進一步指出「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更法度之時已壞矣」。²⁶²另一則史論更將靖康之禍歸咎到王安石之變法：

自熙寧初，王安石建言：「與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州府禁軍招填會逐路闕額兵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爲朝廷封當，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爲一將，置副專領西北今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兵權矣。內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烏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鎮之過歟。²⁶³

此段史論出自陳傅良（1137-1203），²⁶⁴其認爲王安石在財制制度上的改革，影

²⁵⁴ 《群書考索》，前集卷 47，頁 345。

²⁵⁵ 關於宋人在政治上對「祖宗家法」的看法，可參閱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2006）。

²⁵⁶ （清）王夫之，《宋論》（北京：中華，1964），〈太祖〉卷 1，頁 25。

²⁵⁷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頁 450-494。

²⁵⁸ 張演生平資料皆不詳。

²⁵⁹ 《群書考索》，後集卷 21，頁 636。

²⁶⁰ 《群書考索》，後集卷 21，頁 636。

²⁶¹ 《群書考索》，後集卷 21，頁 636。

²⁶² 《群書考索》，後集卷 21，頁 636。

²⁶³ 《群書考索》，續集卷 44，頁 1270。

²⁶⁴ 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師事鄭伯熊、薛季宣，傳永嘉之學，

響了宋朝的掌兵與管軍，使得內外守臣無兵權也無利權，這才致使靖康之際無兵可用。陳傅良為永嘉學派之重要人物，也曾編寫過《永嘉八面鋒》等科舉類書籍，或《歷代兵制》的制度類書籍。章如愚與之同屬浙東學派，在著作性質上也頗為類似，其援引前輩之論更證兩人思路之相近。

宋廷南渡之後，士人對北宋之亡必須要提出合理解釋，檢討敗亡之因，此時便將責任追溯至王安石變法之失。因此自南宋之後，對王安石的負面評價趨多。²⁶⁵在此我們僅舉《群書考索》的增補者——呂中為例。呂中對王安石變法的基本態度可見於其著作《大事記講義》，其中尚且不論如「賢如趙普，詐如安石」等近似人身攻擊的部分。²⁶⁶單就王安石對於更變制度的部分，呂中就曾說「我朝善守格例」，²⁶⁷王安石則是「以私心行之故破格例」。²⁶⁸雖然呂中此著中屢屢詆毀王安石，不甚公允，但也可看出南宋對王安石的評價之概況。

第五，對科舉制度的意見。《群書考索》雖是一部科舉型類書，但章如愚對科舉制度本身的看法，卻一直未為人所注意。在此，章如愚引用了許多朱熹的意見，用以代表其看法。首先，章如愚認為科舉是不得不存在之事：

科舉奪人本心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²⁶⁹

此文說明科舉的存在妨礙了人追求崇高的理想和目標，章如愚幫朱熹的這段文字下了標題「科舉奪人本心」，意在提醒士子追求科舉時，不要忘記此易奪人本心，但因為養育父母皆仰賴於此，因此仍需在此下工夫。章如愚又舉另一則朱熹的意見加強此論點：

不可為學業奪志

問科舉之業，曰：程先生有言，不可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²⁷⁰

由此可知，雖然《群書考索》為舉子型類書，甚至章如愚也以教導舉子為業，但是仍然強調舉業與個人之志的分別，除了事舉業之外，更要撥出時間修學。基本心態可見章如愚引的這一條：

不可使科舉之心勝

與張栻、呂祖謙為友。傳見《宋史·儒林》，卷 434，頁 12886-12888。

²⁶⁵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2004），頁 2-13。

²⁶⁶ （宋）呂中，《大事記講義》（台北：台灣商務，1971），卷 4，頁 19。

²⁶⁷ （宋）呂中，《大事記講義》，卷 6，頁 20。

²⁶⁸ （宋）呂中，《大事記講義》，卷 6，頁 20。

²⁶⁹ 《群書考索》，別集卷 19，頁 1507。

²⁷⁰ 《群書考索》，別集卷 19，頁 1508。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²⁷¹

也就是說，將三分力氣花在科舉上，七分力氣放在「為己」讀書上，並非完全捨棄科舉，在章如愚的認知中，科舉與讀書並不衝突，只存乎人的一心。因此他舉朱熹之言道：

不可以得失為心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常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²⁷²

因為人以得失為心，才使科舉的目的與求學愈離愈遠。這呈現出章如愚的基本態度，科舉既是現今取士之法，就必須接受之，但其與個人志趣的輕重拿捏，則是在於個人。由此可看出，《群書考索》並不只是資料的彙集，即使是這樣的類書亦能寄託作者的思想。

總結《群書考索》所採史論的特質，重視對前代制度的反省與檢討，其中彰顯了對三代的憧憬，以及漢唐史事作為借鑑的作用。除此之外，亦看重制度的興衰與因革損益，其中對於王安石變法的部分多採負面態度。而從章如愚對科舉制度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科舉的態度，既不否定也不推崇，即使事舉業也不礙為學。這正透露出章如愚著作此書的宗旨，《群書考索》雖為舉業之書，卻也能承載義理。

²⁷¹ 《群書考索》，別集卷 19，頁 1507。

²⁷² 《群書考索》，別集卷 19，頁 1509。

小結

《群書考索》對制度的論述所占篇幅極大，可以說是全書的主要核心，這與浙學重視實學息息相關。我們將眼光放遠視之，《群書考索》在制度性書籍的演變中，具承先啓後的作用。杜祐在《通典》中以「食貨」爲首，認爲應先足衣食，再行教化，最後則是理道。章如愚則是將禮樂放在制度之首，表現出他認爲制度最重要的基礎在於人心陶冶，而將「財賦」置於最後，可看出他與杜佑《通典》視角的不同，亦即禮樂與食貨孰本孰末的問題，在這點上王應麟的《玉海》與章如愚採相同角度，此似唐宋間觀念的一項轉變。《文獻通考》雖然在制度類目的選擇上與《通典》相近，且編纂方式也聲稱繼承《通典》，但是章如愚對於制度的編纂方式中，亦體現了「文」與「獻」並重的特色，此連結了從唐代《通典》到宋代《文獻通考》的寫作精神和形式。代表自唐到元，「文」「獻」並重的寫作精神是不曾中斷的。也由於《群書考索》和《通典》、《文獻通考》相似的特質，使其雖爲類書，其性質卻近似政書。除了將知識分門別類，加以名詞解釋之外，更重視制度的精神和其演變情形。並且與《玉海》相比，《群書考索》對於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變較爲重視，有較多統整性的總論。這樣的特色使《群書考索》在日後被視爲政書，與《通典》、《文獻通考》齊名。

章如愚在制度方面選用的資料，有史著，也有宋人議論。其分析手法，又比論述人物更加複雜。除了完全照錄的部分外，有時亦會簡化改寫，或者擷取加強。並且考慮讀者的閱讀方便，會將整段史料拆解，加入時代的小標，以便辨識。除此之外，章如愚亦善用各家說法，將之集爲一篇，在最後總評各家理論得失，再略爲發揮自己的看法。或許其並無高深議論，但是擅長編排眾人議論正是他的爲學風格。章如愚選擇的這些議論呈現出來的史觀，主要爲其對前代以及當代制度的反省，一方面以漢唐的例子做爲借鑑，一方面則反思宋代制度現況。另一個特點，則是章如愚對上古制度的推崇，相較於漢唐是現實狀況下制度興衰的例證，三代則是理想性制度的楷模。除此之外，章如愚對科舉制度的看法是另一項重點，其雖爲舉業之師，但是亦了解舉業之弊，最終章如愚所追求的，則是希冀能找出追求舉業也不礙爲學的方法，這或許正是他撰著此書的理想。

第五章、結論

類書的發展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內容包含了人與自然界的一切知識。早在曹魏初年的《皇覽》，就具備了類書的性質。自此之後，官方修訂的大型類書，除了誇耀朝廷的文治，也是配合日趨複雜的行政體系而生。從「皇覽」和「御覽」等詞，可知最初是給統治者參考閱讀之用。然而自唐之後，因應詩文創作、科舉考試，逐漸有文人私修類書，以便寫作。到了宋代，一方面有大型官修類書出現，一方面私修類書也蓬勃發展，而「類書」一詞也在宋代確立。尤其南宋出現的私修類書，如《玉海》，其涵蓋的知識體系不可謂不大，這是由於原本存於朝廷的知識體系，隨著任職史官的文人傳抄後編錄類書，²⁷³逐漸流入民間。隨著這些知識的流出，以此為材的類書又更進一步向士人傳佈，促成了宋代社會知識流通的現象。章如愚的《群書考索》在此時應運而生，書中除了匯集廣博的知識之外，更表達他的意見及對現世的關心，寄託了作者更深層的寫作意圖。但是歷來的研究大多注重於版本的考訂、功能的介紹。筆者希望能從學術史、思想史的脈絡來探討此書。

透過對章如愚與《群書考索》的了解與認識，筆者期望為兩者作出評價與定位。本文提出了幾個前人未曾述及或細辨的看法，第一是考究章如愚的生平經歷。目前學界提及章如愚，多僅採用其小傳，這樣的資料卻不足以呈現章如愚個人的學術傾向。甚至引用《南宋書》的章如愚傳記，卻未辨明此傳是否真實可信。本文將章如愚的生平與經歷做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包括章如愚生卒年的推測、《南宋書》章如愚傳記的考證、章如愚學派的判定，並結合當時的婺州的學術氛圍論述，以期讓讀者了解章如愚生長及著作的背景。章如愚的生平經歷，正是宋代士人的一個縮影。他生於婺州金華，到了求學階段，進入麗澤書院就讀，接觸呂學。在此書院中，他不只受到了呂學的薰陶，也有機會接觸到來此處講學的各家學者，例如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宣、葉適、陳亮等人。於是在各類議題上，他開始廣泛的吸收各家的意見。其中一位鄉間舉業之師——傅寅，著作的《群書百考》一書，對於各種制度源流都考究的相當清楚，這部作品對他往後的學術發展有極大影響。章如愚接著花了一段時間準備科舉考試，最後考取功名，進入朝中。雖然曾任至知制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外放到地方上任職。在貴州這個動亂極多的偏遠之地，他的治理卻也有聲有色。經歷了十年的仕途後，又被召回朝中，因為意見不被當朝採納，才又罷官回鄉。在鄉里教書之餘，也完成他多年來潛心整理的著作——《群書考索》。本文試圖呈現章如愚所處的時空背景，以及其生命歷程的各個階段。

第二，則是考究《群書考索》成書與發展的時代意義。以往學者談到《群書

²⁷³ 王應麟就曾多次擔任史官，其《玉海》一書，皆賴他在擔任史官期間抄錄國史、實錄、會要等資料編纂而成。

考索》時，多就書籍本身論之，但是對《群書考索》的成書過程，以及其在後代意義的變化，都未曾注意。本文則試著從南宋婺州學風與舉業的角度來看《群書考索》的成書與演變。就南宋婺州學風而言，當時類書編纂風氣盛行，與章如愚同時期的有潘自牧的《記纂淵海》、王象之的《輿地記勝》。更早一點的類書，有陳傅良的《永嘉八面鋒》、唐仲友的《帝王經世圖譜》、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顯見當時在金華地區的學術風氣，有彙整知識、求博求廣的傾向。再者，章如愚在撰著《群書考索》前，婺州當地已有傅寅的《群書百考》，作為章如愚編纂類書的楷模。此書重視《周禮》的精神，也被《群書考索》所繼承。婺州有博通的學術風氣，又有類書的文本傳統，《群書考索》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

就舉業的角度而言，由於南宋博學宏詞科的發達，一些相應的書籍也隨之產生，如王應麟的《玉海》、洪邁的《南朝史精語》等等，²⁷⁴士人節錄古書的習慣就是這樣產生的。宋代對策論的重視，也促使許多以寫策論為主的類書出現。如不著撰人《群書會元截江網》、林駟和黃履翁的《古今源流至論》等等。章如愚身為舉業之師，其著作與科舉的關係亦相當密切，章如愚在地方上講學，為了教導士子所編選出來的教材，正是他讀書的心得筆記。而慣於蒐集資料、分類排比，這正是他博采眾說、分別優劣的為學方式，同樣的情形也可見於傅寅。如此淹通掌故、熟悉制度源流的特色，也成為舉子求教的首選。我們無法確知孰為因果，亦即他們的作品是否是為舉業而作？士子的求學是否都是為舉業而來？但是不可否認，至少在宋元時期，他們與其作品都被認為與科舉息息相關。然而《群書考索》隨著時代演進，有不同的地位與功能。其漸漸脫離科舉用書的印象，與《通典》、《文獻通考》並立，到了清代甚至被視為「求古今興衰之要」之書，而與《資治通鑑》相提並論。《群書考索》演變的過程，正讓我們見證了一部類書，隨著時代變化而具有不同意義的發展史。

第三，探討《群書考索》的思想與學風的關係。一般在學界提及《群書考索》時，多以類書的性質視之，因此往往忽略其思想成分。然而在《群書考索》中，最明顯的特色就是以義理論史，這是宋代理學產生的影響。就選材而言，章如愚在論述歷史人物時，選擇了許多宋儒的議論，婺學、洛學、朔學、蜀學等派都被收錄，而比例較多的為呂祖謙、林之奇、蘇軾等人。論述制度時，章如愚的選材則比較中規中矩，根據《通典》等政書的記載來撰寫。但是也另外大量收錄了宋人的議論，其中亦採用了各家之說。這與章如愚在麗澤書院的求學歷程有關，正展現了章如愚以呂學為宗，但博採眾說的態度。章如愚援引許多宋儒的議論，這些議論呈現出宋儒對歷史的看法。而貫穿全書的一大理念，就是宋儒對上古三代的追懷。章如愚認為，上古三代與漢唐之間，有一個斷層。無論在君臣關係的和

²⁷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南朝史精語》：「蓋南宋最重詞科，士大夫多節錄古書，以備遣用。其排比成編者。則有王應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巾箱祕本，本非著書，不幸而為人所傳者。則有如此類。後人以其名重，存之，實非其志也」，見（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卷 65，頁 1414。

諧、制度的完備，漢唐都遠遠不及上古三代。他對人物的評斷，以及分析制度的優劣，能明顯看出這個立場。宋代理學對三代的追懷，全面影響了當時士人的歷史觀，即使章如愚進行的是史料蒐集、分類的工作，仍受此影響。同樣的情形，也可以見於宋元之際的史家馬端臨。馬端臨雖以歷史的方法考究典章制度，但仍接受宋儒推崇三代的史觀，其選取的宋儒史論也透露出這樣的關懷。²⁷⁵

此外，在選擇討論的項目時，也可看出章如愚受到理學的影響。例如他選擇君、臣、聖賢人物，都是理學譜系中能承載「道」之人。而他關注的核心議題，也著重於「君臣關係」上，這正是宋代理學關注的「內聖外王」、「治」、「道」之關係。一般談到宋代的理學思想傳佈，往往與書院師友談理講學的活動密不可分，這點從語錄與理學家對答的文章都可以看出。但是舉子型類書卻也發揮了傳佈的作用，如《群書考索》中的理學思想，便透過舉子的閱讀而傳播開來，這對南宋理學思想的普及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群書考索》重視典章制度源流，似亦來自呂學重史的影響。這也是《群書考索》雖為類書，但卻有政書性質之因。《群書考索》一書，正反映了南宋後期史學的發展。北宋經歷了王安石的改革失敗，士人到了南宋，愈注重心性之學，對於實務則愈不加注意。²⁷⁶但是南宋浙東學者重視對上古漢唐制度的研究，²⁷⁷如呂祖謙、葉適、陳亮、陳傅良、唐仲友等人，在實務上有許多議論。他們重視歷史和制度，認為考究典章制度的興衰成敗有助於治國，此形成浙東學術的一大特色。宋代晚期，浙江出了許多朱學門人，其中有王柏、黃震、王應麟、金履祥等人，然而他們治學的方式卻受浙學影響，鑄鑄思想與經學、史學，改變空談性命的現象，此可視為朱學在晚宋的轉型。²⁷⁸早在此之前，章如愚的《群書考索》似已有這樣的特質。

第四、考察《群書考索》的編纂手法。以往將《群書考索》視為類書的研究中，亦注重《群書考索》的分類情形，但是卻未深究其分類與選材之背後原因。故章如愚往往被視為資料收集排比者，其深刻的思考與寫作手法則被忽略。本文試圖從章如愚的編纂手法中，了解其分類與選材背後的原因。《群書考索》中呈現出了章如愚編纂、分析資料的方法，除了「選取資料」、「改寫」、「排比」，還有「分類」與「下標」。在選取資料方面，章如愚選取的資料，正代表他對此事此物的意見，例如從他對唐太宗的敘寫，就可以看到其所選擇的資料，其實大多不從外顯行為論之，而是就人物本身的個性和態度而論，這與理學從心性論人的特質有關。在資料改寫方面，章如愚對於其選取的資料，往往會有刪去和增補的

²⁷⁵ 張元，〈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思想與學術》（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2005），頁124-144。

²⁷⁶ 錢穆：「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1997），〈兩宋學術〉，頁6。

²⁷⁷ 葉適：「（浙東）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籌算手畫，旁採眾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見（宋）葉適，《水心集》（台北：中華，1965）。

²⁷⁸ 朱學在晚宋已有區域化的現象，浙江的王柏、黃震、王應麟、金履祥等人皆是在朱學的基礎上，以學術的方式呈現朱學。見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2008），頁238-257。

部分，用以符合其要回答的歷史問題，可見他對資料的呈現是經過悉心考慮的。在資料排比上，章如愚的排序是有其邏輯的。例如他在討論殷高宗用傳說的部分，其選取的資料之間的順序，可以看出他的刻意安排，其提出的歷史問題是一環扣著一環的。在他對人物以及制度的分類上，可以看出其理想中的人物典範與重要制度類型。而在下標方面，往往資料原無標題，章如愚卻能以重要的歷史問題加諸其上，使此段資料的選擇更有意義。此外，在各家理論的摘取之下，章如愚善於品評這些意見，並加以提要勾玄，這亦是他擅長的寫作手法。由此可見，《群書考索》的編寫，是經過章如愚審慎的思考，以及有邏輯的安排。

我們不能忽視《群書考索》有許多不足之處，如名目混亂、主題不統一的情形。甚至，章如愚本身的思辯和為學方式限制了《群書考索》在思想上的開創性，即使自己撰寫總論，數量也不多，因此大多是資料的堆砌。章如愚對自己的作品定位也很清楚，他認為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做資料彙整的工作，因此多用別人的話來代替他的意見。但是此書仍寄託了作者的理想，章如愚的作品及其一生，皆圍繞著科舉打轉，他身為舉業之師，也深知科舉的弊病，筆者推測其最終想解決的正是「科舉奪志」的問題，如何讓舉子能夠讀書與舉業兼顧？細觀《群書考索》一書，其實隱含著彌補科舉弊病的意圖，讓士人能在習舉業之際也不要喪失高遠的志向，或許正是章如愚傾盡一生之力的《群書考索》想要達到的目標，也是它能流傳百年的原因。

本文將焦點放在章如愚與《群書考索》中的人物與制度，然尚有課題待進一步研究。如《群書考索》中討論經、史的篇幅頗豐，有〈六經門〉、〈諸子門〉、〈諸經門〉、〈諸子百家門〉、〈正史門〉等等，也引用了許多宋儒對經、史的意見，如當時人對《春秋》、兩漢史、《資治通鑑》的看法，這對於了解南宋學術研究的概況實有助益，值得日後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一)史料

1. (周)管仲，李勉註譯，《管子》，台北：台灣商務，1990。
2.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1962。
3. (唐)杜佑，《通典》，台北：新興，1965。
4. (宋)不著撰人，《十先生奧論》，台北：台灣商務，1970。
5. (宋)不著撰人，《宋文選》，台北：台灣商務，1983。
6. (宋)不著撰人，《群書會元截江網》，台北：台灣商務，1971。
7. (宋)不著撰人，《歷代名賢確論》，台北：台灣商務，1983。
8.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台北：新興，1974。
9. (宋)王柏，《魯齋集》，台北：台灣商務，1983。
10. (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台北：台灣商務，1971。
11. (宋)王應麟，《玉海》，上海：古籍，1992。
12.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1956。
13.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全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98。
1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1991。
15. (宋)朱熹，《論孟精義》，台北：台灣商務，1983。
16. (宋)朱熹，《雜學辨》，上海：上海古籍，2002。
17.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台北：台灣商務，1971。
18.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杭州：浙江古籍，2008。
19. (宋)呂祖謙，《東萊博議》，台南：大東，1969。
20. (宋)呂祖謙，《東萊集》，台北：台灣商務，1983。

21. (宋) 呂祖謙,《書說》,杭州:浙江古籍,2008。
22. (宋) 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杭州:浙江古籍,2008。
23. (宋) 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
24. (宋) 林之奇,《尚書全解》,台北:台灣商務,1983
25. (宋) 林駟、黃履翁,《古今源流至論》,台北:台灣商務,1983。
26. (宋) 胡安國,《春秋傳》上海:商務,1919。
27. (宋) 夏僎,《尚書詳解》,台北:台灣商務,1979。
28. (宋) 高承,《事物記原》,上海:上海古籍,1992。
29. (宋) 張九成,《孟子傳》,台北:台灣商務,1971。
30. (宋) 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1999。
31. (宋) 陳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鋒》,板橋:藝文,1966。
32. (宋) 陳經,《尚書詳解》,台北:台灣商務,1983。
33. (宋) 章如愚,《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甲集)》,北京:中國,2008。
34. (宋) 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1982。
35. (宋) 傅寅,《禹貢說斷》,台北:新文豐,1985。
36. (宋)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1981。
37. (宋) 黃倫,《尚書精義》,台北:新文豐,1985。
38. (宋) 葉廷珪,《海錄碎事》,上海:上海辭書,1989。
39. (宋) 葉適,《水心集》,台北:中華,1965。
40. (宋)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台北:中華,1965。
41. (宋) 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中華,1988。
42. (宋) 謝枋得,《文章軌範》,鄭州:中州古籍,1991。
43. (宋)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台北:新興,1971。

44. (宋)蘇洵,《嘉祐集》,上海:上海古籍,1993。
45. (宋)蘇軾,《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2000。
46. (元)吳師道,《敬鄉錄》,台北:新文豐,1988。
47.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平:中華,1986。
48.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1985。
49.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台北:新文豐,1985。
50.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台北:新文豐,1988。
51. (元)柳貫,《柳待制集》,江蘇:廣陵,1983。
52. (明)王懋德等修纂、吳相湘主編,《金華府志》,台北:學生,1965。
53. (明)吳寬,《匏翁家藏書》,台北:藝文,1975。
54. (明)李賢,《明一統志》,西安:三秦,1990。
55. (明)汪尙寧等纂修,(嘉靖)《徽州府志》,台北:成文,1983。
56. (明)邵經邦撰,《弘簡錄》,上海:古籍,1995。
57. (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上海:古籍,1995。
58.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台北:台灣商務,1983。
59.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上海:古籍,1995。
60. (明)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
61.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台北:新文豐,1985。
62.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2004。
63. (明)楊士奇撰,《東里續集》,台北:台灣商務,1986。
64. (明)鄭柏,《金華賢達傳》,台北:新文豐,1988。
65. (明)錢士昇,《南宋書》,濟南:齊魯,2000。
66. (明)錢棨,《蕭林初集》,北京:北京,2000。

67. (明) 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台北:新文豐,1988。
68. (明) 黃道周撰,《博物典彙》,上海:古籍,1995。
69. (清) 王夫之,《宋論》,北京:中華,1964。
70. (清) 王崇炳撰,《金華徵獻略》上海:古籍,1995。
71. (清) 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書局,1962。
72. (清) 包世臣,《小倦遊閣集》,上海:上海古籍,2002。
73. (清)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1933。
74. (清) 朱彝尊撰,《經義考》,台北:台灣商務,1983。
75. (清)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台北:台灣商務,1971。
76. (清) 俞樾撰,《茶香室四鈔》台北:新興,1986。
77. (清) 姜兆錫撰,《書經參義》,上海:古籍,1995。
78. (清) 馬步蟾修、夏鑾纂,《徽州府志》,台北:成文,1975。
79. (清) 高宗敕撰,《續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7。
80.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1974。
81. (清) 張佩芳修、劉大樞纂,《歙縣志》,台北:成文,1974。
82. (清) 梁章鉅,《歸田瑣記》,台北:木鐸,1982。
83. (清)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北京:學苑,2006。
84. (清) 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遠流,1983。
85. (清) 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1986。
86. (清) 萬斯同撰,《儒林宗派》,台北:台灣商務,1979。
87. (清) 鄧鍾玉等纂修,《金華縣志》,台北:成文,1970。
88. (清) 穆彰阿, (嘉慶)《大清一統志》,上海:古籍,1995。
89. (清)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台北:文史哲,1973。

90. (清)邁柱，《湖廣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3。
91.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北京：中華，1990。
92. (清)黨金衡原本、王恩注重定，《東陽縣志》，南京：江蘇古籍，1993。
93.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台北：台灣商務，1983。
94. (清)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板橋：藝文，1970。

(二)專著

1.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2. 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新文豐，1982。
3.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2001。
4.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台北：允晨文化，2008。
5. 安國樓，《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台北：文津，1997。
6. 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2008。
7. 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北京：中華，1989。
8.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
9.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
10.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香港：中華，1974。
11.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1993。
12. 李勇先，《《輿地記勝》研究》，四川：巴蜀，1998。
13.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2004。
14. 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2003。

15. 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1984。
16.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2005。
17. 范立舟，《宋代理學與中國傳統歷史觀念》，西安：陝西人民，2004。
18. 祝尙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2006。
19. 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2005。
20. 戚志芬，《中國的類書、政書與叢書》，台北：台灣商務，1994。
21.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1989。
22.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台北：聯經，2004。
23. 黃寬重，《宋史叢論》，台北：新文豐，1993。
24. 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1995。
25. 管敏義，《浙東學術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
26. 趙含坤，《中國類書》，石家莊：河北人民，2005。
27. 潘富恩、徐慶餘，《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1992。
28.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2006。
29.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1973。
3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1997。
31.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灣：學生，1977。
32. 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兩宋時期》，浙江：人民，1991。
33.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1997。

(三)論文

1. Hilde de Weerdt,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special volume, *Qu'étaien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 en*

Chine, 2007, 77-102.

2. Hoyt Cleveland Tillman, "Encyclopedias, Polymaths, and Tao-hsueh Confucian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 Ju-yu," *JSYS*, 22(1990-92), pp.89-108.
3. Peter K. Bol, "On Local History and the Later Imperial Nation: The Jinhua Case," 《中国——社會と文化》, 20 (東京, 2005), 頁 364-389。
4. Peter K. Bol,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 頁 644-673。
5. Thomas H. C. Lee, "History, Erudition and Good Government: Cheng Ch'iao and Encyclopedic Historical Thinking," *Sung Senses of the Pa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3-200.
6. 丁原基, 〈宋代類書的文獻價值〉, 《應用語文學報》,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 4 : (2002), 頁 29-56。
7. 甘懷真, 〈中國古代的周禮國家觀與《通典》〉, 《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論文集》(台北: 政大歷史學系等, 2008), 頁 43-70。
8. 吉川幸次郎, 〈宋人の歴史意識〉, 《吉川幸次郎全集》, 東京: 筑摩書坊, 1969, 卷 13, 頁 573-589。
9. 余英時, 〈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 《歷史與思想》(台北: 聯經, 1977), 頁 87-120。
10. 李宗翰, 〈呂祖謙之歷史思想〉,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1998。
11. 李偉國, 〈《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 《文獻》, 22 (1985), 頁 91-98。
12. 姚政志, 〈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改變〉, 《政大史粹》, 15 (2008), 頁 51-90。
13. 秦玉清、張彬, 〈呂祖謙與麗澤書院〉, 《杭州師範學院學報》, 2 (1999.3): ?。
14. 崔文印, 〈高氏諸「略」與章氏《山堂考索》〉, 《史學史研究》, 1 (1994), 頁 64-71。
15. 張元, 〈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 《思想與學術》(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 2005), 頁 124-144。

16. 張元，〈試析王應麟的歷史思想〉，《清華學報》，27-3（1997），頁 287-312。
17. 張元，〈簡析洪邁的歷史知識〉，《中國文化研究》（北京），39（2003.1），頁 69-81。
18.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2009.6），頁 43-113。
19. 陳曄仁，〈《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宋刻本考述〉，《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07，頁 171-193。
20. 勞榦，〈說類書〉，《新時代》，卷 1，第 7 期，1961，頁 27。
21. 黃俊傑，〈儒家歷史敘述的特質：宋儒集體記憶中的聖王典範〉，《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時報，2006，頁 70-80。
22. 楊晉龍，〈慎獨齋本《山堂考索》之刊校及與「四庫本」之比較〉，89 年 5 月 27 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第九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93-117。
23.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2000），頁 57-90。
24. 戴建國，〈漢宋之間類書的嬗變〉，《圖書情報知識》，3（2008.5），頁 74-76。